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构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动态性相适应的长效机制 韩永文 (005)

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贾 康 (016)

· 国际经济 ·

全球“宽货币”与“紧货币”的十字路口 谷源洋 (027)

经济持续复苏 扩张基础薄弱

——2017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国家统计局释经组 (038)

货币国际化经验对“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孟 刚 (049)

· 宏观经济 ·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066)

房地产价格、财富预期与经济增长稳定 贺京同 那 艺 赵子沐 (084)

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总量及结构预测 田 帆 (093)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区域经济 ·

从文化理念和制度安排视角“查短板”“补短板”

黄 勇 傅金龙 潘毅刚 董 波 (108)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4)



CONTENTS

- To construct a long – term mechanism in which supply structure and demand structure
are dynamically accommodating to each other *Han Yongwen* (005)
- To carry out the great causes of moderniz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nd
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 Kang* (016)
- The crossroads of global “broad money” and “tight money” *Gu Yuanyang* (027)
- Sustained economic recovery and weak expansion base
—— 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terpretation Group (038)
- The enlightenment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Meng Gang* (049)
- Research on the system mechanism of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CCIEE Research Group* (066)
- Stable real estate prices, wealth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He Jingtong, Na Yi and Zhao Zimu (084)
- The forecast of the total labor supply and structure of China in the future *Tian Fan* (093)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find
out “short slabs” and fill them *Huang Yong, Fu Jinlong, Pan Yigang and Dong Bo* (108)
-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4)

构建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动态性相适应的长效机制

韩永文

摘要：从理论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扭转表象上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要求的问题；长期和根本上则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真正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市场，建立起动态的供给与需求相适应、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变化相适应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结构 需求结构 创新驱动

作者简介：韩永文，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特点和面临的主要矛盾，提出化解矛盾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既体现了“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又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体系，是化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矛盾的一把钥匙。从理论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扭转表象上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要求的问题；长期和根本上则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制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真正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市场，建立起动态的供给与需求相适应、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变化相适应的长效机制。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积累了有益的实践借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两年来，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三去一降一补”和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积极推进，收到了成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部分产业供求关系发生积极变化，实体经济盈利水平开始回升。2017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9%，比前两年有所回升。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3.4%，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7%，连续 11 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达到了 54.9%，连续 9 个月保持在 54%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增长动力格局在改善，产出结构有所调整，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经济发展潜力和活力。上半年，全国钢铁行业累计去产能 2.35 亿吨（2016 年 6500 万吨，2017 年上半年 5000 万吨，取缔地条钢 1.2 亿吨）。煤炭行业累计去产能超过 4 亿吨（2016 年 2.9 亿吨，2017 年上半年 1.11 亿吨）。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6.4%，比上年同期提高 3.4 个百分点。75.4% 的工业小微企业设备利用率高于或者处于正常水平。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6.1%，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减少 9.6%。5 月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减少约 0.04 元。放管服改革、国企改革、财税金融改革、农业农村改革、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稳步推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和宽松环境。

反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可以提供以下借鉴：一是顶层设计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与以往的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全局性、系统性、长远性和综合性的思考。早在 2015 年，习总书记就提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治标不治本，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要靠结构性改革，在实施适度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供给侧，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因此，近几年来中央在经济大策上一直是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党中央在深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问题的基础上，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遵循，突出改革引领，实施创新驱动，坚持政府推动、市场驱动，自上而下，整体规划，以“三去一降一补”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和抓手，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性推进。二是要素新供给与制度新供给相结合。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的，在打通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渠道上着力，推动供给要素在不同领域尤其是实体经济领域合理流动、科学配置，实现资源要素价值的再发掘，提升要素科学配置水平和产出效率，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同时，注重和努力强化以市场化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建立构建优化供给结构的新体制新机制。三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宏观调控、稳健调控，强调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社会政策要托底，注重财政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上的作用，采取必要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与市场手段、法制手段相结合，大力推进去产能、去杠杆和处置僵尸企业，尽快实现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全面出清。四是优化供给结构与适度扩大需求相结合。在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通过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力补短板，适度扩大总需求，开发和拓展日常生活需求面，化解底层有效需求不足与缺乏市场有效供给的矛盾，促进经济平稳运行，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五是开拓国际与拓展国内相结合。在深化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进经济全球化。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不断扩大以建筑、建材、机械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和富余产能走向国际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国际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以高铁、通信、电力设备等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对外推广。

同时，也应看到，改革进程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改革理论框架已初步搭建起来，但在实践上还存在不少认识不统一的问题，实施中很多方面存在着被动地而不是主动地贯彻等问题。一些改革措施（特别是去产能）行政手段过多，“划比例”“一刀切”，统筹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推进的方法不多；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和供需错配的体制性变革仍然滞后；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系统性改革思考和统筹安排，“碎片化改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抓解决主要矛盾系统性改革思考不够等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意义

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重大理论创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总结分析世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验教训，总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演变进程和现实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的重大理论思考和哲学思考。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入手，系统性地思考经济转型发展和结构演进的逻辑联系和路径，对新常态、可持续发展的增长动力、增长结构问题等做出具有逻辑性论述和阐释，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片面地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增长质量的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不少地方和部门为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缺乏客观审慎地分析、预测市场容量，盲目地鼓励支持企业投资，盲目地组织招商引资，盲目地扩张投资规模，导致产能过剩逐步加剧。带有一定的重型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扩张以及入世后低层次的出口驱动增长，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供给结构质量不高，投资品生产领域产能迅速膨胀，单位投入产出效率递减，最终在世界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冲击下，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大面积产能过剩，创新动力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再一味地通过货币和财政扩张在总量上刺激需求，不仅不能解决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供给失衡的矛盾。正是看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思考，并反复强调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层演进的必经过程。

当前,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国民收入、全体国民所享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以及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同群体消费水平的差距来看,我们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越是步入现代化,越是要求走向均衡发展。我国人民对更好的物质生活追求,对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向往以及享受更好的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就更加迫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更高质量的文化需求,实现经济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个理论思路出发,强调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必须有扎扎实实的成果,必须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即“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有比较充分的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

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是真实效益和真实效率的增长与提高。“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更不能看带水分的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投入产出效率越来越低的增长率。必须下决心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这是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而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增长、质量、效率从哪里来,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而结构调整则要从单纯增量扩张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赖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指出:“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坚定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坚持以创新作引领,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最根本的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活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这一基本理论框架下,系统总结两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反观和梳理近几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安排和具体政策措施实施情况,地方政府和部门、企业在执行中的经验、教训、问题,进一步充实、完善、细化改革的理论内涵、战略定位、方法和实施路径,校正实践中发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中的不足与缺陷,使之在行动上与理论、政策、制度安排同向同力,减少政策传导递减效应。当前,各方面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证研究较多,规范研究较少,经验总结和实证阐述也不足。应推动理论界、学术界和智囊机构进一步加大研究。还要看到,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有的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理论依据就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供给理论+结构性理论+制度理论。有的简单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甚至简单地认为就是“三去一降一补”,认为“三去一降一补”

到位之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就算完成了。解决这些认识上的误差，同样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实证分析，探索规范性分析，使社会上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全面、准确、深入的理解。

三、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把握的几个关系

（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优化供给侧结构的基础和关键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合理而科学地发挥政府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矛盾是在我国特定国情和特殊体制下，各种因素内外交织相互作用累积的结果。其主要表现是要素配置扭曲，供需错配，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市场，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市场淘汰机制作用发挥不足，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领域向有效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流动，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创新动力弱，供给侧结构升级明显滞后于需求侧结构升级。两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取得进展，但进展还不够理想。表现为不少国企和民企都在等待观望他人退出，因而形成改革黏性。在改革初期，政府部门较多地采取行政性和计划手段推动“三去一降一补”，运用技术标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不够，形成了关系经济学效应和改革落地的迟滞性。这些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技术标准和法律手段约束软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如何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尽快实现供需结构再平衡，最重要的也是最客观公正的，就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把市场主体推到第一线任市场评判。因此，应坚定地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解除束缚市场主体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斩断至今仍有为数不少的经营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与政府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消除仍带有行政色彩的经营决策机制，以及带有垄断性特征的经营方式，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供给结构自动调节和稳定修复机制。应该看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采用行政手段去产能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分指标、划任务、“一刀切”的做法，行政成本高，负面影响也不小。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钢铁、煤炭、电力建设还是房地产业投资，甚至于不少装备制造业建设，很多都存在以往政府在投资决策、项目审批推动以及变相担保借贷支持的影子。因此，痛下决心去产能，企业不情愿，政府难割舍，银行怕废债，执行难就是必然的。下一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评判倒逼企业调整改革。政府则要让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环境保护标准及其法律规范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同时要研究对银行债务实行必要的保全政策和债务处置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也要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解决好政府

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全面推进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和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一方面要全面落实中央放管服改革各项措施，以清单管理推动减权放权，全面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配置资源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在宏观上把握好政府调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利用逆周期调整供给侧结构，在提供社会保障、补齐公共产品短板、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发挥好关键、主导和牵引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和自身越位缺位错位弊端。

（二）坚持创新发展，加快供给侧结构升级动力转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使社会生产动态性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使各种供给不断地适应并满足变化着的社会需求，并能不断地创造新的社会需求。这就要求建立起使企业自觉地前瞻市场和技术进步趋势，理性思考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断演进变化，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建立有利于推动市场主体顺应市场需求变化趋势，不断地推动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体系。应当说，我国经济存在的普遍性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作为生产投入的工业品和作为最终消费的商品都形成了低端消费的供给过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迅速解放，经济迅速发展和摆脱短缺经济的重大成绩。但是社会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供给和供给结构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和发展，形成不竭的良性互动，推动生产力创新发展。一是它将推动企业动态地、发展地看待市场供需转换，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适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提高竞争力。二是它将推动市场主体遵从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和比较利益原则，创造推动供给结构演变的技术驱动，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创造有效供给，从而在宏观上形成全社会的供需动态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水平总体不高，2016 年全社会研发（R&D）支出占 GDP 比重为 2.1%，科技创新投入以及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和贡献率都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它所能持有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技术储备是其保持技术、产品先进性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我国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低，技术创新能力弱，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水平不高。正是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递减，在国际分工中，我国仍处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产品附加值不高，出口竞争力下降，这也加剧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只有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改变供需错位的局面。

（三）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推动供给侧结构不断迈向动态性的高水平供需平衡

任何经济体都是由供给与需求构成的。从宏观层面上讲，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

理的两个方面，实现二者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解决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矛盾的过程。只有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相互适应、协调升级，才能推进经济协调和持续发展。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不全面的。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作为主攻方向，把资源从低效低端的领域重新配置到效率高、中高端需求大的领域，优化品牌品质，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仍然要重视加强需求管理，尤其要重视引导市场主体研究市场需求，寻找具有发展活力的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环境，稳定投资预期，这有利于改善市场供给结构，补齐市场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质量、水平的短板。

四、围绕加快培育和提高创新能力，深化细化重点改革

（一）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根基。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市场是中国发展实体经济、做实实体经济的支撑，如此巨大的市场消费容量和潜力，正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势。我们没有理由舍本求末忽视实体经济发展。近几年，以民间投资快速回落和工业投资不足为标志，我国实体经济出现较为严重地下滑。实体经济不振的原因错综复杂，需要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当前最重要的，一是坚持降低企业成本。企业成本过高、投资回报率低、投资意愿不强，是实体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有关方面测算，我国企业的总税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约为 68%，物流成本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6%，融资成本约为 13%（其中正规银行约为 9%，影子银行约为 18%），融资成本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加之近几年人工成本、用能成本以及其他各种隐性负担不断加重，相当部分实体企业利润很低，多数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不足 5%，甚至于从事制造业经营的企业多年亏损。而通过在北京卖出一两套商品房则获利上千万，难怪不少实体企业去搞房地产。在企业成本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占比又很大。所以，企业降成本既要靠市场也要靠政府。对于一些不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对一些不利于降低企业成本甚至是增加企业成本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要大胆改革。比如：住房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已经运行了近 30 年。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学习新加坡经验推进住房商品化，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房地产过度市场化和炒作已使住房公积金的作用丧失，并加重了企业负担。此外，这项制度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单位效益相对较好的，职工获得的住房公积金相对较多；单位效

益相对较差的，职工可得的住房公积金相对较少。所以，应该尽早研究公积金制度改革。二是深化金融改革和监管。防止“钱生钱”行为泛滥，强化对监管套利的制度性约束，加快推进金融在主流业务上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金融资本回报率和产业资本回报率逐步达到相对合理均衡。三是下大力气提升创新能力、消除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体制障碍。要研究制定有利于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支持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下“数据库”，进入市场和企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不少，企业发明创造的科技专利、实用新型产品也不少，但由于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没打通，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或者购买科技产品形成生产力，仍有许多体制障碍。由于存在转化风险，银行资金不愿意进入，再加上政府的支持政策和方式僵化，税收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创投基金因扭曲的利益驱动，在企业需要支持的时候不进入，一旦利益可见时又以不平等的条件争相进入，吃“唐僧肉”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和障碍，需要系统地思考、设计，整体谋划、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

（二）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

我国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体量大，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影响。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关系全局的基础性改革。由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与政府、财政、银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调整难度比一般改革要大得多，因而一直是改革进程中的“老大难”。近几年，中央推进国企改革力度明显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革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有效性也明显增强。当前，要进一步强化以下改革。

1. 继续推动国有企业回归经营主业

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产业布局结构，也包括企业内部主业与辅业之间的结构。前些年，不少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央企片面强调多元化发展战略，什么行业有利可图就发展什么，并依托国有企业拥有的政治优势，“跑马圈地”“围而不作”“贪大占地”，扭曲了资源配置，并对民营企业形成很大的挤出效应。一方面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企业经营点多面宽线长，削弱企业主业的竞争力。只有回归主业，在主业上实行专业化发展，做强做优做大主业，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既要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分离移交“三供一业”，又要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国有资产使用监督，推动国有企业剥离辅业，精干主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同质化竞争，提升专业化水平。特别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以及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领域，更要突出主业，提高

核心竞争力。

2. 进一步消除垄断藩篱

垄断导致低效和不公平竞争，也更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和寻租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削弱国有企业垄断情况有了较大改观，但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原因，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明显的垄断现象，由于垄断而缺乏创新、不愿意创新。国有企业垄断往往因其背后的政府背景，以及可能的垄断利润和“块头大”，因而银行业愿意并主动为其提供贷款。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政府需要“一碗水端平”，在完全市场化竞争领域，应倡导国企退出，至少要让民企、国企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公平竞争。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方针已定的，要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不能“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等，加快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好融合。在进一步打破国企垄断的同时，要加快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规范和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真正做到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遏制国企过度依赖银行贷款、财政、土地等方面的支持而获取不公正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国企凭借廉价的公共资源优势而形成的市场垄断局面。

3. 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去杠杆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总的债务规模和杠杆率尚不算高，但非金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国有企业杠杆率偏高既有经济发展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也有国有企业盲目扩张集中发展高资产和产能集中度高行业、跑马圈地、过度借贷、大搞房地产开发等原因。推进国企降杠杆，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一是努力稳定有市场需求和有效供给支撑的经济增长。经验表明，当经济增长下行、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时，边际收益递减，债务偿还风险会加大，债务链破裂的机率增大。因此，要十分谨慎地妥善处理好债务风险、防止债务链断裂可能引发的局部经济社会动荡的风险。在稳定增长中，控制债务增量，逐步减少债务存量，有效管控风险，来逐步化解债务矛盾。这是治本之策。二是尽可能采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修订完善《企业破产法》，依法推进“僵尸企业”有序退出，打破国企刚性兑付，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以有利于降低国企杠杆率，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三是推行市场化债转股。债转股将债务存量转化为股份，降低国企负债率，降低企业借新债还旧债“滚雪球”效应，减少国有企业债务对信贷资源的挤占，缓解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上升风险，还应借鉴上一轮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时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剥离处置银行不良资产，转移债权，专业化处置。

（三）支持民营经济尤其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制造业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活跃经济、创造市场竞争力、稳定就业和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尤其是支持其发展实体经济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当前，民营经济仍面临市场准入壁垒、创新能力不足、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其他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不公平等一系列问题。要继续在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管理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上下功夫，在基层和底层把放管服改革做实，打通“最后一公里”。要着力消除各种显性或隐性门槛，放宽市场准入，保障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一样享有同等的市场准入权利、市场竞争机会和经营规则；要研究如何解决民营经济参与公私合作（PPP）模式投资动力不足的体制性问题，调动民营企业参与 PPP 投资的积极性。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转型，增强创新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既要防止官商勾结谋私利，又要防止公职人员不作为，乱作为。要破除政府部门如同管国有企业那样管理民营企业，尤其要减少那些“开会多、填表多、检查多”等使民企不胜其烦、疲于应付的管理方式。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增强政府公信力，稳定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大力促进技术创新，创造持久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需要进一步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狠下功夫。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保护知识产权是调动和保护科技创新积极性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与形势要求和发展需要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假冒伪劣产品有禁不止，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侵权的力度不够，体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特别是进入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产权侵权容易维权难的问题更为突出。现实的情况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是企业被迫自己在做，政府部门缺乏主动作为或作为不够。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发展和利益，对侵权、仿冒、制假行为耗时费力地自行调查，既加重企业负担，影响企业创新技术开发市场的积极性，又可能形成不合法维权。因此，必须让政府成为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的主角。对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有责任，政府更有责任。因为这是保护和创造经济技术进步之源。保护知识产权是国家的公权力，也是保护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公器，国家和政府理应做好。我们应该多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将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压给政府，强化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侦查、取证、打假、处置的法律责任，形成严格问责。要加大依法打击侵权、制假、贩假的力度，及时修改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重处罚力度，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也要进一步树立大保护工作理念，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环境。

（五）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有利于调动中低收入群体创造积极性的收入分配机制

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严重影响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按劳分配制度在实践中被扭曲，基尼系数过高，一线劳动者收入过低，使低收入群体有效需求潜力无法释放出来，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稳定。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既导致社会价值取向出现混乱，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寻租腐败现象滋生，又导致国家、企业、个人收入分配体系扭曲，致使许多国家收益应收的收不到、企业应形成再生产积累的形不成（其中不少又被不合理分配制度规定下的少数高收入者吸入囊中），低收入者应该通过初次分配增加和再分配补偿得到的收益得不到。这些都应当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尽快加以解决，以便最大化地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调动社会生产积极性，重要的是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关键在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要调动企业家、一线科技人员、社会科研力量、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高素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新的发展阶段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过去比较多地依靠简单劳动、扩大投资、大量投入能源资源等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过程；是由主要依靠传统产业转向更多依靠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企业家、科技人员、优秀经营管理团队和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扩大的过程。供给侧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特征就是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明显提升，亦即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收入分配制度必须适应这一变化特征和趋势作出调整和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规模，才能构建起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进而形成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过低。据统计，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占24.3%，与发达国家占70%以上相比差距极大，也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相称，不能不说这是分配制度上出了问题。应该下决心加快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加以推进，使收入分配制度安排适应于大幅度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要求。在改革设计上，要注意加快完善以知识价值、技术技能、劳动创造真实财富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和政策，完善和规范城乡居民合理增加财产性收入制度安排，完善包括机会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形成有效合理的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为基础，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合理，三次分配为补充和稳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科学而系统性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

责任编辑：谷 岳

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伟业进行到底*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贾 康

摘要：改革开放将迎来 40 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鲜明地表现在但又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这种进步是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推陈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关和紧密结合的。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迎接现代化伟大复兴。

关键词：改革开放 40 周年 发展阶段转变 新常态 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贾康，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将迎来其 40 周年纪念。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继续实质性地推进改革开放，事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笔者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此作简要的考察与讨论。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便迅速落伍，只是当时的中国人还浑然不觉，兀自陶醉于所谓“康雍乾盛世”的“落日辉煌”之中。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这

* 本文为“改革开放 40 年”征文。

个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颓态毕现，自此一路积贫积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经甲午海战惨败、戊戌维新速夭、八国联军洗劫之后，在 20 世纪百年间，终于有三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继救亡图存的抗战胜利而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展开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中，中国人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谨慎乐观的前瞻，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为之献身的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已经“从未如此接近”。中国改革开放正在为古老中华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时也将强有力地影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正如科斯生前所评，中国的奋斗也是世界的奋斗。在最主要的相关经济体“你追我赶式”大国崛起的世界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可望成为最典型的“和平崛起”、与竞争方“共赢”的文明升级案例。

中国目前所处的进而联通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这一历史新起点，是在充满曲折坎坷、血泪歌哭、牺牲磨难、前赴后继而不懈奋斗的百余年之后，决定性地拜改革开放之功而得以达到的——前人的努力中，从不缺少悲壮、激越、舍身成仁、慷慨取义和惊天动地的英勇行为。但在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成效方面，却从未像改革开放 40 年这般，使复兴之路越走越宽，令全球瞩目。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球第 10 位之后，已一升再升而达到第 2 位，人均国民收入则已从原来的仅数百美元，不断增长至 8000 美元以上，成为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有希望在未来 10 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高瞻远瞩谋划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宏伟战略目标，在前两步已提前实现之后，未来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为阶段性节点，后以综合国力、软硬实力的持续提升为现实支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落实于“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梦想成真。在时光流逝中，我们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回归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基于对文革“十年浩劫”的拨乱反正，以及对于传统体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现代化之路的正确大方向，紧紧抓牢再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使我们得以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搞对，将各种潜藏的积极性释放，使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跟上时代，令这艘巨轮迅速驶上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并以超常规的发展来造福于中国和世界人民。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检验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发展潮流中，中国人是以改革开放的壮举，极其明显地缩小了与现代化前沿状态的距离，在追赶文明发展潮头的过程之中，意欲“后来居上”，并且顺应“大道之行”的客观规律，于创新中实现“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二、已有的巨大进步，前行的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鲜明地表现在但又决不仅限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方面，这种进步是与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文明的推陈出新、再造提升息息相关和紧密结合的。已有论者（如旭东）试图总结锐意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启动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贡献与进步。这些贡献与进步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几千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呼吁解放思想，以极大的魄力为开启民智打开了“魔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基本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指导着国人冲破原来本本主义盛行、条条框框充斥、思想观念僵化的落后愚昧状态，可称惊天动地、振聋发聩，是中国否定愚民政治、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先决性的伟大转折。尽管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仍然将“七嘴八舌、见仁见智”，思想解放中当然不可避免地还会表现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这是历史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关键性的前提。

第二，以市场化为取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直至“南巡”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通过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实施多种放权简政措施，打开无数微观主体发挥聪明才智的潜力空间，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显著地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而使神州大地迅速地改变种种落伍状态，旧貌换新颜，实力得以大增。

第三，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这一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使得社会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转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务实以实干兴邦，创新而新意迭出，摒弃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进而追求共同富裕，使物质利益原则和致富努力与承认私有产权保护等社会的投资、创业环境相得益彰，“加快致富步伐”成为积极和正面的词汇，落实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全社会广泛的实干行为中。

第四，认定闭关锁国死路一条，实行开放走向世界，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战略机遇期。相应地在外交思想上实现重大调整，从意识形态标签第一转变为国家利益第一，使中国有望从意识形态高热的国家转为走向正常国家，也得以从边缘国家逐步地和卓有成效地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

第五，在坚持基本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推法治、讲稳定、限特权、优治理，允许文学艺术领域的多样化、社会成员偏好的多元化、基层社会管理的自治化，使社会组织和运行走向现代化轨道。

第六，执政党的党内生活从残酷的政治斗争转向较温和的家长制管理，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政治生活的基本领域开启现代化进程。

第七，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废止把国民分三六九等、标明“黑五类”出身的血统论，为人权、民主等现代文明概念与规则奠定基础 and 提供前提。

第八，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恢复高考，发展教育，振兴科技，走创新型国家道路，使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发展”成为推动现代化的有力引擎。

正是以上简要提及的改革新时期从思想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诸如此类的巨大进步，引出了40年建设发展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与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数千年文明史、全球200余个经济体为参照系的全方位进步与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亟需指出，在中国业已进入的改革深水区，深化改革的难度已空前提高，“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问题所在多有，如何在“好吃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情况下，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其挑战性有目共睹。继续消除僵化观念的束缚和“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革自己的命”的极大的胆识、魄力、责任担当和高超智慧。

中国的改革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长跑，我们尚在半途，前瞻前行之路，可谓任重道远。简而言之：中国经济的总量已全球第二，但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打造升级版，尚未解决；改革启动了使许多人受益的创富运动，但如何很好地普惠于全体社会成员，尚未解决；全面法治化取向下，发扬人民民主的要求十分明确，但如何真正形成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还存在很多难题尚未解决；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取向和物质利益原则，形成充分的激励，但如何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和成功地限制“为富不仁”，仍有一系列纠结尚未解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先富”势头形成之后如何很好地调节个人、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异，有效推进“共富”进程，尚未解决；政府积极运用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以更好、更有作为地发挥其职能作用，确有必要，但以什么样的机制施行好这种政策措施而防止权力的任性与扭曲，尚未解决；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止十分值得肯定，但领导干部的“待遇终身制”如何改变，尚未解决等等。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全球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确实在开始挑战美国。表现在总量上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超越日本以后中国现在已排在世界第二。但是人们已注意到，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在美国后面占领第二位置的经济体，都会受到非常明显的“老大的打压”。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这样的压力了。真正说“超越美国”，不应认为这是仅在总量上就能够体现的一个历史过程。现在很多人都在预测，多少年以后中国

总量上将要走在美国前面。这个过程，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有可能实现。但是中国真正要超越美国，一定是主要依靠总量之外相伴随的增长质量、综合国力，还有在物质层面的种种发展支撑之上的软实力、巧实力——这涉及文化意义的、总体上带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的一种通盘实力的形成，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现在看还相距比较遥远。中国当下需要清醒意识到：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是新兴经济体的领头雁，但是在总体综合评判上，总量并不说明关键问题。美国仍然是高居于发达国家、现代经济体前列的世界头号强国；中国不过是一个表现着追赶的特征、已经有一种挑战意味的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经济体。一高一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均势，就是经济的大循环中，作为主要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利益上似乎谁都离不开谁了，但是国际竞争可不只是讲这个层面，它有更加复杂的内容。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对冲种种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发挥出来，比如说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改革和创新所焕发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实际推进到创新型国家轨道上并且在节能降耗等方面实质性地往前走，以及中国如果不能在若干年内实质性地解决在反腐败、反过度垄断方面真正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好自己的事情等等，那么这样一个质上的超越其实是很难设想的。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长期的、历史性的长跑过程，最后才能看结果的高端和底端的竞争。所以必须强调：中国今后的现代化，主要是面对一个质的挑战。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性意义的是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社会转轨中的增长质量。而且认识和评价这个质量，要进一步推升到整个民众所认同的、带有幸福感和人文评判特征的，以及其他相关文明因素相融合的一种综合考量。在“长跑”中不失时机地解决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正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时所面对的历史性考验，而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不我待。

三、现阶段改革发展的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发展阶段转变”和“矛盾凸显”相交织。在中国各地稍作些调研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在 30 余年高速增长、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正合乎一般规律地转向“新常态”的新起点。经济增长在基数今非昔比的“大规模”特征下速度不可能延续“两位数”高速增长状况，正在转为“中高速”，然而继续发展的底气和市场成长的巨大潜力，仍在各大经济体中首屈一指，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和许多农村区域，建设场景触目可及，给人印象深刻。但与此同时，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是日趋明显、咄咄逼人。雾霾已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地方某些扩大建成区的拆迁和新上马的重化工项目，一而再、再而三遇

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且往往演变成震动全局的群体事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分配问题更为凸显，差距扩大、分配不公问题不可忽视，社会心态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不少其他经济体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现过的“端起饭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追求“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的特征。

第二，经济运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在“下台阶”，从10%左右下行到6.5%~7%的区间，“新常态”的“新”已明确，而“常”还有待达到，即还未像模像样地完成触底企稳。相关的下行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即将迅速消失，老龄化社会压力正迅速到来，以及较高基数上投资“报酬递减”的影响，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难度加大等等。但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们重视与争取的，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动力源”需求释放引发的“成长引擎”效应）、科技创新红利（走创新型国家道路、跟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社会管理红利（在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等方面的基层自治、社会和谐、兴利除弊效应），而使所有这些红利能够如愿释放出来的关键，是实质性“攻坚克难”的改革能否不停留于口号而变为现实，进而可综合性地凝聚成为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已经受一系列改革洗礼但仍存在艰巨改革任务的国有企业，同业已壮大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以及可随之调动的民间智慧和潜能、活力，必须依托改革摆脱羁绊而更多贡献其“正能量”。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投融资改革、国企国资体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实在无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对冲之后，我们应力求争取的是今后尽可能长时间实现6.5%~7%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打造出结构优化的增长质量“升级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实施1994年宏观层面以财税为重点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后以“入世”锁定全面开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90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前步履维艰。党的十八大之后，高层关于“壮士断腕”的改革决心已有明确表述，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在体制内“自动手术”“自我革命”的怀疑仍未消除，且与意识形态因素的阴晴变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问题的赛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为“两只老虎的赛跑”，这两只老虎各自要素齐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对方，但都在往前跑，谁跑得更快一些，将决定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中国梦”的成败。化解既得

利益阻碍是改革的最难之处，又是我们必须面对和交出答卷的历史性的考验。

第四，力争使改革于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改革新起点和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来引领的“新常态”的关键时间安排。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发展，那么以创新驱动带来“动力转型”，以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和制度供给更有效地支持升级增质，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掌握机遇的关键。为实现中央明确给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在总体“路线图”下还要配之以多轮“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设计。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将注定成为指导改革深化中披荆斩棘过火关的又一次历史性会议。

四、全面改革中攻坚克难的压力、动力与可用经验

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的，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在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可持续增长”，这是在关乎“中国梦”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命运的经济社会转轨“未完成”，而攻坚克难的改革势不可免情况下，必须确立的重要认识和关键要领。抚今追昔，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改革环境和任务已有极大不同，然而中国经济社会的转轨仍在进行中。进入深水区，有些“石头”可能是摸不到了，显然需要更高层次的顶层规划，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届全会，正是提供了为社会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的顶层规划性质的方针指导。以此把握改革推进的方向和路径、哲理与要领，正需要继往开来，把邓小平同志南巡的创新壮举及其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解放精神元素发扬光大。

第一，从压力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刀阔斧的开拓性改革，固然是由于“十年浩劫”和传统体制弊病已生成了“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的倒逼，再乘势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现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气、义无反顾、奋发昂扬地开创新局；而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同样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迭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

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照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第二，从动力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地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已推进到使“从未如此接近”的中国梦实现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至关重要的是还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沿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 80 年代以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第三，从经验看，其实 80 年代后的改革推进中，不仅有农村改革“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高歌猛进，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试错、“价格闯关”的时机误配，以及其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的严峻社会考验，但毕竟在探索中积累着改革经验，铺垫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及其后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弱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又要超越式和建设性地处理好多种新的问题，应对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层面我们理应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改革家的改革信念与榜样力量的支持；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

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面配套改革冲过“历史三峡”， 迎接现代化伟大复兴

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邓小平同志南巡已 25 年。在经历了南巡带来的整整 20 年日新月异、年均增幅超过 10% 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在近年间步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合乎一般规律的“新常态”。在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冲击的洗礼之后，2016 年以来的国际局面，更是“黑天鹅”乱飞，国家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似乎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当下在“矛盾

凸显隐患迭加”的纠结与迷茫中，在“惟改革创新者胜”的新时代召唤中，中国尤其需要重拾邓小平同志南巡时锐意改革的闯劲、思想解放的激情。

南巡所解决的问题，在以理论语言表述“思想解放”方面讲，是终于由邓小平同志一言九鼎地说清楚，计划多一些或市场多一些都是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与手段组合问题，而不是多少年争议不休的根本制度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中国把国情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一并考虑，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求进而实现和平发展中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去意识形态”地打开了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而激发中国客观存在的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带来了以解放思想而后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奇迹”。南巡被称为“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并注定将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征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巡讲话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南巡讲话精神的时代内核却可以一言以蔽之：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文明一路发展提升的沧桑正道，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之后完成奋起直追再造辉煌的生命线，也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点睛之笔、思想精髓构成了其浓缩与示范。要发展，只有创新；要创新，就一定要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在正确把握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关键问题上决定全局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我们的“最大红利”之所在，在改革深水区“再深的水也要蹚”，要把“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担当与高超的改革智慧相结合，涉激流、过险滩、啃硬骨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攻坚克难。这些与南巡的精神内核正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集中体现在中央新近凝炼的现代发展理念的第一条：作为“第一动力”的是创新发展，以此来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作为发展归宿的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中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的同义语是思想解放前提下的制度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但在制度创新方面，我们首先要努力提升其确定性，也就是在改革深水区，在前面30余年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需要牢牢把握其基本的理念、逻辑和大方向，有胆有识、务实可行地使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深化而得到实质性推进。为此，我们亟需新一轮思想解放。

第一，需要正视已经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而求其破解。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已经用完，业已十分坚固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局限性，相当广泛地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与发展事项上，正日益凸显其惰性和阻碍作用。

但是，“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动力机制，初始就是“明确物质利益原则”而抓住发展是硬道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晚年所说，当发展起来之后，问题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比如，如何针对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部门、地方、小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级改造相关体制机制、优化再分配，已成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决不可的难题。新一轮思想解放，势必要求在继续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反思并直言不讳指出利益格局从原来的“平均主义”向新阶段的“过度分化”的演化及其相关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鉴收入再分配调节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与政策运用的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设计实施攻坚克难的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会统筹、“大部制”与“扁平化”和落实省以下分税制、以及从官员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对方方面面刻意回避的“得罪人”的难题要捅破其窗户纸，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鼓起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勇气，却正是要求改革者牺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同时中国社会必须进一步强调给改革者“有所作为”空间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更需要正视已出现的极端化思维和观点交锋中的暴戾氛围并加以矫治。信息时代的“自媒体”功能加上网上“碎片化”特征的爆炸式传播效应，正面说是使当下观点的多元化表达十分便利，反面说是使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最易吸引眼球和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思想和舆论宣传中的挑战性问题。于是在改革“步履维艰，综合疲劳”的深水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中，一方面仍应在某些“贴标签”式问题上继续把握邓小平同志称作“一大发明”的务实明智的“少争论，不争论”来引领舆论倾向；另一方面又需在无法回避争论、亦有必要深化认识的思想领域，培育和倡导理性讨论的国民素质，充分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规律。思想讨论中“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应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治理锁定“包容性发展”、国民“走向共和”的思维根基，也应构成思想解放在新阶段上文化宣传管理部门（官方）与受众（社会公众）的底线共识。习惯于官本位、行政化框架的舆论管理而作出不讲道理的硬性压制，逆党心、失民心，有百害而无一利。新的思想解放，应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中共优良传统和宪法、党章、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中，用好用足观点交流、理性讨论的坚实政治基础和巨大思想空间，鼓励创新发展，容忍试错失误，抑制恶俗弱智，开阔国民心态，从混沌中走出澄明激越、凝聚正气、催人奋进的中国“软实力”提升之路。

第三，一定要正视中国官场和社会仍然流行的一些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思维定势并力

求摒弃。明哲保身、因循守旧、偏狭嫉妒、固步自封、热衷于拉关系搞小圈子、讲排场重形式忽视内涵……凡此种种，都是改革创新的大敌，尤其是诸如此类的陋习积弊，一旦与公共权力结合，更是祸害连连，误事误人，伤国殃民，亟应排除。新的思想解放，正需针对性地引出官民思维特性的良化发展和社会风气的现代化改造，并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弘扬光大，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来支持改革、振兴中华。既然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长跑，我们就必须有充分的毅力、定力、战略耐心和百折不挠的韧性坚持，去逐步实现她；既然中央已清晰地判断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处于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关键阶段，并做出自十八大以来的顶层规划，那么攻坚克难、以全面改革冲过“历史三峡”而对接“中国梦”，就应该成为纪念改革 40 年的主线与主题；既然改革是要“把不合理的去除，把合理的树立起来使之合法化”的除旧布新过程，那么继续鼓励地方、基层、微观主体的创新试验、“摸石头过河”中的试错式首创与“自下而上”及时的经验总结，就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和“攻坚克难”中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战略方针，我们必须澄清思想迷雾，力求决战决胜。改革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进入深水区后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实质性推进，首先便是调整制度结构、优化利益格局的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是符合经济学学理并具有鲜明指向性的。实际生活里，在改革如履薄冰的艰难推进中，既有以供给侧改革为名实行非理性、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加强供给管理”的扭曲、变态、变味，也有把“供给侧改革”与“深化体制改革”对立起来而横加指责的紊乱认识。我们应以合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给管理与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相关的思想迷雾和防止以供给侧改革为名滑入“搞新计划经济”误区，把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作为决战决胜的核心任务。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将这一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我们完全有理由引用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所给出的一段著名的预言，来展望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前景：改革开放所指向的“中国梦”，已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让我们以万众一心的奋斗来迎接！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全球“宽货币”与“紧货币”的十字路口

谷源洋

摘要：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逐渐走向紧缩拐点的声音愈益增多，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新因素；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中蕴含着紧缩趋同变化；美联储加速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宏观经济形势不及美国，没有跟随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宽松货币政策已快走到尽头，开始释放出收紧的初步信号。2017年，货币政策紧缩因素增多，全球货币政策调整驶向十字路口。然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之路并不平坦，年内全球货币宽松与低利率环境难以根本改变，尚不会出现全球再通胀及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拐点，从而造成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短缺的局面。

关键词：货币宽松 货币紧缩 通胀 就业 利率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中心主任。

一、美联储从加息到缩减资产负债表

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造成资产负债表膨胀，表内资产规模从8000亿美元增至4.5万亿美元，其中国债约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约1.8万亿美元。2014年10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后，美联储对持有到期债券进行同等规模的“再投资”，维持着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变，使大量资金流向股市、楼市、产业等高风险市场，造成资产估值虚高等泡沫现象。因此，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中不得不把缩减资产负债表摆在日程上。“缩表”对美元流动性冲击以及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要比加息的

冲击更为直接，因而比起对美联储加息次数的关注，市场更加关注“再投资”缩小的启动时间。然而，美联储何时对到期资产不予“再投资”而是卖出，开始真正意义的“缩表”，以及缩小到何种程度，“缩表”与加息是什么关系，是在加息周期结束后开始“缩表”，还是在加息期间就启动“缩表”等等，在美联储内部都存在意见分歧。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委员布拉德认为，目前美联储面临缩小资产负债表的良好条件，不存在任何与过去的楼市或互联网泡沫规模类似的泡沫，美联储应该允许资产负债表开始收缩，而无需通过快速升息去抑制通胀。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有些委员则担心，“缩表”将引发长期利率上升，压低联邦基金利率的中立水平，最终制约加息节奏。纽约联储主席杜德比表示，当 FOMC 决定开始正常化资产负债表时，可能会同时决定暂停上调短期利率，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斯则认为，“缩表”进程将会与上调利率同步进行。美联储于 2017 年 4 月 5 日公布的 3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委员认为如果经济发展符合预期，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并将继续逐步上调联邦基金利率。这是美联储向市场传递“缩表”的初步预期，让资产负债表正常化意味着将加大降低货币宽松的力度。

“缩表”启动、路径及其进程，最终要看经济表现和金融状况。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新总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重短期、轻长期，不易谋长久。特朗普经济政策出台的“黄金时间窗口”是第一任期内的前两年，后两年工作重点和精力又会转向中期竞选。因此，在百日执政内，特朗普急不可待地推出贸易保护、减税和基建三大优先战略，但以“美国优先”的市场保护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减税及基建进展亦不顺利。减税及基建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国会支持尚难以预料。从美国盖洛普发表的民调数据看，对特朗普百日执政工作持肯定态度的选民比例只有 41%，创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执政百日支持率的新低。国际媒体认为“特朗普正在被现实打败”。从经济数据看，2017 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 1.2%，低于上年第四季度的 2.1%。美联储认为首季经济疲软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市场则认为通胀数据低迷是美联储加息造成的，应该改变美联储加息预期。耶伦在 2017 年 7 月 12 日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首次承认通胀指标是政策的不确定因素，美联储无需进一步升息太高，即可达到中性利率状态。市场正密切关注着耶伦的这一表态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对今明两年加息“点阵图”的改变。实际上，伴随经济政策的出台及有限度的实施，美国经济逐步走出年初的疲态，但其经济表现并不像早先预测的那么好。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5 月耐用消费品订单环比下降 1.1%，创 6 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 2017 年和 2018 年美国 GDP 增长率下调至 2.1%。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超长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渐式微，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支出成为经济的支柱。在金融危机前，美国家庭净财富一度达到66.5万亿美元，2008年缩减到56万亿美元，随后又缓步增加。截至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财富已增至94.8万亿美元。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等多种原因，家庭财富增加与消费支出增加不相匹配，2009年以来，美国消费支出年均增速只有2.3%，而金融危机前30年的平均增速为3.4%。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加联邦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基建、振兴制造业及开发传统能源等可对经济产生拉动效应，但前提条件是国会能否给予不打折扣的支持。IMF正是基于考虑到特朗普内外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和成效性，在2017年6月27日发布的年度美国经济报告中指出，长期看，美国GDP将趋于1.8%的潜在增长水平。但美联储主席耶伦认为当前美国经济表现不错，并看好美国中长期经济，预期经济持续向好、工资涨幅扩大及消费欲望增强，推动通胀率不断上涨。鉴于此，耶伦在2018年2月结束任期前，将会做出收缩资产负债表的决定。有人认为美联储既要加息又要“缩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特朗普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效应，不利于美国经济和中期选举。美联储内部有人表示10期国债收益率处于低位，^①未来进一步加息必须保持非常谨慎和耐心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2017年5月3日FOMC宣布继续将到期债券的本金用于投资，同时又指出几乎全部FOMC会的委员都同意“缩表”。6月14日，美联储在通胀走低及劳动参与率为62.7%的情况下第4次加息25个基点，并明确表示将于年内启动“缩表”，耶伦甚至声称“我们可能会相对较早地开始资产负债表正常化”。“缩表”已成大概率的事件，只是时间节点问题。一旦美联储开启“缩表”进程，即意味着卖出表内资产的同时收回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市场长期利率攀升，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冲击债市和股市，造成金融市场新的动荡，改变全球资金走向。

实际上，对美联储“缩表”亦无必要过分扰虑。其一，短期内美国经济不存在“过热”或通胀幅度超过预期的担忧。美联储预计到2017年底通胀率为1.6%，低于3月份预测的1.9%，明后两年通胀率将接近或回升至2%，这种通胀预期至少在心理上制约着美联储升息和“缩表”进程。其二，美联储即便开始“缩表”，如同削减资产购买计划和启动加息一样，采取的是“慢刹车”政策，“缩表”进程缓慢、渐进和可控，不会以激进方式“缩表”，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分紧张。按美联储已公布的“缩表”计划安排，最初将以每月100亿美元的规模缩减，其中包括60亿美元国债，4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缩

^①2017年6月，美国10期国债收益率已跌至2.12%，触及2016年11月美国大选结束以来的新低。

表”规模每三个月上调一次，直到增至每月缩减 300 亿美元国债和 200 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耶伦表示美联储公开“缩表”计划安排是为了加强与市场沟通，给市场消化“利空”的预期，使各方做好应对“缩表”的各种准备。如果按上述“缩表”路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 4.5 万亿美元缩减到 2.9 万亿美元或 2 万亿美元及以下，那么“缩表”进程将会经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种情况是“缩表”进展顺畅，美联储或许将会出售尚未到期的资产，加速“缩表”进程；另一种可能是“缩表”触发金融市场动荡，或者美国经济运行陷入停滞，美联储将会延缓甚至放弃“缩表”操作。其三，市场认为资产负债表正常化将替代部分加息，“缩表”和加息分开实施能够降低对市场的冲击力度，让市场更容易接受。“缩表”与加息对债市和股市的影响不同，两者关系及其顺序最终取决于经济表现和通胀前景。其四，“缩表”对美国经济有利有弊。弊是“缩表”势将推动长期利率上扬，加重企业融资成本及偿付美元债务负担；利是“缩表”是美联储挤出金融危机后给自己加注的水分，使“金融引领经济”回归“经济引领金融”，有利于美国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而且美联储加息及“缩表”吸引资金从海外回流美国，可减轻“缩表”加重企业融资成本的压力。

美联储从常规货币政策转向非常规货币政策，再从非常规货币政策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其所起的作用不同。非常规货币政策旨在摆脱通缩，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则是为了抑制通胀。通缩与通胀是经济发展的大敌。超低利率和负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但造成债务急剧膨胀，形成经济发展的风险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数据，过去 10 年，全球债务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急剧攀升，包括家庭、政府和公司在内的债务总额增加了 70 余万亿美元。2017 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 217 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为 56 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总和的 215%。该协会预估 2017 年新兴市场有 1.1 万亿美元的债券和贷款到期，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占债务总额的 1/5。^①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债务依然在持续增加，预计 2018 年底，将有超过 1.9 万亿美元的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 15% 是美元债券。因此，新兴市场面临偿债的巨大压力，存在“债务延期”违约风险。实践经验证明，只有提高利率，加大融资成本，才能抑制过度举债。从这一视角看，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对新兴市场具有两重作用，既加重新兴市场偿债负担，又抑制新兴市场无节制举债。美国债务总额已超出 20 万亿美元，中期内支出削减和税收改革将降低联邦财政收入，而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会使债务恶化并扩大财政赤字。耶伦对美国金融市场亦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大银行的资本状况非常强大，系统的结构已经发生重要改变，使其银行业更加安全，因而在她有生之年金融危机不会重演。

^①资料来源：《全球债务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飙升》，英国《每日电讯报》2017 年 4 月 4 日。

二、欧洲央行面临“去宽松”压力， 短期内不会违逆宽松货币政策

相比美联储，欧洲央行基于宏观经济表现不及美国，没有跟随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反之，在宽松道路上走得更远，不仅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而且实施负利率政策，以应对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

欧洲央行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维持隔夜存款负利率及每月购买债券规模为 800 亿欧元不变，旨在鼓励银行扩大放贷，提振过低的通胀水平。由于前期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对内需的拉动，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回暖，欧元持续走软及外部需求的阶段性恢复等，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形势好于市场预期。2016 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1.8% 与 1.7%，失业率降至 9.6%。但欧洲央行并未放弃宽松刺激政策，并在 2016 年 12 月将原定于 2017 年 3 月到期的“购债计划”延长 9 个月。步入 2017 年欧元区经济持续向好，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2017 年 3 月宣称“欧洲央行已战胜通缩，正朝着结束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迈进”；宣布从 2017 年 4 月起，将每月 800 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缩减为每月 600 亿欧元。面对上述形势变化，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应该退出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但德拉吉对货币政策持谨慎态度，宣称欧洲央行不会因为“个别数据和通胀率暂时上扬”就立即给出收缩货币反应。欧元区通胀率上升主要是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依然很低，保持在 1% 之内，现时削减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尚为时过早。

在 2017 年 6 月 8 日欧洲央行理事会会议后，德拉吉表示“欧元区的经济扩张将略快于此此前预期”，把 2017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上调至 1.9%。经济形势改善使 4 月的失业率降至 9.3%，创 2009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在上调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欧洲央行却下调了通胀预期，将 2017 年欧元区的通胀率从 1.7% 降至 1.5%；2018 年的通胀预期从 1.6% 下调至 1.3%；2019 年的通胀预期从 1.7% 下调至 1.6%。在经济增速上行，通胀率不及 2% 的形势下，欧洲央行只好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亦即将再融资利率、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分别维持在 0.0%、0.25% 和负 0.4% 不变，并维持每月 600 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

然而，德拉吉又在多个场合指出货币政策调整已经走到极限，仅靠货币政策刺激已经难以真正解决欧洲经济问题，呼吁各成员国应出台配套措施，但各方反应并不强烈。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欧盟实行财政“瘦身”政策，财政宽松的余地和空间相当有限，实际上只能继续依靠货币政策。然而，QE 的边际效应逐渐式微，负利率对银行业的负面效应不断积累，欧元贬值造成各国实际有效汇率不均衡，美联储加息预期导致资金流出等

因素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欧元区内部发展的失衡及政治的不稳定性。由于 QE 对欧元区各国影响不一，因而对“宽货币”抑或“紧货币”态度存在差异。以德国为首的“货币鹰派”不断施压欧洲央行应尽早收紧货币政策。魏德曼行长声称当物价压力再次上升时，欧洲央行管委会需要采取行动，包括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但是，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则希望欧洲央行继续加码 QE 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拖延债务兑付危机爆发时间，换取经济复苏和改善财政状况的空间。^① 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谈判业已达成协议，经济渐趋稳定，市场对希腊拖累欧洲经济的担心减弱。特别是西班牙经济有较为明显起色，预计 2017 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超出 2%。意大利经济虽仍在衰退中挣扎，但出现转机，开始复苏。整个欧洲经济，包括英国经济均强于市场预期，但并不稳定，依然脆弱，经不起风吹草动。如果欧洲央行贸然收缩货币政策，可能会使刚刚好转的经济再度蒙上阴霾。因此，当下欧洲央行依然选择偏鸽派立场，倾向于延续 QE。但在鹰派调整货币政策强大压力下，德拉吉已不再提及如果有需要的话，欧洲央行将愿意“动用现有授权中可以用的所有工具”，并在讲话中删除了“进一步降息”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央行在 2017 年 4 月发布的季度调查报告中指出，尽管大多数银行在当前季度维持贷款条件不变，但计划收紧对企业信贷条件的欧元区银行数量已经超过计划放宽的银行，表明货币宽松的“火力”已经大不如前。

英国“脱欧”公投前，其经济形势不错，英国央行曾一度考虑收紧货币政策，甚至要比美联储更早提升利率。但“脱欧”公投后，经济和金融风险上升，英镑贬价值价上涨，家庭实际收入受到通胀高企挤压，消费支出放缓。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称“现在还不是提高利率的合适时机”，但将考虑“部分退出刺激措施”。基于英国通胀形势不同于欧元区，英国央行正在酝酿调整货币政策。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7 年 6 月 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通胀水平持续上升，5 月通胀率已升至 2.9%，高于 4 月的 2.7%，持续超出英国央行 2% 的通胀目标，创 2013 年 6 月以来新高。因此，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虽以简单多数维持 0.25% 的基准利率不变，但支持提高利率或主张改变利率政策的委员增多，提高利率的概率趋强。英国央行的一些委员已开始提醒英国家庭应该为央行在某个时间点加息而做准备。由于英国通胀上升主要是由英镑走弱而不是经济过热所致，因而短期内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英国通胀走高使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更加坚定地认为“通缩力量已被再通胀力量取代”。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是欧洲央行将从何时起步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其实，早在 2015 年初，欧洲央行就曾表示过，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2016 年将逐渐减小购买国债规模，2017 年或许可以退出 QE。然而，

^①陈植：《全球通胀抬头》，《21 世纪经济报道》2017 年 2 月 15 日。

这些承诺都没有成为现实。当下欧洲央行正在货币宽松抑或货币紧缩之间进行平衡，伴随欧洲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欧洲央行已经并将继续逐步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为2018年或2019年加息做铺垫准备。总体看，欧洲央行进入“政策纠结期”，未来货币政策变化路径类似于美联储的做法，以通胀率、就业率、增长率等“经济数据变化”为依据，逐步减少金融市场流动性，并在退出QE后，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低利率。

三、日本央行不为外部形势变化所动， 延续量化与质化宽松货币政策

自黑田东彦任行长以来，日本央行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量化与质化宽松安排(QQE)。截至2017年5月底，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为500.8万亿日元，约合4.48亿美元，即将超过美联储。QQE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扩大基础货币供给直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超越2%的目标，并稳定在2%以上；二是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调节短期及长期利率，持续购买日本债券直到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零附近。但在实施过程中“量化多，质化少”。QE促使日本通胀率由负转正，但随消费税上调及国际油价下跌，QE对提升通胀率的作用日渐式微，导致日本经济复苏状况不如欧盟与欧元区，更逊于美国。因此，日本央行在扩大基础货币基础上实施负利率政策，亦即“QE+负利率”，并反复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于负0.1%水平不变，维持资产购买规模于800万亿日元不变”。但“800万亿日元的购债规模和负0.1%的基准利率”依然未能使通胀率上升到2%的水平，日本央行被迫多次向后推延通胀率达标的时间。黑田东彦行长声称坚持不懈的推进强有力的金融宽松政策比什么都重要，并誓言只要通胀率达不到2%或以上的目标，就将货币刺激政策继续下去。

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由于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仍未能推高通胀，2016年9月21日，日本央行在议息会议后，开始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强调“数量宽松”政策已走到尽头、达到极限，因而将货币政策的侧重点从原先的扩大货币供应目标，转向收益率曲线控制的质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控制收益率曲线的真实意图是要表明当前央行确定的利率是适宜的，暗示市场不要过度追求更低的利率。控制收益率曲线引起多种猜想，有人认为收益率曲线控制是“日本央行变相紧缩货币的信号”，有人认为收益率曲线控制的实质不是一种变相收紧货币宽松政策，而是“假收缩、真宽松”政策，日本央行并没有真正从“量化转向质化”。还有人认为收益率曲线控制只能视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度产物”，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收缩货币政策，而是改变QE资金购买方式从而刺激经济发展”。^①

^①何晶晶：《日本央行QQE新政引猜想》，《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9月22日。

实际上，QQE 侧重点虽说转向“质化”，可日本央行并未抛弃“量化”。2017 年 1 月，日本央行就宣布将“购债计划延长一年”，并于 2 月再次祭出“数量宽松”措施，购买了 2000 亿日元的政府债券（期限为 10~25 年）。这一举动释放出三重用意：央行向市场传递没有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央行面对操纵汇率的重压，不会与特朗普政府签署新“广场协议”；央行的 QE 导致日元弱势，出口增加，但这并非竞争性货币贬值。

黑田东彦行长的理论逻辑推论是实现了 2% 的通胀目标，日本民众就会把钱从银行账户中取出来，进行消费甚至透支消费以及增加投资，形成内生性经济增长。在这种理论思想引导下，日本央行是否改变 QQE 政策，步入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其关键点仍在于通胀变化趋势。但日本经济仍处于低速、缓慢复苏阶段，日本央行 2017 年 7 月 10 日公布的地区经济季度报告指出，日本 6 个地区的经济“适度扩张”或“朝适度扩张的方向迈进”。2016 年和 2017 年实际 GDP 增长率略高于 1%。^① 在经济和通胀没有明显上升前，日本央行大幅调整货币取向的概率极小，依然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也不会扩大刺激计划。即便是美联储加速升息频率，日本央行也不会跟随上调利率目标。黑田东彦行长 2017 年 3 月 21 日在国会发言时表示，美联储再度加息驱动全球债券收益率曲线上移，但对日本央行而言，加息还为时过早。IMF 的报告建议年内日本央行应维持货币政策宽松，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较高的通胀水平。^②

相比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欧日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紧迫感远低于美联储。究其原因：欧洲、日本央行通胀率尽管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央行设定的通胀目标值，收紧货币政策的动力显得不足；2017 年欧洲面临民粹主义抬头和多国大选，欧洲央行试图延续当前的 QE 政策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③ 力阻民粹主义和极右政党胜选执政，因而多次宣布维持现有货币宽松措施不变。但欧日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日趋缩小，未必能在宽松征途上走得很远，而且美联储加快升息步伐，有可能“倒逼”欧日央行不得不做出一点紧缩举动，确保欧元和日元与其美元利差不会拉开过大差距，导致资金外流。在内外货币政策转向压力下，黑田东彦表示日本央行有能力平稳地结束当前的 QE，包括降低资产负债表规模，^④ 并指出当央行决定结束 QE 时，可能采取的备选方案之一将是上调超额准备金利率。黑田东彦的表述说明尽管日本央行维持货币政策不

① 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对 2017 年度实际 GDP 增长率的预期值均为 1.5%，而 ESP 跟踪调查及主要智库预测平均值为 1.0%~1.2%。

② IMF 2017 年 6 月 19 日发布的报告。

③ 陈植：《全球通胀抬头》，21 世纪经济报道 2017 年 2 月 15 日。

④ 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超过 500 万亿日元，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大体相当。详见路透社东京 2017 年 6 月 2 日电。

变，继续每年从金融机构购买 800 万亿日元资产额度，以尽快实现其设定的 2% 通胀目标，但已在考虑货币政策的转向问题。鉴于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已超过整个市场的 42%，今后央行购买国债规模有可能缩减。一旦欧日央行转向收紧货币政策，那么全球货币市场又会出现新的变化，亦即从欧元、日元流向美元套取利差收益的巨额资金就会回流，造成美元冲高回跌，欧元与日元被动上涨。

四、新兴经济体的反应各不相同

新兴市场经济状况不同，在美联储连续加息后，有的降息，有的加息，有的维持利率不变。香港受制于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或较高的外资依赖度，因而香港金融管理局紧随美联储而加息。美联储 2017 年 3 月第三次加息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同向”，随即上调逆回购中标利率。中标利率上调不是真正加息，但利于金融去杠杆。此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占款降幅有所收窄；外汇储备又在增加；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影响弱化。因此，在 2017 年 6 月美联储第四次决定加息后，中国央行没有采取跟进举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央行的政策选择。在中美货币政策变化的过程中，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即将高于中国，人民币仍面临贬值压力，需要防止资金非正常流出；美国通胀继续温和爬升，中国通胀继续超出美国。通胀过低或过高都会抑制经济增长。考虑到现实的通胀及通胀预期，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应以控制通胀为主，兼顾转型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是否需要加息需视通胀上涨幅度及资金流出状况而定。

五、全球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将开启新的危机

未来 4~5 年，世界经济核心问题是全球货币政策调整的转向，世界经济脉动将随全球货币政策转向而变化。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是松是紧？取决于各国的通胀情况，而通胀与经济增长、就业、收入、消费需求及国际油价等紧密相联；取决于美联储货币正常化的进度与强度。当前，不少国家央行陷入两难境地：经济数据向好及美联储加息节奏加快，使得央行缺少继续“放水”的理由和动力，但经济发展并不强劲，甚至有的国家经济在下挫，远没有达到可以放松货币政策的地步，不存在立即效法美联储货币紧缩措施的条件和可能。即便欧元区和日本在内外重压下出台一些紧缩措施，但货币政策总基调依然是宽松，“全球超宽松货币时代”尚未结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仍分化。然而，世界经济毕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包括全球经济趋于活跃、改善、提

速；^① 国际贸易改善，国际投资增加；美联储加快升息频率，全球利率向上和流动性偏紧；强美元“显乏”及需求增加促其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适当“暖度”；各央行资产负债表膨胀，债务存量和增量上升以及“特朗普行情”加速全球通货膨胀升温。上述因素使得全球货币政策分化中蕴含着紧缩趋同变化，全球货币政策收紧预期正在升温，全球流动性持续扩张已接近尾部。世界经济或许有可能逐渐改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局面。

然而，我们亦应看到世界经济的其他一些现实状况：一是 IMF 等机构虽然纷纷上调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并预测 2018 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提速，但世界经济远未出现 G20 所期待的“强劲、可持续、均衡、包容增长”的态势，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依然在威胁着全球经济复苏，抑制着全球总需求；逆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加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经济领域矛盾与摩擦增多；各国经济增长、通胀和就业水平等关键数据存在明显差异，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不同，尤其结构改革进展迟缓；全球经济治理和各国货币政策协调不力、合力不足；美联储还没有完成货币正常化的目标，短期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难以大幅提高，^② 甚至还在下降。二是伴随发达经济体经济形势基本同步趋好，失业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劳动参与率不增反降，抑制着消费需求欲望。三是多数发达经济体下调通胀率预期。花旗银行曾预测 2017 年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将由 2016 年的 0.8% 上升至 2%，达到 2012 年以来最高水平。实际上，美国、欧元区、日本、瑞士等央行都在下调通胀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依然较低，没有达到 2% 的目标。^③ 四是石油是人类生产生活最重要的原材料，其价格变化影响各国的物价水平。油价上涨会给原油进口国带来输入型通胀。从近期国际油价走势看，原油价格从 2011 年以来持续下降，2016 年第一季度曾跌破每桶 26 美元，此后由于 OPEC 减产等多种因素的出现推动油价反弹至每桶 50 美元上下，驱使全球通胀呈现上升趋势。然而，在多重利空因素袭击下，国际油价又掉头向下，站在“中性价格”下方，阻止了全球再通胀的势头。上述因素影响了发达国家收缩货币政策的步伐和力度，全球金融市场依然处于分化与动荡之中。

^① 各国际金融机构对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不尽相同，但共同点是世界经济增速高于 201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3.5%，2018 年为 3.6%。

^②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数据显示，2011 年到 2015 年，美国年均劳动生产率增幅只有 0.34%，远低于 1990 年到 2010 年间 1.93% 的水平。该机构预测 2016 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可能出现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首次下降，降幅为 0.2%。

^③ 经合组织在 2017 年 7 月 4 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二十国集团的通胀率从 4 月的 2.4% 下降至 5 月的 2.1%，已连续 4 个月下滑。

权衡各种正反因素，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因素增多，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走高，流动性趋紧，全球货币政策调整逐渐驶向十字路口，但年内全球低利率环境难以改变。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程度虽有所降低，但并不显得太紧，不会出现全球货币政策从宽松走向紧缩的拐点，造成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短缺的局面。只要美联储加息有度、有序，新兴市场有备、不断适应和消化，就不会重现 2013 年的大动荡局面。而且世界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整体复苏，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同步走高，使新兴市场成为受惠市场，新兴市场再次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2017 年流入新兴市场的非本地居民资本有望达到 970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35%，比其 2 月预测增加 2900 亿美元。该协会的报告还指出，2018 年流入新兴市场的非本地居民资本预计将突破 1 万亿美元，创 2014 年“吸金”纪录。在 2013—2015 年离开新兴市场的资金，到 2016 年底已有 1/3 左右的资金回流。由于发达市场需求上升、商品价格在波动中依然高于上年以及美元指数走低，2017 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为 4.5%~4.7%，^① 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使其新兴市场股市和债市具有较强的吸引力。随着经济基本面改善、货币强劲反弹，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新兴市场。与此同时，许多新兴市场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对外国融资的依赖有所降低，对资金突然外流的风险敞口相应变小，能应对美国周期性的货币收紧政策和较为强势的美元冲击。然而，新兴市场整体依然面临净资本流出的现实，预计 2017 年涵盖居民和非居民在内的净资本流出将高达 1300 亿美元。而且新兴市场经济、股市呈现分化趋势，那些资源型国家、拥有“双赤字”国家、外债率居高的国家，易受到美国等货币政策转向的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对存在的金融风险点，我们一定要胸中有数，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② 世界最主要的风险是金融风险，如果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过于激进，沟通不畅，应对不利，一场新危机或许渐行渐近，某机构已提示要警惕全球中期衰退风险，不管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大还是小，各国需要做好应对新危机的准备。

责任编辑：谷 岳

^①IMF 预测，2017 年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率为 4.5%，摩根大通的预测值为 4.7%。

^②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经济持续复苏 扩张基础薄弱

——2017 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国家统计局释经组*

摘要：2017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不同程度复苏，主要经济领域持续改善，世界经济增速稳定，活力增强，总体保持了持续复苏的态势。但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复苏基础并不稳固，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预计 2017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继续复苏，但步伐不会太快。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严峻，需要密切关注，妥善应对。

关键词：世界经济 复苏态势 经济预测

2017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不同程度复苏，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欧元区经济运行平稳，日本经济温和扩张，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总体增长稳定。主要经济领域持续改善，世界工业生产增速加快，世界贸易日趋活跃，全球通胀水平适中，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世界经济增速稳定，活力增强，总体保持了持续复苏的态势。但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复苏基础并不稳固，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复杂。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情况

（一）美国经济复苏加快

2017 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速逐季加快，工业生产加速增长，国内消费增长强劲，房地产市场保持繁荣，对外贸易持续好转，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市场运行态势良好。

经济增速加快。2017 年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增长 2.6%，比一季度加快 1.4 个百分点。GDP 同比增长 2.1%，比一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是 2015

* 成员包括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王军、郑泽香、石婷、张国洪、陈璇璇、徐齐利、王璟。

年四季度以来最快增速。据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NOW 模型最新预测（2017 年 8 月 16 日），预计 2017 年三季度美国 GDP 环比折年率将增长 3.8%，比二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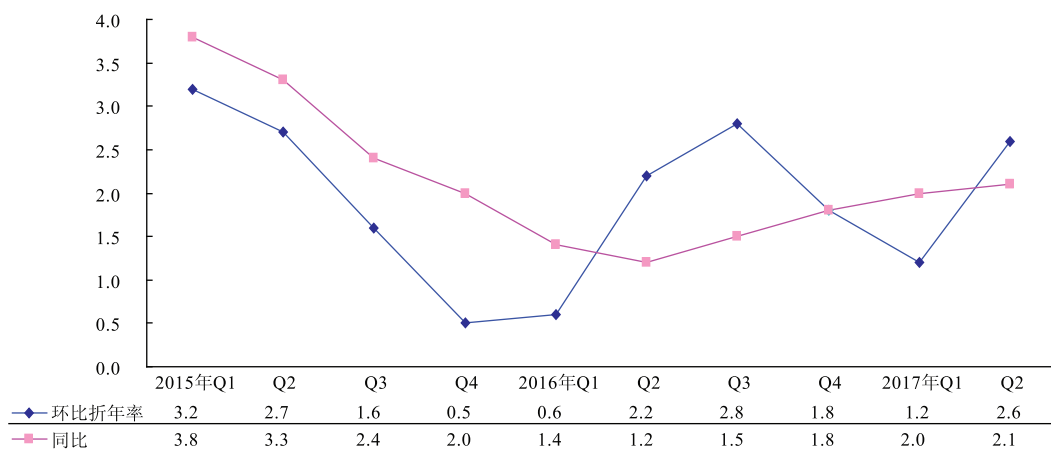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17 年二季度美国 GDP 年度及季度增长率 (%)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工业生产加速扩张。2017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中加快，同比增长 1%，分月同比增速从 2 月份的 0.3% 加快至 6 月份的 1.8%；制造业生产同比增长 0.7%，分月同比增速从 1 月份的 0.4% 加快至 6 月份的 1.1%。工业产能利用率稳步回升，从 1 月份的 75.7% 升至 6 月份的 76.6%，明显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国内消费强劲增长。2017 年上半年，零售额保持较高增速，同比增长 4.4%，比上年同期加快 1.3 个百分点。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2.8%，比上年同期加快 0.2 个百分点。

房地产市场保持繁荣。2017 年上半年，美国房地产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建筑市场继续温和上涨，销售量和价格稳定走高。新房开工量（折年率，下同）同比增长 3.9%。建筑许可证发放量同比增长 5.6%。现房销售量同比增长 3.3%，现房价格同比上涨 6.5%。

对外贸易持续好转。2017 年上半年，美国实现出口额 115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6%；进口额 142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共实现贸易逆差 2766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 2499 亿美元扩大了 10.7%。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017 年上半年，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2%，比上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0%，比上年同期收窄 0.2 个百分点；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2.2%，比上年同期扩大 2.1 个百分点。

就业市场温和扩张。2017 年 1—5 月，失业率从 4.8% 回落至 4.3%，创 16 年来新低；6 月份失业率小幅回升 0.1 个百分点至 4.4%。2017 年上半年，非农就业人数平均月净增 17.2 万人。

（二）欧元区经济运行平稳

2017 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工业生产低速增长，消费逐步改善，对外贸易保持活跃，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市场持续改善。

经济增速加快。2017 年二季度，欧元区 GDP 环比增长 0.6%，比上季度加快 0.1 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2.1%，比上季加快 0.2 个百分点。上半年，GDP 同比增长 2.0%，比上年同期加快 0.1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6%，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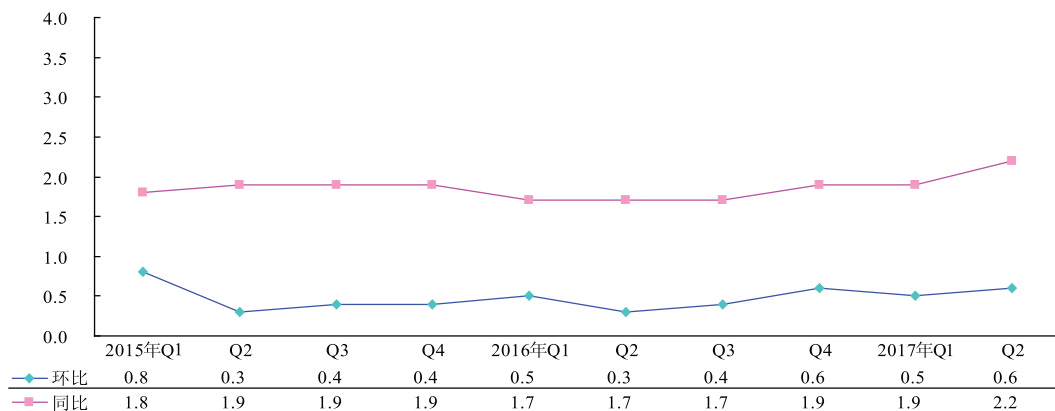


图 2 2015—2017 年二季度欧元区 GDP 年度及季度增长率 (%)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工业生产低速增长。2017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2.0%，比上年同期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同比增长 2.0%，比上年同期加快 0.4 个百分点。

消费明显改善。2017 年上半年，欧元区零售量同比增长 2.3%，分月增速逐月加快，从 1 月份的 1.3% 加快至 6 月份的 3.1%。新车登记数同比增长 5.3%，其中 6 月增速高达 6.5%。

对外贸易保持活跃。2017 年上半年，欧元区出口额 10871 亿欧元，同比增长 8.1%；进口额 9794 亿欧元，同比增长 11.6%。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与欧元区内需强劲反弹是其外贸保持活跃的主要因素。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017 年上半年，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7%；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3.8%，均明显好于上年同期。温和的通胀水平为欧洲央行的低利率政策留出了空间。

就业市场持续改善。2017 年上半年，失业率逐月回落，从 1 月份的 9.6% 回落至 6 月份的 9.1%，创危机以来新低；同期，失业人数从 1552 万人回落至 1472 万人。

市场信心表现强劲。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自 2016 年 5 月 (50.7) 触底反弹后，一路走高，至 2017 年 6 月达到 57.4 的高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自 2016 年 8 月 (51.0) 触底反弹后，也一路高开，至 2017 年 6 月回升至 55.4 的高水平。消费方面，消

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17年2月-6.4的低谷一路走高，至6月份已达-1.3，比上年同期的-7.3明显改善。

（三）日本经济温和扩张

2017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速加快，工业生产加速增长，消费趋于好转，对外贸易保持活跃，消费价格上涨缓慢，就业市场保持稳定，市场信心平稳向好。但房地产市场仍显低迷。

日本经济增速加快。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17年二季度GDP环比增长1%，比一季度加快0.6个百分点（一季度GDP增速上调0.1个百分点至0.4%），是2015年二季度以来最快增速；二季度GDP同比增长2%，比一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一季度同比增速上调0.2个百分点至1.5%）。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当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加快，以及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民间最终消费支出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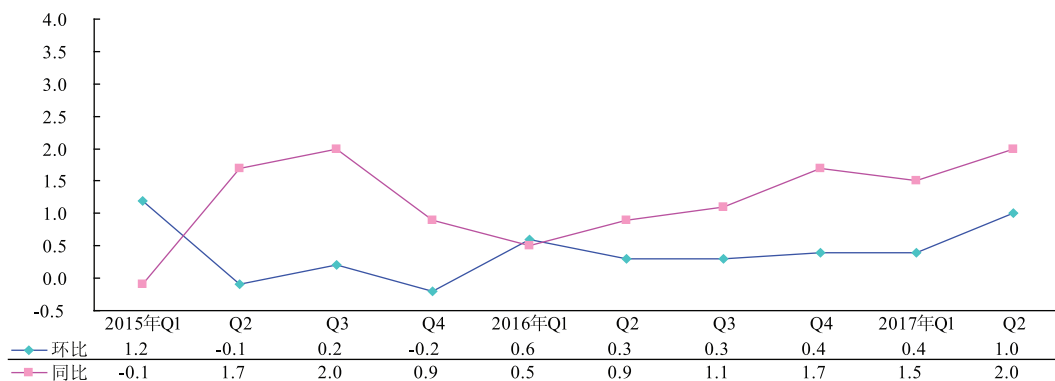


图3 2015—2017年二季度日本GDP季度增长率(%)

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

工业生产加速增长。2017年上半年，日本工业生产同比增长4.8%，从1月份同比增长3.2%增加至6月份同比增长5.5%，总体呈加速增长态势。其中，5月份，同比增长6.5%，为2015年以来最高。

消费趋于好转。2017年上半年，日本零售额同比增长1.8%，明显好于上年同期（下降0.9%）。分月看，零售额同比增速逐月加快，从1月份的1%加快至6月份的2.1%。2017年上半年，新车登记数同比增长10.2%，其中，4、5、6月份均保持两位数增长，6月份增长15.1%，比上月加快了1.7个百分点，为年内最高。2017年上半年，消费情况不断好转，家庭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从1月份的下降1.2%转为6月份的上涨2.3%。

房地产市场低迷。2017年上半年，日本新房开工量平均为7.9万套，同比增长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3.1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仍显低迷。其中，6月份，新房开工量合计

为 8.7 万套，同比增长 1.7%，自有用新房开工量为 2.6 万套，同比下降 3.4%，租赁用新房开工量为 3.6 万套，同比下降 2.6%，销售用新房开工量 2.5 万套，同比增长 15.5%。

对外贸易保持活跃。2017 年上半年，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 9.4%，进口额同比增长 12.4%。其中，6 月份，日本出口额为 66084 亿日元，同比增长 9.7%，比上月下降 5.2%；进口额为 61686 亿日元，同比增长 15.5%，比上月下降 2.4%；净出口额为 4398 亿日元。从上半年进出口额总体变化趋势情况来看，日本对外贸易仍保持活跃状态。

消费价格上涨缓慢。2017 年上半年，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4%，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0.2%，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6%。其中，6 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4%，与 4、5 月增速保持一致，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0.2%，连续 5 个月负增长，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1%，与 4、5 月增速保持相同水平。

就业市场保持稳定。新增就业人数稳定增长。2017 年上半年，日本新增就业人数比为 2.2%，比上年同期上涨 0.2 个百分点。失业率继续回落。2017 年上半年，日本失业率为 2.9%，比上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分月看，失业率从 1 月份的 3.0% 下降到 6 月份的 2.8%。

（四）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总体增长稳定

2017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所加快。印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一季度增长 6.1%，比上季度放缓 0.9 个百分点，主要是短期因素（废币）所致；俄罗斯一季度增长 0.5%，二季度增长 2.5%，已连续三个季度正增长；南非经济缓慢回升，一季度增长 1%，比上季度加快 0.3 个百分点；巴西仍未摆脱衰退，一季度降幅为 0.4%，已连续 9 个季度负增长，但降幅比上一个季度收窄 2.1 个百分点。二季度，越南经济增长 6.2%，比一季度加快 1.1 个百分点；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和波兰分别增长 5.0%、5.8%、2.7%、2.5% 和 3.9%，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墨西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分别增长 1.8%、3.8% 和 2.1%，比一季度回落 1、0.5 和 0.5 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2017 年上半年，俄罗斯、巴西、南非、马来西亚、波兰、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经济体经济均比上年同期有所提速。

对外贸易增长强劲，但二季度比一季度略有放缓。2017 年上半年，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进出口额同比增长分别为 22.5%、28.7%、18.3% 和 14.2%；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越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增长速度也均超过两位数。分季度来看，除了越南保持高速增长、印度和韩国保持稳定外，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二季度比一季度进出口额增速均有所放缓。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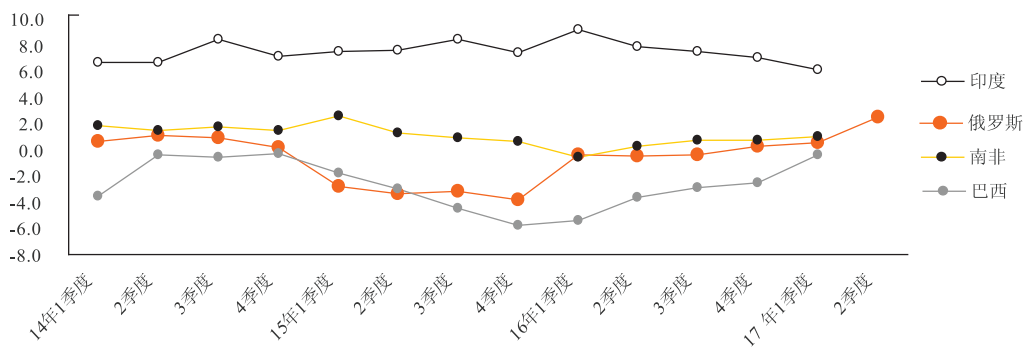


图 4 2014—2017 年二季度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 GDP 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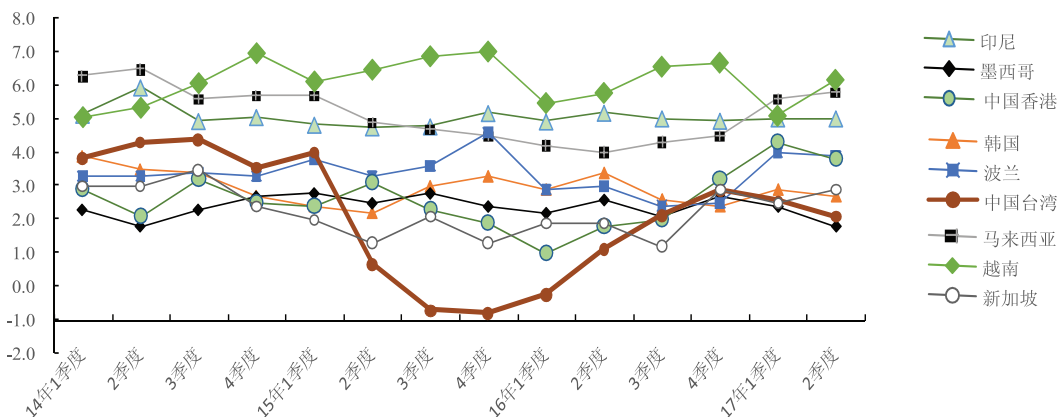


图 5 2014—2017 年二季度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 GDP 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加坡二季度比一季度增速下滑均超过 6 个百分点；印尼下滑最为严重，下降幅度超过 11 个百分点。

通胀水平适中。2017 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消费价格整体适中。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分别回落到了 3%、4% 和 5% 左右，回归到正常水平。但墨西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6 月份，消费价格上涨 6.3%，为 2009 年以来的新高。

就业总体稳定。2017 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就业情况总体稳定，但南非和巴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南非失业率重返 2004 年以来的新高，一季度同比达到了 27.7%。巴西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上半年均维持在 13% 以上，是正常年份的两倍。

制造业 PMI 冲高回落。2017 年上半年，跟踪监测的 13 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制造业 PMI 平均值达到一季度 51.2 的高点后，二季度回落到了 51.0，呈微幅回落走势，但仍位于扩张区间，且整体形势明显好于 2016 年一季度的 49.3 和第二季度的 49.8。分国家来看，

韩国和马来西亚一、二季度平均值均在荣枯线以下，巴西和南非则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触及荣枯线以下。从 7 月份制造业 PMI 数据来看，进入荣枯线以下的经济体有所增加，已达到 5 个，分别是南非、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韩国。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呈缓慢走低的态势。

二、世界经济主要领域运行情况

(一) 世界工业生产增速加快

2017 年上半年，世界工业生产同比增长 4.1%，比上年同期加快 2.6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同比增长 2.6%，比上年同期加快 2.8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同比增长 5.7%，比上年同期加快 1.6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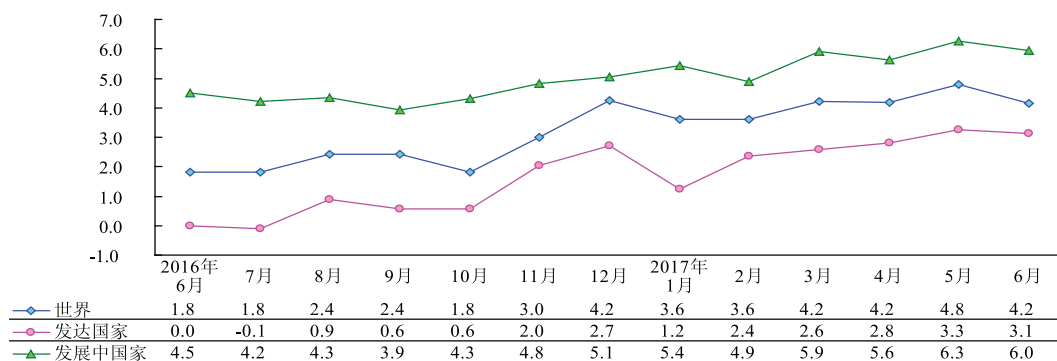


图 6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 世界贸易日趋活跃

贸易量稳定增长。2017 年 1—5 月，世界贸易量同比增长 2.9%，比上年同期加快 1.6 个百分点。5 月份同比增长 3.5%，为年内最快增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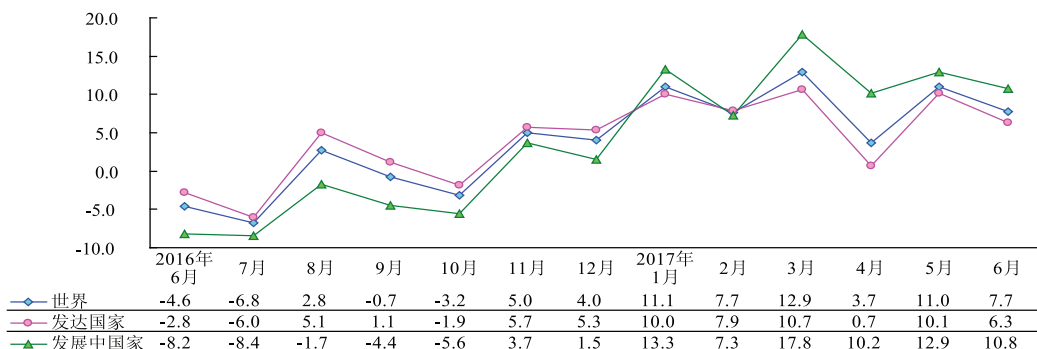


图 7 2016 年 6 月—2017 年 6 月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额增长率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贸易额持续增长。从出口看，2017年1—6月，世界同比增长9%，上年同期为下降6%；发达国家同比增长7.6%，发展中国家同比增长12%，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8%和10.2%。从进口看，2017年1—6月，世界同比增长8.9%，上年同期为下降5.1%；发达国家同比增长7.5%，发展中国家同比增长16%，上年同期分别下降4.3%和8.8%。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波动回升。2017年上半年，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波动明显，从1月3日的953点升至3月29日的年中高点1338点，后又回落至6月30日的901点。近期，该指数明显回升，8月21日升至1266点，逼近年中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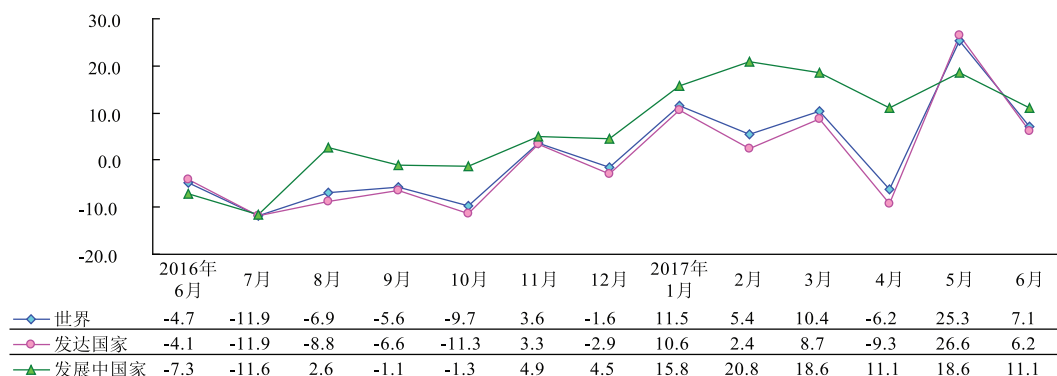


图8 2016年6月—2017年6月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额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 初级产品价格低位波动

2017年1—6月，国际能源平均价格指数为65.9，同比上涨33.5%；非能源平均价格指数为84.1，同比上涨7.2%。其中，农产品和原材料平均价格指数分别为89.4和83.2，同比上涨1.8%和3.7%；化肥平均价格指数为72.6，同比下跌7.9%；金属和矿产平均价格指数为74.6，同比上涨25.7%。6月份，国际能源价格指数为60.4（2010年=100），比年初下跌12.3%；非能源价格指数为82（2010年=100），比年初下跌4.1%。

原油价格下跌。2017年上半年，受市场供大于求及短期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下跌14%。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协议执行率不足，6月份产油量增加；二是中东政治局势不稳，如沙特废黜王储及卡塔尔深陷外交困局等事件；三是美国页岩油产量不断增加，活跃的钻井平台数持续上升。美国原油商业库存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下跌后于二季度开始回升，美国原油出口总额也创下新高。2017年下半年，页岩油产量预期加大、全球油需疲软及中东政治局势动荡，油价走势有待进一步观察。

(四) 全球通胀水平适中

2017年上半年，全球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其中，发达国家上涨1.6%，发展中国

家上涨 3.3%。全球通胀水平适中为全球经济复苏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物价环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刺激本国的消费留有足够空间。

表 1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表

商品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名义价格指数 (2010年=100)														
能源	64.9	59.4	56.6	57.6	58.2	63.7	59.4	68.4	68.9	69.4	65.3	67.1	64.3	60.4
非能源	82.4	82.5	82.2	81.6	81.0	80.8	83.5	83.8	85.5	86.6	85.0	82.8	83.0	82.0
农产品	89.3	93.8	91.9	90.9	90.5	89.5	89.9	89.4	91.3	91.3	89.2	87.7	89.2	87.7
饮料	93.5	93.8	95.2	94.1	94.8	94.6	93.8	87.1	88.3	85.0	84.3	83.0	82.3	81.7
食品	90.9	98.9	95.8	94.5	93.6	92.8	93.2	93.1	95.2	95.1	92.7	90.8	92.9	91.9
油类	85.2	98.3	93.8	93.3	91.6	89.8	92.0	94.2	96.2	94.5	90.2	86.4	88.3	85.2
谷物	88.8	90.3	83.6	78.7	76.5	76.5	76.0	75.9	79.0	79.1	78.4	79.8	84.4	87.6
其他食品	100.3	107.3	109.6	110.5	111.7	111.6	110.4	107.2	108.4	110.5	109.0	106.6	106.6	104.5
原材料	83.3	81.7	80.6	80.5	80.7	78.8	79.8	81.6	83.6	85.4	83.0	82.7	83.6	80.6
木材	96.1	93.6	88.6	89.0	89.0	84.6	84.1	82.8	82.2	83.4	82.7	84.7	85.8	85.4
其他原材料	69.3	68.7	71.9	71.3	71.5	72.6	75.2	80.2	85.1	87.5	83.3	80.6	81.2	75.5
化肥	95.4	74.8	71.1	70.7	71.2	71.3	72.8	73.2	76.4	77.1	75.7	71.2	67.1	68.2
金属和矿产	66.9	60.3	63.5	63.8	62.8	64.1	71.5	73.5	74.5	77.9	77.3	74.0	72.2	71.7
环比上涨率: %														
能源	-45.1	5.0	-4.8	1.8	1.0	9.5	-6.8	15.1	0.7	0.8	-5.9	2.7	-4.1	-6.1
非能源	-15.1	2.2	-0.4	-0.7	-0.7	-0.3	3.3	0.4	2.0	1.3	-1.9	-2.5	0.3	-1.3
农产品	-13.0	3.0	-2.1	-1.1	-0.5	-1.1	0.4	-0.6	2.2	0.0	-2.4	-1.6	1.6	-1.6
饮料	-8.2	3.3	1.5	-1.2	0.8	-0.2	-0.9	-7.1	1.4	-3.7	-0.8	-1.7	-0.8	-0.7
食品	-15.4	4.1	-3.0	-1.4	-1.0	-0.8	0.4	-0.2	2.3	0.0	-2.5	-2.1	2.3	-1.1
油类	-21.8	4.3	-4.6	-0.5	-1.9	-1.9	2.4	2.3	2.2	-1.8	-4.5	-4.2	2.3	-3.5
谷物	-14.5	3.4	-7.4	-5.8	-2.8	-0.1	-0.6	-0.2	4.1	0.1	-0.9	1.8	5.8	3.8
其他食品	-7.5	4.5	2.2	0.8	1.1	-0.1	-1.1	-2.9	1.1	1.9	-1.3	-2.3	0.0	-1.9
原材料	-9.4	-0.5	-1.3	-0.1	0.2	-2.3	1.3	2.2	2.5	2.1	-2.8	-0.3	1.0	-3.5
木材	-8.4	-0.9	-5.3	0.5	0.0	-5.0	-0.6	-1.4	-0.7	1.4	-0.9	2.4	1.3	-0.5
其他原材料	-10.9	0.1	4.8	-0.9	0.4	1.4	3.7	6.6	6.1	2.8	-4.8	-3.3	0.7	-7.0
化肥	-5.1	-2.2	-5.0	-0.6	0.7	0.2	2.1	0.6	4.3	0.9	-1.8	-6.0	-5.7	1.6
金属和矿产	-21.1	0.5	5.4	0.5	-1.5	2.1	11.5	2.8	1.4	4.6	-0.8	-4.3	-2.4	-0.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五) 国际金融市场基本稳定

债市基本稳定。美、英、德、日等发达经济体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破近期低点之后均开始回升。汇市波动明显。美元指数一路走低，2017 年上半年下跌 6.4%，创 2016 年 10 月以来的低点；欧元兑美元走强，上半年上涨 8%，创一年来的高点；英镑上半年也逐步走强，上涨 4.6%；日元处于强势震荡，上半年上涨 3.5%。股市震荡上行。上半年，标普 500 波动率指数出现了两波激烈震荡，显示出市场的脆弱性。美股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上涨了 8.7%，带动德、英及全球其他多数国家股指创历史新高或多年来的高点。

三、世界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贸易保护仍然严重

表现为传统贸易保护加深及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成

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国家。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2008—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共推出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举措。2017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309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G20成员国就占了256项。这就意味着，2017年上半年每天就有1.4项贸易保护措施从G20国家产生。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2009年到2017年采取了12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占全球（7833项）的15.4%。特朗普上台以后，这种趋势愈演愈烈，仅2017年上半年就采取了65项贸易保护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的平稳复苏带来了不确定性。

（二）复苏后劲不足

从供给推动看：一是危机后，世界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劳动参与意愿不足；二是正值新旧动能转换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已成强弩之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形成。从需求拉动看：一是消费复苏尚不稳定，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增速波动较大；二是投资不振，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上年下降13%。从市场机制看，初级产品价格偏低，影响资源大国的经济复苏。解决之道重在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刺激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与能力。

（三）全球治理面临困难

2016年底，世界经济出现了积极的变化。经过半年多的改善，当前已进入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时期，因此，全球治理也应从应对危机转向常规治理。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一是治理政策、治理手段等需要转变，各国调控政策需要调整，各国间政策也需要协调；二是全球治理体系在重构过程中，困难当前，不能各自为政、以己为主，应更密切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地缘政治紧张等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仍存

2017年上半年，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主要集中在中东及朝鲜半岛等地区。卡塔尔深陷由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四国主导的断交危机中，中东局势恐将进一步升温。美国以防范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为由，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遭到多国谴责，朝鲜半岛局势严峻；7月4日朝鲜成功试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此举进一步升级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印边界也并不安宁。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后劲不足，新增长点仍未出现，若紧张情绪激化，战事爆发，世界经济必将受到重挫。

美联储6月14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1%~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年内第二次加息。由于此次加息预期已提前消化，市场波动不大。尽

管美国经济整体复苏势头趋缓，通货膨胀率持续走低，但考虑到失业率已经降至足够低的水平，因此美联储年内仍有望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美国加息与“缩表”都会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较多的不确定性。

四、对下半年世界经济初步预测

2017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继续复苏，但步伐不会太快。

2017 年 6 月 28 日，IMF 将 2017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从 2.3% 下调为 2.1%。但由于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稳定，为全年稳定复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所以，IMF、世界银行及英国共识公司最新预测，2017 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分别比 2016 年加快 0.4、0.3 和 0.5 个百分点。如下表所示。

表 2 世界经济年度预测

单位：%

指标	预测机构	2016	2017	2018	指标	预测机构	2016	2017	2018
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通货膨胀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	3.1	3.5	3.6		发达国家	0.8	2	1.9
	发达国家	1.7	2	2		发展中国家	4.4	4.7	4.4
	美国	1.6	2.1	2.1		英国共识公司			
	欧元区	1.7	1.7	1.6		世界	2.5	3	2.8
	日本	1	1.2	0.6		美国	1.3	2.1	2.1
	发展中国家	4.1	4.5	4.8		欧元区	0.2	1.5	1.4
	世界银行					日本	-0.1	0.5	0.8
	世界	2.4	2.7	2.9		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发达国家	1.7	1.9	1.8	世界		2.2	3.8	3.9
	发展中国家	3.5	4.1	4.5	发达国家				
	英国共识公司				出口		2.1	3.5	3.2
	世界	2.5	3	3	进口		2.4	4	4
	美国	1.6	2.2	2.3	发展中国家				
	欧元区	1.7	1.9	1.7	出口		2.5	3.6	4.3
	日本	1	1.4	1.1	进口		1.9	4.5	4.3
	印度	7.1	7.3	7.6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6 月最新预测；英国共识公司《共识预测》（2017 年 7 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17 年 6 月）

注：2017 年、2018 年为预测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增长率为按购买力平价法 GDP 加权汇总；世界银行、英国共识公司为按汇率法 GDP 加权汇总

责任编辑：谷 岳

货币国际化经验对“一带一路”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孟 刚

摘要：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从贸易、投资、金融、政府等角度研究以上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应当夯实国内经济基础，稳中求进，同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加强经济和金融合作，优化投资和贸易环境，强化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职能。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经验

作者简介：孟刚，国家开发银行开罗代表处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英镑的历史经验

（一）英镑国际化概述

1. “日不落帝国”的坚实基础

英镑占全球主导地位的时间，从英国 1816 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至 1945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建立为止。英镑的国际化基本结束了之前各国货币各自独立运行的松散状态，标志着全球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初建立。英镑的国际化，归功于以机器代替手工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英国奠定的坚实政治经济基础，以及英国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开展的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

2. 综合国力和英镑地位的双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开始走向衰落，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上一度出现英镑和美元共同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情况。1945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建

立，美元确定了霸主地位，成为全球唯一的主导性国际货币。1949年9月，英镑一次性贬值30.5%，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1940年的固定汇率1:4.03跌至1:2.8左右。但是英镑并没有就此退出世界货币体系的历史舞台，仍然在区域化基础上居国际次要位置。

（二）英镑国际化的对外贸易基础

1. 全球第一的国际贸易地位

1860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在全球占比达到了近50%。1870年，英国的经济总量高达世界的9.1%。海外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贸易市场，国内过剩产品得以通过跨境贸易方式销往海外。英国拥有了雄厚的资金和领先的技术后，向相关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又进一步巩固了贸易大国的地位。1880年，英国国际贸易总额在全球占比约为40%。英镑被广泛使用，海外影响力大幅增加，保值能力和交易能力得到各国认可。

2. 英镑的贸易计价结算职能突出

18世纪50年代，英国实现了从重商主义^①向自由贸易的转型。英国的全球自由贸易政策成为英镑国际化的直接推动力量。186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贸易协定《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和欧洲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的贸易协定，构筑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全面区域贸易网络。以贸易便利化为理由，英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国家被要求以英镑计价结算。英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大大强化了英镑的支付和流通等国际货币职能。

（三）英镑国际化的对外投资基础

1. 对外投资是英镑国际化的推动力量

英国的对外投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正式建立欧洲自由贸易网络之前，英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国家，投资方式多是政府贷款，投资领域主要是在铁路、钢铁和煤炭等行业；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对外投资以美洲等英属殖民地为重点，总额逐渐居于世界首位，一战前夕已经超过4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民财富的1/4，占当时主要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50%以上。

2. 对外投资的负面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对外投资获得高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由于工业革命开始较早，英国很多老工业部门的设备陈旧，新技术未被充分利用，大量资本投资海外后，国内的技术装备不能得到及时的更新换代。美国和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

^①也称作“商业本位”，产生于16世纪中期，盛行于17—18世纪中期。重商主义者认为：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

家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本国工业，新兴产业迅速赶超了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英国逐渐丧失了全球工业垄断地位，丧失了“世界工厂”地位。

（四）英镑国际化的金融合作基础

1. 金融国际化带来的英镑优势地位

1694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1816年，英国政府公布了《金本位制度法案》，率先实行金本位制，规定1英镑含7.32238克黄金，英镑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1826年，英国政府公布了《银行法》，鼓励设立股份制银行，逐步开始大力推动英镑的跨境贷款。1844年，英国政府公布了《银行特许法》，将维护英镑的可兑换性确定为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授权中央银行和各国央行开展货币互换等合作。

2. 英国央行的重要作用

英镑国际化过程中，英国央行发挥了巨大作用。英国央行保持较低的黄金储备，充分借助货币发行权力以及货币政策影响英镑的市场利率和流动性，灵活调节国际收支，成功引导了各国对英镑的预期，奠定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英国央行有效化解了多起英镑的贬值、支付等信用危机。英国和其他国家央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了海外非居民使用英镑积极性，增加了海外各国英镑货币存量。

（五）英镑国际化中的政府角色

英国政府在推进英镑国际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政治经济基础。英国政府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发展成为近代工业革命领袖。二是自由贸易体系。英国政府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主义，将优势产品输出到国外，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系。三是金融体系。英国政府建立了先进的金融机构体系，将积累的财富以资本形式对外投资到各国。四是央行作用。英国政府确定了央行推进英镑国际化的重要职能。

二、美元的历史经验

（一）美元国际化概述

1. 综合国力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

美元的国际化起步于1879年实施金本位制。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①美元

^①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该体系。本次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

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美元从全球法律制度层面被确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成为凌驾于其他货币之上的特殊国际货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财富，最高峰时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0%，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

2. 绝对主导货币地位的削弱

1973年，在经历了两次美元危机后，^①美国宣布放弃了运行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6年，在IMF推动下，各国达成共识，形成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新国际货币体系。^②美元独自垄断各国外汇储备的地位不复存在，国际地位明显被削弱。但是目前，美元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被广泛使用，石油和黄金等重要商品仍以美元计价，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比例始终维持在60%以上。

（二）美元国际化的对外贸易基础

1. 国际贸易的货币依赖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凭借后发优势，加速实现工业化，经济迅猛增长，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从1870年的8%上升到了1913年的1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头号工业大国，但是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程度和英镑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1913年，全世界35个主要国家所持有的外汇中，英镑占比达到38%，美元比例则不足5%。

2. 历史机遇结束了货币惯性

战争贸易极大地刺激了全球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一战期间，美国大做军用物资生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二战期间，美国出口贸易额从1937年的33.1亿美元增加到了1945年的99亿美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同期的出口贸易额则从263亿美元大幅跌落到18.2亿美元。1947年，23个国家共同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③

^①1960年，伦敦黄金市场价格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20%，美元大幅贬值，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储备货币第一次显示出信任危机。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1968年3月爆发了严重的第二次经济危机，美国的黄金储备半个月內流失14亿多美元。

^②又称为牙买加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废除黄金官价；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等。

^③20世纪30年代是经济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导致二战的原因之一被提出反省。为了更加顺畅的国际贸易能够实现，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框架下，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大力协助，许多国家在1947年10月签署了GATT，并在隔年（1948年）正式生效。GATT的原则是自由、无差别、多元化，必须在这三项原则下进行自由贸易往来。1994年，GATT进行了更新，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1月1日，75个GATT的签约国和欧洲共同体成为了WTO的创始成员。

进一步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威地位。

（三）美元国际化的对外投资基础

1. 对外投资的关键作用

一战期间，美国为英法等国提供了大规模信贷以购买战争物资，成为国际贷款人。191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达到世界首位，海外净资产为125.62亿美元。二战期间，美国向同盟国提供了大约380亿美元信贷，有效增加了美元的境外流动性。1947年7月，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开展了一系列捐赠、资助和贷款活动，最终金额总计达到了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总援助的比例高达88%，其余为贷款。

2. 马歇尔计划效果显著

马歇尔计划从实施到完成，历经4年时间，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既是为了稳定西欧的政治和经济，防止前苏联进一步向欧洲扩张，又有消化国内过剩生产能力，调整畸形的战时经济结构的现实需要。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美国获得了大量对西欧各国的货物、货币、劳务输出的出口份额，美元成为西欧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以促进美国和西欧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国际体系和秩序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

（四）美元国际化的金融合作基础

1. 坚实的金融合作基础

美元国际化有着坚实的金融合作基础。一是美国在推行“美元战略”初期实施金本位制，美元币值稳定。二是美国央行在成立后的10年内发挥了巨大作用，^①美元跻身于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货币行列。三是美国金融市场发达完善，在广度、深度、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等方面都是世界一流。四是美国抓住了战争带来的历史机遇，大规模输出美元资产，有效增加了美元的境外流动性。五是美国主导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建设。

2. 贸易和金融计价结算的突破

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以美元为国际贸易结算单位的贸易承兑汇票，纽约逐步成为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元在贸易融资中的使用超过英镑。在布雷顿

^①1914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成为美国的中央银行。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试图成立一个像美联储这样的中央银行，但因为议员及总统担心央行权力过大，或央行会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而没有成功。这种担心主要是由美国的国家形态所决定的。建国之初，美国是由一些独立的州以联邦的形式组成的松散组织，大部分的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因此，成立中央银行这样一个联邦机构的想法会引起各州的警觉，他们担心联邦政府想以此为名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

森林体系中，金融合作对美元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得到了充分体现，最终确定了美元绝对权威的国际货币地位。由于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开放发达，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债券的形式持有，全球私人储备中很大比例也都是美元证券。

（五）美元国际化中的政府角色

除了历史机遇，美元国际化归因于美国政府的正确战略和长期努力。一是坚定推动美元国际化。美国政府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国际货币委员会”和美联储，全力促进美元国际化。二是大力发展美元金融市场，推动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①三是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规则确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权威地位。四是克服“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②巩固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核心国际货币地位。^③

三、日元的历史经验

（一）日元国际化概述

1. 日元国际化的“昙花一现”

日元国际化的最大特点是“昙花一现”后走向衰落。196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世界第二，并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贷款国和债权国。日元呈现强势货币态势，在两次美元危机中表现稳健，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增加对日元的需求。但是日本政府始终对日元国际化犹豫不决。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以经济金融自由化全面启动日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进入快速发展期。

2. 泡沫经济结束了日元国际化道路

1985年，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持续升值，泡沫经济开始，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跌幅超过40%。之后不久，日本房地产价格暴跌，跌幅超过46%。经济出现了长达10余年之久的衰退，日元国际化道路严重受挫。1999年至2003

^①1914—1924年，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超过了英镑，在纽约流转的债券规模也超过了伦敦。

^②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

^③美国政府积极干预美元外汇市场，在“马歇尔计划”等对外经济援助计划中使用美元，推动欧佩克（OPEC）等国际组织以美元作为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计价结算货币，遏制日元及欧元的国际化。

年期间，日本政府提出“亚元”设想，但是日本支撑日元国际化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日元国际化的最佳时机已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二）日元国际化的对外贸易基础

1. 日元国际化的重要制约因素

制约日元国际化道路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日元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职能发展滞后。二战后，日本确定了“贸易立国”战略，大力发展石油化学、钢铁、有色金属及机械等产业，实现了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了回避和美欧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提高了和亚洲各国的贸易额比重。日元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结算比例始终大幅低于美元、欧元和英镑等，是国际化受挫的重要原因。

2. 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职能滞后的原因

日元在国际贸易中计价结算职能滞后有多重原因。一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美元计价结算的依存度过高。二是日元在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交易量没有形成规模上的质变。东南亚国家的最终制成品主要出口到美欧国家，日元无法取代美元。三是日元价格大起大落。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日本企业在销售差异性小、国际竞争激烈的出口产品时，不得已选择了美元计价结算。

（三）日元国际化的对外投资基础

1. 对外投资风险累积动摇了日元国际化的基础

日本对外投资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以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为日本换取了大量海外资源，缓解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瓶颈。70年代，日本加大了在海外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投资力度。伴随着制造业的大规模外移，日本产业空洞化现象也逐渐产生。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的巨额资金涌入美国，大量购买房产和金融资产，增加了投资风险，促进了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彻底终结了日元国际化的道路。

2. 金融自由化太急对日元国际化有害无益

日本政府忽视了国内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屈从于美国政府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升值的施压，没有及时纠正日本企业在海外过度扩张和盲目投资房地产及高风险金融资产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日本政府在宏观管理上存在重大失误，对经济危机的化解措施不得当，从而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是日元国际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的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早已完成，但日元国际化并没有成功。

（四）日元国际化的金融合作基础

1. 货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时启动

日元国际化是和日本金融体系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同步进行的。二战后到70年代末，日本在工业化国家中金融体系管制最为严格。1984年，日本企业可自由兑换外币和日元。1986年，日本建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取消了对外资流出的限制。1996年，日本实施“金融体系改革计划^①”，在银行、证券、保险同时放松管制，实现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一体化。2000年，日本通过“清迈协议^②”，奠定了东亚地区区域货币合作框架。

2. 金融合作的主要特点

日元国际化的金融合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货币、股票和债券市场都走向了国际化、市场化和自由化道路。二是加强日元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初期通过离岸市场隔离和保护国内金融体系。三是按照从大额到小额、从贷款利率到存款利率的原则，彻底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四是取消对居民和非居民资本流动的管制，彻底完成了资本账户开放。五是尝试日元区域化合作，但是由于经济衰退和美元使用惯性，未能如愿以偿。

（五）日元国际化中的政府角色

日本政府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担心“日元的国际化将搅乱国内金融政策”，持消极态度。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在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日本开放市场的情况下，认为“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对日元国际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问题进行不懈的努力”。三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意识到紧盯美元和过度依赖美元的高度风险，力图实现“日元亚洲化战略”。

四、欧元的历史经验

（一）欧元国际化概述

1. 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1999年，欧元启动发行，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

^①历史上著名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Big Bang）”事件。国际上首次金融大爆炸事件是指英国在1986年由撒切尔政府领导的伦敦金融业政策变革，旨在大幅度减少监管。日本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其核心是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

^②2000年5月4日，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重要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意义。《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货币互换协议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安排。

央银行系统负责管理。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并开始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重要角色。欧元的诞生，得益于欧元之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①”。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把这一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欧元成为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非主权国际货币。

2. 欧元诞生的区域合作基础

欧元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产生。二战后，欧洲经济百废待兴，欧洲决策者们选择了“统一欧洲”的复兴道路。1965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成为1993年成立的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的主要支柱。在欧盟主导下，欧元正式取代了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逐步成为世界第二大主导货币。

（二）欧元国际化的对外贸易基础

1. 区域内贸易活跃是欧元国际化基础

1980—1991年，德国出口比重居世界前两位。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内部贸易额从1960年的103亿美元骤增到1973年的1229亿美元，在1999年欧元诞生之前则达到了8702亿美元。欧元诞生后，欧元区国家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国际贸易中欧元结算的比重，引导欧洲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和欧洲境外的并购等商业活动中以欧元结算。2008年，欧元区内部贸易额增长到了20092亿美元。

2. 欧元对区域贸易合作的促进作用

欧元流通前10年，欧元区内部贸易额的年平均增长率约是2.9%。欧元流通后10年，年平均增长率则达到了近9.7%，占全球贸易总量基本上保持在15%~30%。1990—1998年，欧元区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年平均增幅分别约为16.01%和17.12%，内部贸易增长速度稍落后于对外贸易。欧元流通后的10年，货币一体化的贸易效应显著，欧元区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对外贸易，分别约为25.66%和21.27%。

（三）欧元国际化的对外投资基础

1. 德国对外投资合作打下了基础

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国家通过积极对外投资，快速产生资本流动效应，促进了商品和劳务的输出，为德国马克和欧元的国际化打下了基础。德国对外投资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规模增长较慢，截止到1980年累计为740亿马克。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流

^①该理论认为，西欧各国经济水平相近，国家间要素流动性较高，可以组成一个货币区，货币区各成员国货币之间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甚至可以使用统一货币。

动性增强，全球产业转移加速，德国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截止到1999年，德国对外投资达4054亿欧元（1欧元约等于1.9558马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之一。

2. 欧元区投资合作奠定了欧元区域化基础

德国对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度始终居首位，促进了欧元区国家经济的高度依赖和相互渗透，奠定了欧元的区域化基础。截止到1999年，德国的对外投资在欧盟国家的投资额最高，达到1803亿欧元，占德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44.5%。德国在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在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和贸易。与此同时，外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中60.3%来自欧盟国家，达到1351亿欧元。

（四）欧元国际化的金融合作基础

1. 金融合作促进货币国际化

1950年，欧洲16国^①建立了欧洲支付同盟，目的在于解决各国之间货币结算和自由兑换问题。1979年，在德国和法国倡议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8个成员国^②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以德国马克为主，将8国货币汇率彼此固定，共同应对美元浮动。这标志着欧洲各国合作又向货币一体化迈进了一大步，为欧元的推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货币稳定局面。

2. 欧元区独具特色的金融市场

1997年，欧盟建立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符合标准的欧元区国家开始启用欧元，将本币和欧元汇率固定，从1999年欧元启动到2002年正式流通设置了3年过渡期。欧元区国家授权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行使货币政策，接管外汇储备，维护欧元币值稳定。欧元区国家拥有广度、深度和流动性都非常好的金融市场，为欧元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创造了条件。^③

（五）欧元国际化中的政府角色

欧元是欧洲各国政府合作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典范之作。一是德国等欧洲大国政府积极推动。德国马克的国际化是欧元国际化得以成功实现的重要前提。二是欧洲各国政府形成经济联盟。为了防范货币风险，欧洲各国主动构建区域性经济和货币合作机制。三

^①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希腊、冰岛、卢森堡、荷兰、瑞典、葡萄牙、瑞士、土耳其和挪威。

^②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

^③为提升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欧洲金融界努力保持欧元币值稳定，完善欧洲金融市场，推出欧洲八大金融证券市场联合的举措，改进欧洲债券市场的交易体系和融资方式，通过联合、并购等方式实现了股票市场和商业银行的结构调整，共同提高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

是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协调货币政策。欧洲中央银行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超国家金融机构，成功实现了在欧元区内行使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对外汇率政策的目标。

五、对“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启示

（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稳中求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 始终以国内经济稳健发展为前提

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国际化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规律，是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国内经济稳健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成功和长久的前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抓住机遇，但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对国内经济稳健发展带来冲击。因此，在国内外对人民币国际化呼声日益强烈的舆论环境下，中国要保持清醒头脑，稳中求进，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牢固树立国内经济优先稳健发展的理念，对外投资要严防国内产业空心化，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

2. 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人民币币值不稳，将影响各国预期，对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投资、储备货币存在顾虑，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投机资本快进快出和爆炒人民币的情况，将严重危害国内经济健康发展。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英镑的大幅贬值还是日元的大幅升值，都对这两个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挫伤了英镑和日元的国际化。为了化解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非正当干扰压力，应当借鉴德国马克和欧元的区域化经验，通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融资区域合作，形成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分担人民币过度波动压力，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

3.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

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将有效促进货币国际化，但是如果调控失控，也将对该国经济金融体系造成毁灭性冲击。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告诉我们，资本项目开放至关重要，将影响该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但并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性及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金融领域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够、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都欠发达、跨境金融监管经验有待丰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金融基础设施落后等。当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当以提高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职能、创新发展人民币金融资产品种、建设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金融中心等为重点，加快解决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上述短板，稳步推进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开放。

（二）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经济金融合作

1.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框架

日元国际化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对美国依赖过重，早期忽视了和亚洲国家的合作，等到后期抛出“亚元”概念时，为时已晚。英国的最大宗主国地位决定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密经济合作为英镑国际化奠定了基础。欧元国际化成功的关键则是欧元区国家自始至终的紧密合作，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使得各国间要素流动性较高，货币国际化水到渠成。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和各国经贸关系紧密，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健康调整，整个产业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具备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优势产能和扩大贸易合作的条件。因此，中国应当借鉴国际货币经验，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经济合作框架，必要时成立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多边机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约压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区域合作基础。

2. 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央行合作组织

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都离不开以本国央行为主的，各国央行紧密合作的推动力量。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要尽快形成沿线国家央行广泛参与，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基础扎实，对中国投资、贸易和资本的期望值和依赖程度都很高。中国应当抓住当前有力时机，推动成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央行合作组织，力争形成沿线国家央行广泛参与并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区域性货币合作体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投融资和贸易合作便利化，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职能。

3. 对接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支付系统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很多国家的人民币货币支付系统尚不健全，已经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制约。在笔者工作过的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居民”还是“非居民”，在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尚属难事，更无须谈人民币流通和支付，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等人民币国际化职能更是纸上谈兵。欧盟国家货币一体化成功启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欧洲 16 国早在 1950 年就共同成立了欧洲支付联盟，有效解决了各国之间货币结算和自由兑换等问题。因此，应当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尽快对接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支付系统，为资金融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等所需的人民币资金流动打通渠道。此外，应当借鉴美国的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以商业化运营模式，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并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进行最终清算，提高清算效率，降低清算成本，全面监控人民币跨境交易，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必要的金融

基础设施保障，让人民币资本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享有应有的便利。

（三）优化“一带一路”投资和贸易合作环境

1. 在沿线国家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一带一路”涵盖亚非欧地区，65个沿线国家的总人口超过44亿，占世界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在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及贸易合作中，中国应当规划先行，顺势引导，吸取英、美、德、日等国的货币国际化经验，整合上下游资源，高中低端产业合理布局，推广人民币计价结算，注入人民币资本，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投资和贸易环境。中国应当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达国家及沿线国家充分沟通，在“一带一路”沿线共同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投资和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在“一带一路”沿线营造快速和高效的通商环境，让沿线国家获得更多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收益，进而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基础，将源于中国的供应链运转得更加平稳，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2. 以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协议固化政策沟通成果

在对外投资和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应当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将成果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化，签署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协议，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更为扎实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基础，更好地实现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储备等职能。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与3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召开期间，中国商务部与60多个国家相关部门及国际组织，共同发布了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合作倡议。以此为基础，中国应当继续推动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签署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协议，鼓励和引导人民币在投资和贸易活动中的使用。

3. 以人民币专项贷款（基金）引导资金支持重大项目

以本币开展对外投资和援助，促进本币国际化是英镑、美元、日元和欧元实现国际化的通用手段。2017年5月，中国宣布向“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给丝路基金新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初步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设立2500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和金融合作）；中国进出口银行设立1300亿元人民币“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人民币专项贷款（基金）的支持力度，不仅能解决“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初期的资金缺口问题，还可以促使沿线国家尽快完善人民币资金支付

系统，形成良好预期，引导境内外民间资本将更多人民币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境外人民币的资金池和流动性，形成更大的投资虹吸效应。

4. 成立全国“一带一路”专门机构，促进优先使用人民币

分析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成功多在于本币在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使用比例较大，失败则在于本币在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中计价和结算等职能较弱。目前，人民币的使用和中国全球“贸易大国”和“投资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主要依靠美元、欧元等计价结算，人民币同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还不能直接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低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合作便利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应当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统筹领导优势，考虑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机构化和常态化，统一协调行使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发改委、国税总局等部门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关职能，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清除人民币使用的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障碍，出台鼓励在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优先使用人民币的政策制度，采取优先融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引导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活动中优先使用人民币。

（四）加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结算职能

1. 推动沿线国家的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

大宗商品是国际贸易的领头羊，主要包括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矿石和大宗农产品等。其中，石油交易是最为重要和频繁的标杆性交易。日元国际化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计价结算职能未能充分体现。美国是石油消费大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沙特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将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自此用美元牢牢控制了国际石油贸易的计价结算、石油金融和很多石油产地国家。美国虽然不是欧佩克成员国，但是对于全球石油价格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宗商品交易是国际贸易领域实现货币替换的关键，具有极强的货币使用惯性。伊拉克和伊朗曾经尝试用非美元进行石油贸易计价结算，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政治层面更迭动荡，最终无果而终。2015 年，中国和俄罗斯成功尝试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2016 年，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石油进口国。以此为起点，中国应当发挥投融资等综合优势，在沙特、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动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提高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程度，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职能。

2. 引导跨境电商在沿线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结算

英镑和美元等国际化的路径之一，就是在时代背景下，通过引领创新等方式，走在

了国际贸易计价结算的前列。跨境电商融合了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的优势，能够有效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我国在跨境电商方面成果显著，培育出了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链，形成了一套适应和引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2015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6%。其中，跨境出口交易4.49万亿元，跨境进口交易9072亿元，杭州成为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年初，广州、深圳、天津、上海、重庆、大连等12个市新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复制推广杭州的“六大体系、两大平台^①”经验的做法。我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能够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易于过渡到人民币同合作国本币共同计价结算的模式，使得消费者在新的购物方式下逐渐形成货币依赖性，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潜力巨大。

（五）加强人民币的金融交易和储备职能

1. 加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和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建设

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职能，中国需要同其他国际货币国家一样，打造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在国内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可兑换情况下，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创新人民币金融产品，推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的互联互通，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路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人民币金融产品需求凸显，比如企业可以用离岸市场的银行人民币固定存款或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金融资产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银行可以在离岸市场开发人民币货币基金产品、人民币计价衍生产品和人民币外汇交易类产品等，满足全球客户的投资需求，吸引境外银行、非银行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因此，中国应当在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国际结算、外汇买卖、债券发行、国际清算、国际信贷等传统跨境业务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人民币投资和融资类相关产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驱动、投资计价驱动及金融产品创新驱动等多层次发展模式。

2. 以货币互换推动人民币的投资和外汇储备职能

历史上，英国央行通过货币互换合作有效化解了英镑信用危机。日本通过货币互换合作构建了东亚地区区域性货币合作框架。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超过21个国家和地区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万亿元。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除了互相提供流动性支持外，还能够促进人民

^①“六大体系”分别是指信息共享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智能物流企业体系、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统计监测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两大平台”是指“单一窗口”平台和线下的综合园区平台。

币作为双边贸易结算货币，促进以人民币计价进行直接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储备货币是指以外币计价的资产或存款，主要由政府或官方机构作为外汇储备持有。2010年9月，马来西亚央行在香港购买了价值100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作为其外汇储备，这是人民币首次成为其他国家央行的储备货币。截至2016年12月，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库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为1.07%，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近年来，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美元流动性不足情况，因此希望中国提供流动性支持的需求很强烈。以货币互换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1. 增加“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清算行和代理行数量

借鉴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国际化经验，形成一定规模的海外存量是货币在国际市场循环流动的基础。因此，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币跨境清算和中国国内清算业务分开处理，完善海外人民币业务清算网络，建立高效的人民币资金清算渠道。截至2017年5月，中国已经在全球设立了23个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其中只有7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的迫切需要，不少企业由于清算和结算渠道成本过高而放弃了以人民币结算。为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统筹运用好人民币资金，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资金使用效率，应当尽快在更多条件成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在不具备条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应当积极推行“代理行”模式，允许和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在中资银行的境内或海外机构开立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为使用人民币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和金融合作提供更大便利。

2. 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

几大国际货币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就是所在国银行业高度发达，全球化程度高。这些国家银行业能够在全世界蓬勃发展，就是通过为本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1959年英国汇丰集团所属的汇丰银行收购了中东英格兰银行进军中东市场，1978年在沙特成立沙特英国银行，1982年在埃及成立埃及英国银行。1976—1979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相继在十几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在1988年之前，又向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12个国家扩张。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德意志银行员工已经在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工作过。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发展迅猛，4家跃居全球十大银行之列，分支机构布

局和日本银行业类似，主要集中在全世界金融最发达或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出现“滞后”状态，缺乏分支机构网点。当前，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发展迅速，中国金融机构应当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建银政企合作平台，以政府政策指导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尽快因地制宜地成立分支机构、设计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控制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 胡怀邦：《以开发性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当代金融家》2017年第5期。
2. 郑之杰：《抓住历史机遇，以开发性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人民日报》2016年8月4日。
3. 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6年。
4. 孟刚：《中国在澳大利亚“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 孟刚：《“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研究》，《开发性金融研究：“一带一路”专刊》，2017年6月。
6. 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7. 孟刚：《开发性金融制度建设的价值、路径和障碍研究》，《开发性金融研究》2006年第2期。
8. 刘越飞：《货币国际化经验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9. 黄润中：《英国经济发展之路析示》，《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0. 孙海霞：《美元国际化：历程与启示》，《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1. 巴里·埃森格林：《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 洪邮生等：《“一带一路”倡议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13.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巴曙松、杨现领：《货币锚的选择与退出：对最优货币规则的再考察》，《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
15. 孙海霞：《欧元国际化：历程与启示》，《浙江金融》2011年第11期。
16. 孙森：《德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的现状和特点》，《国际经济合作》2001年第6期。
17. 丁剑平等：《“走出去”中的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出版社2014年版。
18. 范小云等：《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2014年第9期。

责任编辑：谷 岳

· 宏观经济 ·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摘要：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国家，如何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国内外生态环保的经验与现状，提出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行政管理和监管体制、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机制等方面的重大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文明 体制机制 政策建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断加深。表现在体制机制上，经历了制度建设循序渐进和政策不断深化的过程，从简单的污染治理，到提出保护资源环境，再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地位，将其提高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并列的高度。建设生态文

* 本文是 2014 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年度重大基金课题《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与体制研究》、2015 年 2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三五”规划《建议》前期重大课题《“十三五”时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任务》和 2015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委托重大问题研究课题《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综合成果。执笔人：赵家荣、曾少军、张瑾、王毅、刘向东、王凤春、苏明、马骏、刘树杰、杨来。

明，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世界上首次提出的，是重要的理论、理念创新，昭示了我们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27次会议通过决议，以联合国文件认可并支持中国生态文明理念，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201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一系列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的爆发，人们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关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发表和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到2014年在纽约总部成立联合国文明联盟生态文明委员会等，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模式，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思考工业文明。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提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悄然兴起。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发表了《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著作。双重危机论、政治生态学理论、经济重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寻找出路，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在绿色生态思潮的推动下，生态运动也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兴起。1972年5月新西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价值党。1980年德国成立了有明确政治纲领的“绿党”，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主张，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

在我国，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1984年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新阶段；有的认为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有的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理念；有的认为生态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目前，关于生态文明概念的讨论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种公认的权威的概念。二是

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儒、道和佛教中探究生态文明的文化渊源，认为儒、道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尊重自然、兼爱万物，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等价值取向，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化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研究。许多学者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不同层面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有的学者研究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机制、理念以及生态文化等，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措施。有的学者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有的学者结合各地具体实际，提出了在相关省市建设生态文明的措施。有的学者研究了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等。

总之，近年来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当前低水平重复研究居多，高质量深层次的研究较少；对生态文明概念探讨的多，从哲学、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本质属性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少；就事论事、解读政策的研究多，从战略高度研究的少。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尽管理论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对生态文明尚有待形成一个公认的权威的定义。本研究力图提出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和文明构成的复合概念，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尊重自然规律和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以维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环境的可承受程度为基础，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以统领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为特征，以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建设途径，遵循公正和谐、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辅相成，实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文明发展形态。

三、国外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为履行环境管理职能，各国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建立起各具特色的环境管理体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管理范围随着国家的形势变化而逐步变化，职责范围逐步扩大，编制逐步增加。

（一）环境主管机构及负责人的行政地位不断提高

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突出，特别是区域性问题日益摆上议事日程，许多国家在机构改革中加强环境保护的力量，包括升格国家环境保护的主管机构。例如，日本、韩国的环境主管部门都经历级别不断提高的过程。配备高级别的首长，一些国家环境部长的地

位高于其他部长。如韩国环境部长是国务委员，受国务总理的命令，就环保政策、计划及其执行在各部门间进行统一协调。

（二）逐步扩展环境主管部门的职能，实行环境保护大部制

环保部门的主要职能范围涉及环境、自然资源、土地、海洋、交通、生态、核安全以及与贸易、投资、消费、生产模式之间关系等诸多内容。从各国经验看，仅由一个统一监督管理机构来管理整个国家的环境问题是不现实的。但绝大部分国家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情况下尽可能把相关职能转移到环境主管部门。例如，美国于1970年把分散于农业部、健康、教育和福利部（即现在的健康与保健部）、内政部及原子能委员会、联邦放射物管理委员会、环境质量委员会等部门的环保职能集中到环保局。日本于2001年将原来厚生省和产业省中固体废弃物的管理职能集中到环境省，实现统一管理。

环境部是欧盟各国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绝大多数国家的内阁组成部门之一。总体看来，大部制是欧盟和OECD国家的政府组成特征，多数成员国内阁组成部门一般在15个左右。各国环境部即使有的包含其他部门职能，但从其名称及内设机构来看，主要职能仍然是环境保护。各国基本情况与环保机构名称见表1。

表1 欧盟和OECD主要国家基本情况与环保机构

国家	内阁部门数目	环境机构名称	人口(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瑞典*	12	环境部	889	2413	27257
芬兰*	15	环境部	518	1300	26000
西班牙*	16	环境部	4020	3546	15103
卢森堡*	8	环境部	44	210	48200
英国*	12	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	5950	14384	24174
德国*	14	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	8820	19424	23606
法国*	15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	6040	12369	23899
意大利*	14	环境与国土保护部	5768	11709	20600
丹麦*	20	环境与能源部	533	1624	30459
葡萄牙*	17	环境与国土部	1032	1070	10726
爱尔兰*	14	环境与地方政府部	380	953	25708
希腊*	20	环境、城市规划与公共工程部	1052	1254	11877

续表 1

国家	内阁部门数目	环境机构名称	人口(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奥地利*	11	农业、林业与环境部	809	2109	26050
比利时*	14	社会事务、公众健康与环境部	1021	2270	22253
荷兰*	15	房建、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部	1586	4276	26700
澳大利亚	17	环境和遗产部	1900	3442	18100
加拿大	27	环境部	3075	6995	22750
捷克共和国	15	环境部	1030	362	3523
匈牙利	14	环境部	1004	387	4787
冰岛	12	环境事务部	28	75	31100
日本	18	环境省	1195	49472	39263
韩国	21	环境部	4612	4574	9628
墨西哥	18	环境、自然资源和渔业部	9736	5670	5824
新西兰	20	环境部	384	436	11282
挪威	18	环境部	448	1484	33200
波兰	11	环境部	3864	1587	4115
斯洛伐克	20	环境部	540	136	2748
瑞士	7	联邦环境、交通、能源和电讯部	720	2411	33481
土耳其	17	环境部	6550	1987	3184
美国	14	联邦环境保护局	28300	99657	35214

数据来源：欧盟和 OECD 提供材料、各国环境部网站、中国外交部网站

注：本表数据主要是 2000 年左右的数据；OECD 共 30 个成员国，其中有 * 标记的为欧盟国家

如上表所示，目前 OECD 的 30 个成员国（含 15 个欧盟国）中，有 29 个国家的环保机构为内阁组成部门，原本分散的环保职能也大都集中在环保部门。各国的环保机构，随着环境问题的演变，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的历程。各国环保机构初建时起点也都较低，但随着分散在其他各部门的职能连同人员和经费的划入，环保机构都得到迅速发展，绝大多数很快就成为政府的内阁组成部门。尽管各国政府经过不断改革，内阁部门数目减少，但环境部的地位不断加强、职能范围不断增加。而且大部分国家的地方环保机构也较为完善。各国环保机构的设立、职责确定及工作程序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保证了环保机构及其管理的合法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各国环境部的内部机构设置来看，大部分国家按环境要素设置管理机构。如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环境部都是按要素下设水司、自然司、大气（化学品）司等，另外有一个中央或综合司负责环境部内部行政管理。各国环境部一般来说司的数目较少，但司内设次司和处较多。

（三）设置跨部际协调议事机构，以及跨区域的协调督察机构

大部分发达国家除了成立环境管理专门机构，还设有环境管理综合决策协调机构或机制。这主要是由于环境管理的综合性、复杂性，以及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联性。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都设有环境质量委员会，职能是为总统提供环境政策方面的咨询和协调多个行政部门有关环境方面的活动。日本除了环境省，还成立了公害对策会议，作为首相府的下属机构，会长由内阁首相兼任，其主要职权是处理有关都道府县制定的公害防治计划、审议有关防治公害的基本的和综合的措施并促进这些措施的实施等。德联邦政府于2000年成立了国家可持续发展部长委员会，联邦总理为该委员会主席，其任务是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部分国家还设置了区域性环境机构，其主要职责有二：一是协调作用。流域水污染、酸雨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不受行政辖区限制，具有跨界污染的特点。许多国家设置跨区环境管理机构，作为环境管理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或直属机构，人员编制属于环境管理主管部门，如美国联邦环保局的10个区域办公室。二是监督作用，旨在督促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标准。

（四）注重分级管理，明晰央地事权划分

分级管理在美国和德国两个国家表现突出，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制定基本政策、法规和排放标准，由州政府负责实施，在确认联邦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家环境目标、环境政策、基本管理制度和环境标准等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承认州与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法规方面的重要地位。美国处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为：州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联邦政府的领导和帮助必不可少。德国联邦政府环境管理的主要职能是一般环境政策的制订、核安全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及跨界纠纷的处理，州政府环境管理的职能主要是环境政策的实施，同时也包括部分环境政策的制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立法权责、法律和政策的实施权责、环境规划的权责、环保投资权责等方面也进行了明确分工。

（五）拥有足够的人员配置

随着环境事务的不断增多，各国的环境主管部门大都加强了人力投入，相应地进行

了人员扩编。日本环境厅（现日本环境省）自成立以来组成人员不断增加，由最初的 501 人增加到 2001 年的 1311 人，增长了近两倍。美国环保局由成立之初的 5000 多名职工，发展到现在的 18000 多人，其中 6000 人左右在华盛顿总部负责各项环境政策的制定，10000 人左右分布在全美国的 10 个区域办公室，2000 余人分散在华盛顿以及美国其他各地的美国环保局直属研究机构负责对政策的制定进行技术支持。

表 2 2016 年国外环境保护机构人员数与全国总人口数比较

国家名称	环保机构名称	机构人员数	全国总人口数
澳大利亚	环境与遗产部	3000 多	2395 万
加拿大	环境部	5000 多	3587 万
丹麦	环境与能源部	3000 多	564 万
法国	国土整治与环境保护部	2351	6701.9 万
德国	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	近 3000 人（其中环境部 870 人）	7975.8 万
日本	环境省	1131	1.268 亿
韩国	环境部	392	5046.4 万
新西兰	环境部	110 人左右	439 万
俄罗斯	自然资源部	700 多	1.463 亿
瑞典	环境部	150 人（环保局 500 多）	958.1 万
美国	环保局	18000 多	3.23 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互联网及实际调研整理而得

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各级政府也比较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但较为粗放的发展模式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目前，造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利用，向生态环境无休止的索取。其深层次制度原因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行政管理机制不健全

我国虽建立了多级生态环保监督管理体系，但是由于职能交叉，执法主体和监测力量分散，在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着缺位失位、相互扯皮、责任不明、轻视赔偿等问题。一是监管不到位，独立执法困难。二是监管职能分散，管理碎片化，存在多头管理和相互

扯皮现象。三是制度碎片化突出，监管财权事权不对等。

（二）法律法规体系不成熟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无论是在立法、执法还是司法环节都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机制，使环境监管真正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是生态文明有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二是立法、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预算安排脱节，导致立法与实施脱节。三是尚未健全生态环境的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参与监督的机制不畅。

（三）生态环保产权制度不明晰

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保护不力的关键原因在于生态环保产权制度不明晰。按照法律规定，我国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我国虽在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制度建设，但是尚未解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未实行严格的资产管理等问题，反而被各级政府拿来作为发展经济的生产要素。而且生态环保的相关产权交易市场也不发达，主要是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不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

（四）有关配套政策不完善

在生态环保的政策体系中，现行的鼓励和支持政策尚存在碎片化和滞后性的特征，不少政策与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一是行政管制的手段和措施应用比较多，市场调节、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措施应用比较少。二是各种财政、税费、价格、金融、产业、投资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比较零散，对资源与生态环境利用行为的调节作用不大。三是缺少法律化、常态化机制。四是生态补偿资金总体不足，没有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五是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缺陷。

（五）监督评估机制不到位

我国目前针对普遍的污染行为主要还是以罚代管的方式进行，对超标排污行为罚款数额普遍偏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监督评估机制尚不到位。一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不严、监管不到位现象相当普遍。二是生态文明的评估指标不完善，指标考核往往成为摆设。三是监督执法难以形成合力。

（六）公众参与机制未建立

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并不高，主要在于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参与

维权渠道受阻、参与的方式和内容缺乏可操作性等原因。我国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机构的监督能力有限，政府缺乏对环保类社会组织的指导、扶持和服务等方面的有效政策措施，国内环保类社会组织总体能力薄弱，难以满足公众有效参与环保事业的需要。

（七）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

多年以来，我国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特别是环境污染防治属于属地管理，强调当地政府的责任，而地方环保部门受地方政府任命管辖，因此中央对地方生态环保事业的直接参与度不高，造成部委与地方条块分割严重，协调难度较大。像大气、水等污染物具有流动性特点，可能会出现“东家污染、西家埋单”的情况，跨行政区划、跨流域协调难度较大，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始终难建立，缺乏有效的议事程序和争端解决机制，长此以往将会导致相互扯皮和监管缺位问题，治理效果也不尽如意。

五、促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建议

201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2016年12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这些重要文件和法律、法规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促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就是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要求，坚持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和根本方针，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主线，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建设为重点，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和边界，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创造力和自觉性，加快建设美丽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力争到2020年，生态文明体制框架，以及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用途管制、监督体系得到健全，关键制度建设取得决定性成果；资源环境生态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有关价格、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更加完善，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参与的渠道更加畅通、方式更加多样，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

（一）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体制与监管机制建议

生态环保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必须提供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若要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需要进一步

加强监管。深化生态环保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按照国家关于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推进依法行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要求进行。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核心是建立独立行政执法和监管的体制。

1. 健全我国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针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行政管理与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健全我国生态文明管理体制，就是要在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法制建设、强化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通过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立分权制衡、相互协调、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在深化生态环保管理体制改革时，要提高管理效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保护生态环境。要做到政府职能精简统一，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进一步简政放权。一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实行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战略。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中最为关键的一对关系，也是难点所在。二是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多功能性出发，实现统一监督管理与专业分工管理相结合。从生态系统的系统性来看，生态环境具有跨介质、跨区域的整体性特征，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应当遵循生态系统的特点进行统一监督管理和流域、区域的综合管理。三是按照生态环境物品和服务的不同公共属性，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

2. 我国生态文明管理机构调整方案建议。我国生态文明管理的中央部委职能重组的核心是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的决策、执行、监督、协调、提供公共物品等职责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减少职能交叉，降低行政协调成本，实现权力制衡上的协调一致，提高体制运行效率。目前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按照积极稳妥实施大部制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对这些部门适当合并和重组势在必行。

近年来，各方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案，如2011年中国工程院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报告，就提出了整合环境、资源和生态保护等职能的大环境部的方案，相近的也有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中屡次提出的大国土资源部方案。从近期来看，污染防治职能适当集中和自然资源管理职能适当集中的方案比较可行，关键是相关的生态保护职能如何配置，是放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还是环境保护部门，还需要认真研究论证。从生态系统和污染防治的整体性来看，两个方面都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但从现有部门职能和能力而言，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可能更具专业能力来行使领土范围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国生态文明管理机构调整方案建议是：未来国家生态环境管理相关职能主要由“二委一部一局”负责，分别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委员会、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局。

3. 我国生态文明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根据保护与开发相分离、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坚持大部制的改革方向，分别组建集中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委员会、资源与环境保护部。

以机制创新为抓手，理顺环境保护与综合经济协调的关系，强化综合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能，提高体制运行效率。明确和强化综合经济部门协调环境与发展的职能，促使其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的理念充分整合到主要职能的履行中。在“三定”方案中明确各部门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责。在下一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通过制定新的政府部门“三定”方案，明确各部门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评估国务院相关部委履职情况，并将结果公开。

按照“强化两头，精简中间”的原则，重新定位中央环境保护部门的职责，围绕制度建设与质量结果考核开展工作。建议在未来中央环保部门职责定位中，要按照“强化两头，精简中间”的原则进行改革。一是聚焦制度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的宏观管理，参与国家的综合决策，避免陷入到项目审批等微观事务中。二是中央把当前以总量为主的过程管理转变到以质量为导向的结果管理，重点是监督考核省级政府的环境质量及其改善目标的实现程度，同时健全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与综合评估。三是完善“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执法体系，监督执法职责应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并通过“上下夹击”的制度安排实现对地方政府的督查。“上”指中央政府要通过区域/流域督查中心的督查、环境质量考核、财政手段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下”指非政府组织、公众、传媒的监督作用要得以充分发挥。

将监测权与决策权分离，成立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局，构建独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体系。独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体制将由垂直管理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和属地管理的污染源监测体系构成，可按如下改革路径进行：一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委内部，把生态环境质量类监测与监督性监测相分离。二是成立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估局（副部级），建立统一的数据信息平台。三是监督性监测的职能仍保留在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机制，以支撑生态环境监督执法。同时，结合区域派出机构加强中央对污染源监测的监督，并强化社会力量的监督。

（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建议

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是在现行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与制度体系上

深化发展起来的。

1. 中央两个决定对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和制度体系提出了目标和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14个领域的改革措施，对当前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针对体制改革和重大制度建设方面，首先从深化改革的总体构架上，通过制度安排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次对生态文明建设本身，从体制和重大制度建设两个层面，从源头严防、过程严控、后果严惩各个环节，提出一系列解决当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问题的改革措施。

2.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和要求，调整相关立法规划和计划，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按照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调整完善立法规划和计划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调整后的立法规划，在原有规划安排的土地管理法（修改）、环境保护法（修改，已通过）、水污染防治法（修改，已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森林法（修改）、海洋基本法、核安全法、矿产资源法（修改）、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涉及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项目之外，新增了环境保护税法、资源税法、耕地占用税法、原子能法、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改）、草原法（修改）等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立法项目。

3. 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同绿色发展与空间规划、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相关立法有效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目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些主要内容已经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中，新近的立法项目中也逐步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新内容纳入法律规定中，如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已经把生态红线、生态补偿等纳入法律规定，虽然仍旧是不易操作的原则规定。从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安排来看，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有关自然资源产权和资产管理，自然资源行政监管，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与生态红线，排污许可和排污总量控制，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的前期理论研究和试点试验，加强各项制度理论研究和试点试验同相关立法工作的有效结合，为把生态文明制度全面纳入各项法律中奠定坚实的基础。

4. 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行政体制改革和公共财政预算结合起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强化有关法律实施的实体和程序性规范，使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真正落到实处。为了有效推进改革，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可实施性、目标有效性，提高相关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效率，应当研究探索把有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结合起来的体制机制。当前

应当首先研究建立行政部门“三定”方案同行政部门预算联合审定的工作机制，并研究建立法律案的预评估制度，把评估法律案的预期实施效果、社会成本（包括行政执法部门因新设立职责所需新增的人员编制和预算经费），列为立法必经程序，把法律案的起草和审议同行政部门职能设置和预算编制结合起来，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和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奠定良好的体制改革基础。

（三）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建议

1. 支持生态保护的财政政策。近年来，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
求，我国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创新财税政策，加大投入力度，支持生态保护，成效明显。
但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仍然不协调，我国
现行的财税政策在鼓励和促进生态保护方面还明显落后于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当前及
今后中长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破解资源、环境、生态及应对气候变化的难题，真正促
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根本途径在于创新制度、完善政策，就是要充分运用法律、行政、
经济等各种政策手段，综合发力。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手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无
疑担负着重要职责。现侧重就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推进生态保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首先，着力推进税收制度创新和税收政策完善。税制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科学合
理的税制对于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及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调节作用。近十
多年我国在税收制度政策方面改革力度较大，为环保节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创造了良
好的制度环境，但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仍有相当距离。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税收
激励和约束功能不足，税率偏低，排污成本外溢。因此，着力推进税收制度创新和税收
政策完善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关于深化资源税改革，主要建议：一
是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二是清理煤炭相关收费基金。三是适度提高煤炭资源
税税率。对能源密集行业、节能减排成绩显著的企业以及贫困地区，可酌情给予环境税
的优惠照顾。至于调整消费税政策，其是在增值税普遍征收基础上实施特殊调节的税种。
关于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针对现行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由于不能盈利而难以享受优惠的情况，可适度调整政策的适用
条件。二是在现有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免征或减征
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符合条件的相关项目的范围。三是针对现
行企业内部在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上难以获得优惠的问题，可考虑对企业自产自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规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也给予优惠政策。四是针对现行企业所得税对于
企业生产和销售有关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相关设备缺乏优惠政策的情况，可参照资

源综合利用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生产和制造节能设备和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五是将企业在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方面提供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纳入到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优惠的规定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有关企业技术转让的减免税政策。

其次，建立和完善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的新机制。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征决定了财政支持的必要性。“十二五”以来为了实现国家确定的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国家财政部门从政策、制度、财力多方面出台措施，加大扶持力度，效果非常明显，淘汰落后产能取得重大进展，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碳排放强度趋于下降。建议加大财政支持生态环保的投入倾斜力度：一是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并重，切实加大财政投入；二是整合现有专项资金，以形成合力；三是建立专门的预算科目；四是建立中央和地方多级共同投入的机制。建议优化财政支持生态环保的投入结构：一是支持节能减排科技的研发、示范和推广；二是支持节能和环保服务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三是针对环保投资历史欠账严重和治理污染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加大环境保护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建议创新财政投入手段，包括以下几个重点：一是在补贴环节上，从以往主要补助生产环节，转向在补助生产环节的同时扩大对消费环节的补助；二是在财政投入使用方式上，更多地采用财政贴息这类间接优惠方式；三是大力扶持担保行业的发展。建议探索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一是鼓励支持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保建设事业；二是明确企业环保投资的主体地位；三是设立生态环保投资基金，实现环保基金的良性自我发展；四是引导金融行业加大对生态环保领域的投资。

最后，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解决生态环保问题，实现生态环保宏观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的均衡，需要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财政转移支付范畴，构建政府间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建议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纵向生态转移支付。一是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二是要改进生态转移支付的测算方法；三是要进一步明晰和提高相关领域的补偿标准。建议建立省以下生态财政转移支付。根据地方具体情况，合理安排省以下生态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方向，明确转移支付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建议建立区域间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转移支付亦称为横向生态补偿，主要是指区域之间或水流域上下游地方之间生态受益方对生态的经济利益受损方的资金补偿。

2.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格政策。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使本届政府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空前。而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核心的调节机制。合理的价格政策，对改变目前我国生产与消费中资源消耗过高、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促进资源节约及循环利用，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格政策的整体构建，可定位在资源节约、减少排放、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三个方面。建议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当前需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竞争型市场结构的建立；二是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三是“改革”领导责任的落实。建议再造基于市场经济的价格监管体系，当前需重点做以下工作：一是建立职能完备的能源价格监管机构；二是建立、完善监管的规则体系；三是建立利益相关者间的制衡机制。建议强化“外部性”控制。需要重点解决：一是“外部成本”内部化；二是“外部收益”内部化。几个主要资源性产业的价格政策要点如下。

第一，关于石油价格政策的要点。我国大部分石油价格已经放开，市场平稳，这里着重探讨成品油（主要是汽油、柴油及航空煤油）价格如何向竞争性市场体制平稳过渡问题。一是继续坚持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取向。二是应把市场均衡作为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基本出发点。三是调整成品油价格形成中各相关主体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四是放松成品油批发、零售的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

第二，天然气价格政策的要点。天然气如未液化，须经专门的管道运输才能流通，因而该行业的技术、经济特性与电力行业较为相似。作为长期目标，在“井、网、售”分离的基础上，天然气井口价格和终端用户价格应该市场化，管道运输价格可继续由政府监管。这方面国外已有成功的经验，国内的政府决策层也基本形成共识，我们可朝此方向继续努力。这里，重点就当前监管所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建议。一是完善与替代能源联动的天然气价格调整机制。二是统一规范配售价格监管办法。

第三，电价政策的要点。关于电价改革，在国务院《电价改革方案》及其配套的部门规章中提及的内容，本报告将不再重复。这里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此前未及深入思考的促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发展问题，提出框架性的政策建议。一是用户电价总水平及时反映电力成本和需求的变动。二是建立与供电成本相符的用户电价结构。三是上网电价应包含更多的减排成本。四是逐步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规范、整合随电价征收的政府性基金。

第四，水价政策的要点。水价政策的核心要点是：水价完全反映资源成本、开发利用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城市供水价格按照合理成本、合理赢利、公平负担的原则制定。对居民供水价格，推行阶梯水价制度，维持基本生存部分的价格与非基本生存需要部分分别执行不同的价格，并建立后者的动态调整机制。水资源费应反映水资源的再生产成本。因此，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仍应继续提高。应改革水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制度，对于跨区域利用的水资源，水资源费的标准和分配应由上一级政府决定，征收标准应体现

受益者负担的原则，资金分配应主要用于上游地区的水源涵养。

3. 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金融政策。当前，我国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经济发展亟待向绿色、可持续模式转型。推动建立我国生态文明金融体系的4大类14条建议。

第一类建议涉及机构建设，是实现绿色投资的组织保障，需要中央、地方政府资金的参与和相关体制改革。一是建立绿色银行体系，充分发挥绿色银行在绿色信贷和投资方面的专业能力、规模效益和风控优势。二是推动公私合作（PPP）模式绿色产业发展，以有限的政府资金撬动民间资本股权投资。三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对外投资和开发性机构，应宣布加入或参照赤道原则，建立高标准（不低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大力推动对外绿色投资，维护我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第二类建议涉及财政和金融政策，需要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的配合与推动。一是健全财政对绿色贷款的高效贴息机制，加大贴息力度，逐步放开贴息标准限制，合理划定贴息期限，简化审批流程，试点财政部门委托政策性银行、绿色银行或商业银行的生态金融事业部管理绿色贷款贴息。二是由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发布绿色债券有关指引，允许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贷款和绿色投资提供较长期限、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三是强化股票市场支持绿色企业的机制。明确绿色产业和企业的认定标准，简化绿色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审核或备案程序，适度放宽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绿色企业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的金额和比例限制，对符合条件的新三板挂牌绿色企业优先开展转板试点。

第三类建议涉及支持绿色投资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可由金融机构和民间机构（如银行、评级公司、环交所、证券交易所、券商、基金、非政府组织等）推动，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一是加快排放（污）权交易市场建设。二是建立绿色评级体系，为绿色企业（项目）提供更有利的评级，以降低其融资成本。三是推动绿色股票指数的开发和运用，引导资本市场更多投入绿色产业。四是由环保部和金融业学会（或协会）牵头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和数据库，提高环境评估方法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降低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评估成本。五是建立绿色投资者网络。

第四类建议涉及支持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需要立法机构、相关部委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和推动。一是在更多领域实现强制性的绿色保险，利用保险市场机制制约污染性投资并提供环境修复资金。二是明确银行的环境法律责任，允许污染受害者起诉向污染项目提供资金的、负有连带责任的贷款性金融机构。三是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应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为上市公司环境风险评估和准确估值提供基础，

引导资本市场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绿色产业。

4. 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建设的重点工作。一般而言，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首先体现在污染治理集约化。只有把分散的治理方式转变为集约治理，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避免环境保护盲目投资、到处布点和重复建设的现象发生。政府应提供良好的政策，促进生态环保市场化机制培育，加强生态环保市场化的立法和经济体制改革，为生态环保市场化集中治理提供有力保证。其次是产权的多元化。产权多元化有助于发挥其他主体的社会参与能力，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起环境保护市场多元化的投资体制。生态环保市场化的设施建设，要通过吸纳商业资本、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资金，形成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等多元化投资局面。再次是运行、服务市场化。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保设施运营，应由社会化服务的独立法人来承担。通过新机制的建立，逐步造就一批专业化环境治理公司，形成运营服务市场。通过市场化运营，促使投资者与经营者自觉运用资源价值、环境成本、经济效益核算机制，把生态环保治理效果与运行管理者的经济效益兼顾起来，形成环境污染治理的良性循环。当前，在落实上述市场化机制的过程中，应重点以推动 PPP 和第三方治理模式为抓手，引导市场力量。

一方面，应完善 PPP 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环境公共物品。PPP 模式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上可以大有作为。当前形势下推动 PPP 模式应当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在法律支撑下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并破除成本、融资等障碍。为此，建议如下：一是应尽快制定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明晰政府及特许经营企业的权责利。二是利用价格、税收、融资等手段确保 PPP 模式可持续推行。三是地方政府应以诚信原则履行 PPP 项目合同，及时足额地向运营企业支付服务费用。四是完善特许经营退出机制。

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污染第三方治理，实现工业污染专业化治理。相对于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具有其明显优势，但当前我国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仍相对较低，只有 5% 左右，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比例已达 50% 左右。目前看，企业污染第三方治理需要破除以下障碍和挑战。加快立法进程破除责任转移障碍；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创新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障碍；强化政府责任。发展改革部门加强指导，会同工信部门做好第三方治理试点和推广工作；生态环保部门强化对第三方治理的监管，严格执法，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公开向社会公布第三方治理项目的治理信息，包括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建立环境服务公司诚信档案。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2. 迟福林:《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生长方式》,《中国经济时报》2013 年 8 月 9 日。
3.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法律法规全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
4.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典》,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
5. 毛如柏、威廉·瑞利、阿兰·劳埃德:《加强中国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的建议书》, [www. efchina. org](http://www.efchina.org)。
6.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环境污染数据体系管理体制研究》, [http: //www. efchina. org/Reports - zh/reports - efchina - 20101130 - zh](http://www.efchina.org/Reports-zh/reports-efchina-20101130-zh)。
7. 世界银行:《1997 世界发展报告: 变革世界中的政府》,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8. 王灿发:《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途径》,《政法论坛》2003 年第 4 期。
9. 王灿发:《中国环境行政执法手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10. 汪劲:《环保法治三十年: 我们成功了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1. 中国工程院、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 (战略保障卷)》,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2.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管理体制: 变革与创新, 2008》, [http: //www. china. com. cn/tech/zhuanti/wyh/2008 - 02/14/content _ 9736935 _ 2. htm](http://www.china.com.cn/tech/zhuanti/wyh/2008-02/14/content_9736935_2.htm)。
1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8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4.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4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15.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5 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责任编辑: 沈家文

房地产价格、财富预期与经济增长稳定

贺京同 那 艺 赵子沐

摘要：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过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任务紧迫且意义重大。然而，我国目前出台的多种调控政策市场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亟需我们进一步分析、认清房价背后的支撑机制，溯本清源，从根源入手施以对策。房地产是兼具消费品与投资品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因此市场主体在认知过程中易于对其形成看涨的财富预期。故而，如何对房地产市场正确施以预期引导才是当下平抑房价、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稳定的关键所在。从长期看，应以构建稳定的法律制度为核心，配合供给侧精准调控来引导并稳定预期；从短期看，应适时推进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防止地方政府在一轮轮的土地出让过程中不断提高土地起拍价而推升房地产财富预期。稳定的预期将带来平稳的房价，将引导房市中过剩的资本流向其他产业，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均衡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进而激发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 财富预期 预期管理 经济稳定增长

作者简介：贺京同，南开大学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 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子沐，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房地产呈现显著的量价齐升特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数据显示，2011—2016 年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平均房价上涨达到 78%，年均增长率超过 10%。此外，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

商品房销售面积数据显示，与2011年相比，2016年的商品房住宅年销售面积增幅也高达42%。可见，我国房地产价格一直保持着快速上涨趋势，同时全社会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情高涨，大量资本涌向楼市。那么，高企的房价和热度依旧的房地产市场，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房地产量价齐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若想真正有效地稳定房价，又该从何着手？

一、房价的持续上涨及其影响

近十多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保持快速上涨趋势，全社会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情高涨，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市场。然而，这一趋势在两个方面会严重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一，从短期看，房地产量价齐升引发的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如建材、家具等）的利润率居高不下（见图1），这必将引发社会资本向这些行业的“投资趋同”加剧，其结果不但会严重挤压实体经济，而且还将阻碍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我国近10年以来历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仅在上一轮房地产紧缩时期的2008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且相对于新增工业中长期贷款的倍数以及相对于服务业中长期贷款的倍数也在2014年后迅速向上攀升（见图2、图3）。而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新增房地产贷款高达56700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4.8%，且为工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25.8倍，服务业新增中长期贷款的2.1倍。社会资本向少数领域的不断集中将会强化“投资趋同”现象，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有效投资规模的扩大，导致投资对于经济供—需两方面的匹配作用无法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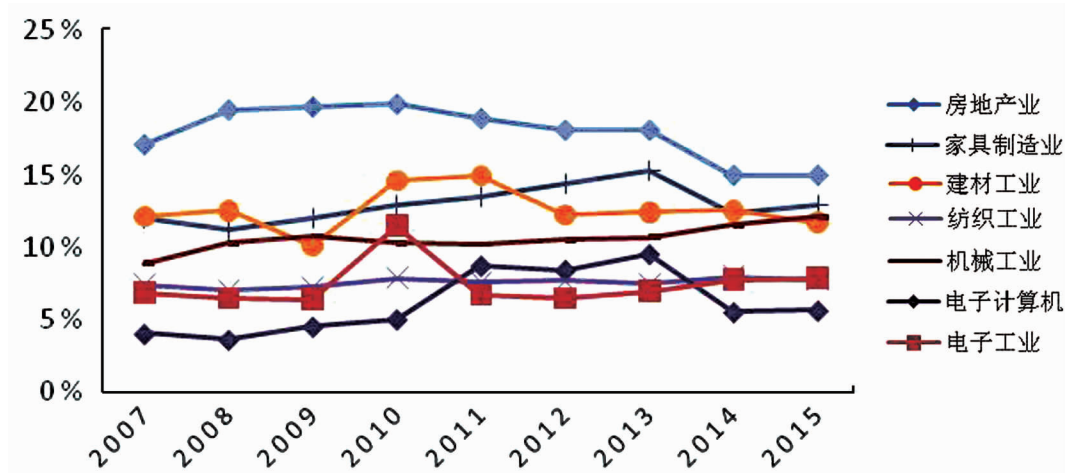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5年我国全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

数据来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分发挥。而且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技术创新，均需要充足的资本支持，房地产量价齐升引发的资本“虹吸”现象对此有害无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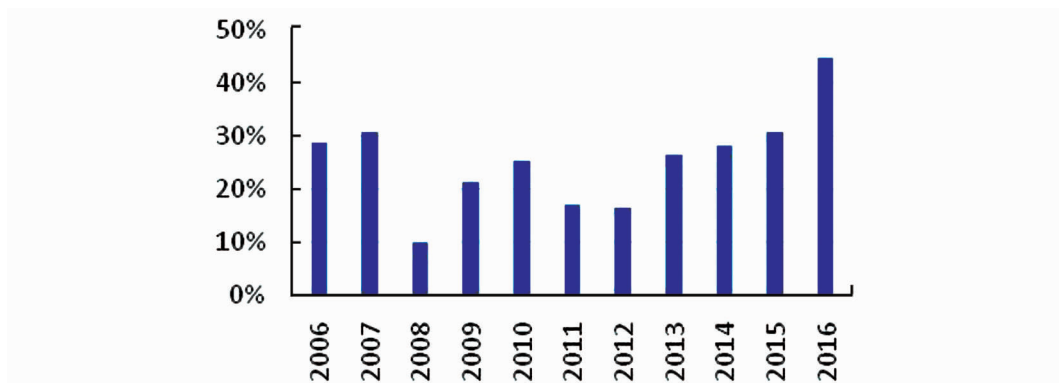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16年我国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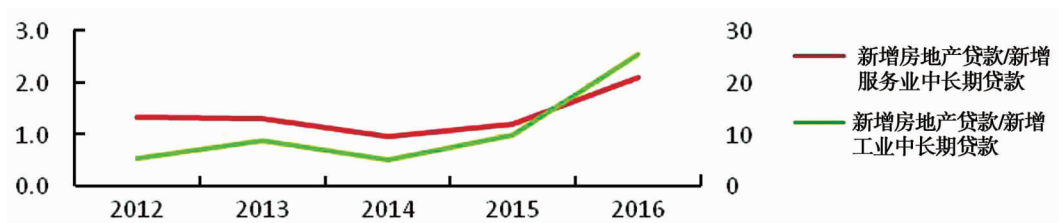


图3 2012—2016年我国历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工业、服务业中长期贷款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第二，从长期看，作为一种物质财富形式，房地产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过高，构成了威胁经济稳定乃至经济安全的实质隐患。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不到9%一路上升到2016年的13.7%，这一比值即使与美国2008年之前10年的房地产泡沫时期的对应数据相比，也显得过高（见图4）；加之同时期价格的不断上涨，房地产占居民非金融资产的价值比重一直保持高位。笔者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推算，这一比例在2014年达到90.7%。在这样的高比例背景下，参考美国、日本等国房价大起大落的经验可知，一旦房地产价格稳定性出现不足，则该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将较差。另一方面，随着国民财富中房地产所占比重的持续增长，当面对如地缘政治不稳定等“黑天鹅”事件时，我国财富结构背后所隐含的产能力量是否具备足够的抗危机能力，着实令人担忧。

结合上述讨论可见，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过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任务紧迫且意义重大。然而，就我国目前出台的多种调控政策而言，其市场效果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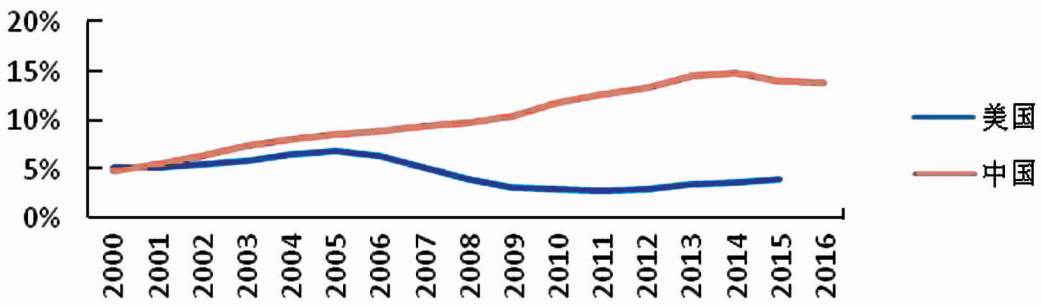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16年中美两国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

注：中国数据通过房地产投资完成额/GDP得到；美国数据通过房地产业私人投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住宅投资加和，与GDP作比得到

并不理想。这亟需我们进一步分析、认清房价背后的支撑机制，溯本清源，从根源入手施以对策。

二、房价飙升的财富预期根源

当前流行的观点认为，房价上涨无非是由市场供求失衡所致。一方面，需求面受益于近年来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导致刚性需求集中释放及投资需求快速上升，从而推动近年全国城市商品房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商品房销售额大幅增长。另一方面，供给面却并未随需求变化而积极调整，从全国范围看，商品住房的供应面积和可售面积提升有限，在若干重点一线城市甚至出现下降。由此，供求双方的非对称变化共同推动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然而，这一关于房价形成机制的讨论尽管看似完整，却忽视了房地产市场所独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房地产是兼具消费品与投资品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因此在形成估值的过程中易于对其形成看涨的财富预期。

（一）房地产财富预期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

所谓财富预期，实质上是指对资产的增值、获利能力的预期。对于房地产而言，其居住功能导致其虽为投资品却带有必需品属性，而土地供给条件在短期内又难以出现重大调整，因此房地产与其他类别的财富存在一个重要差异，即倾向于形成一个易于向上调整、难于向下调整的“价格预期之锚”。一般而言，房地产的“价格预期之锚”主要会受如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甚至强化。

第一，房地产本身具有的投资品属性，会使房价一旦上涨即能为房地产持有者带来回报，从而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预期，这将强化“价格预期之锚”易于向上调整的特

性。尤其在我国，长期以来的房地产价格主要呈持续增长的态势，而历史数据又是市场主体形成预期的重要依据，因此长期上涨的房价引导着市场参与者进一步看涨房地产，并形成更加易于向上调整的财富预期。此外，对我国的个人和家庭而言，当前投资选择的空间比较狭窄，在有限的选择中（储蓄、股票、基金等其他金融产品，房地产等），价格持续上涨的房地产具有一定优势；而对机构投资者来说，房地产价格的增速亦领先于大多数行业的利润率。投资领域的狭小和行业利润的不平衡从客观上导致房地产对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力，成为支撑房地产财富预期的重要因素。

第二，市场主体由于存在认知局限，因此倾向于对强化、提升“价格预期之锚”的市场信息出现过度反应；而对弱化、降低这一“价格预期之锚”的市场信息反应不足，最终导致关于房地产的财富预期容易呈现一种正向的循环攀升。这对房价的影响程度甚至远超真实供需条件所能解释的范围，即观测到的市场购买行为主要源于财富预期驱动的过度投资需求，其远远脱离了真实的市场需求曲线，这从新近设立的某国家级新区所引发的狂热购房意愿可见一斑。

第三，“价格预期之锚”还构成了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参考点，进一步助推了预期易于向上调整的趋势。当社会及市场环境导致出现对房地产的乐观财富预期时，对于购房者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购买（开发）房地产并在未来获得增值收益”就构成了其决策的参考点。这样一来，如果当前尚未购房（开发），则意味着处于相对损失的状态中。而当个体处于相对损失状态下，他会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损失厌恶心理和追逐风险的倾向，故市场参与者为了向参考点靠拢、减少心理上的损失，不惜采取高杠杆借贷等高风险手段，盲目投资、开发房地产。所以当市场普遍持看涨预期时，房地产市场往往会出现供需两旺，从而引发量价齐升及投资趋同现象的加剧。与之伴随的是，上涨的房价和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往往又会构成对预期的正反馈，从而不断强化预期，使房地产财富预期与房地产量价齐升之间的循环机制更为固化。

从上述讨论中可见，如何引导预期，尽早打破预期自我强化和固化的“恶性循环”，是当下平稳房地产量价、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稳定的关键所在。然而，回顾我国多年以来主要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却在应对房地产财富预期方面收效甚微，或者根本未对预期的潜在作用予以重视，很多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预期易于向上调整的特性。这构成了现阶段调整房地产政策的重要挑战。

（二）当前房地产政策对财富预期的调控失效

如上所言，如果脱离了房价上涨的财富预期根源，将使对房价的调控措施有“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之嫌，难以实现预定目标，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会使市场结果进一步恶化。

以当前最具代表性的限购、限贷政策为例，其实质仅仅是提高了购房难度，而由财富预期驱动的投资需求本身并未消失。具体而言，限贷、限购政策的本意是通过提高购房成本、限制购买资格等手段，来达到抑制过剩投资需求的目的。但其最终结果却仅是限制了一时的销售量，而需求本身并未消失，甚至有强化的可能。究其原因就在于，限贷、限购作为行政调控手段，具有典型的暂时性特征，并且市场参与者亦可预期到这一点，因此长期看好房地产的财富预期根本未受影响。且这种人为限制购买的政策无法取信于民，反而会强化房地产的“稀缺感”，无形中进一步推动了关于楼市的看涨预期。因此，一旦放松调控后，先前被压制的投资需求将迅速反弹而有余，导致房价的上涨之势更为猛烈。而且伴随着一次次“调控—抑制—松动—反弹”的过程，决策者的调控决心和效果越发受到市场参与者的怀疑，再加之政策出台过程中媒体的过度宣传，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

另一方面，单纯依靠增加土地供应量亦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这类政策寄希望于增加市场上的住房供给以满足需求，从而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然而，城市建设用地本就有限，特别是房价增长迅速的一、二线城市，绝大多数土地业已开发，增加住宅供地难度很大。据各地国土资源局数据显示，2011—2016年，北京的住宅类用地年供应面积由613万平方米下降到134万平方米，上海由1124万平方米下降到467万平方米，深圳则由128万平方米下降到26万平方米，足见城市住宅用地的紧张程度。因此，在看涨预期不改变的前提下，新增的小部分土地供给将难以满足被预期不断推升的投资需求，甚至还会强化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房地产供应上的卖方垄断地位。

统而言之，上述这些政策措施普遍陷入了陈旧且“庸俗”的基于短期“供—需”分析的思维定式，即意图通过压制需求、扩大供给的方式影响价格，殊不知房地产供需两面均深受市场参与者预期行为的影响，因此调控政策若不能有效引导预期，其效果定然不佳。需强调的是，决策机构的预期管理失位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楼市的财富看涨预期。例如，当楼市普遍存在难于向下调整的“预期之锚”时，再辅以“人口众多”“城镇化过程尚未结束”等客观信息的过量刺激，或“房地产税法今年未列入立法程序”的过于确定性的表述，以及诸如“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仅意味着“抑制过快”而不“抑制上涨”的官方暗示，均会经由市场参与者的过度反应而体现为看涨的财富预期。而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上涨，唱多房地产的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加之政府屡次出台调控政策却未能从根本上实现平稳房价的目标，也引发了媒体对调控政策的不当宣传，导致各种

新闻报道、专家解读无论其本意如何，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强化房地产预期之锚的“推手”。因此，如何对房地产市场正确施以预期引导，才是当下平抑房价、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稳定的关键所在。

三、引导楼市财富预期，激发经济增长动力

结合上文的分析与现有政策的不足可以看出，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稳定，需从引导财富预期着手，并配合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精准调控，打好组合拳，才能实现标本兼治。具体而言，调控需从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与消费品属性两方面入手，并应综合兼顾房地产市场各利益攸关方的行为调控，通过弱化房地产的盈利预期和升值预期，进而弱化其长期看涨的财富预期。

（一）基于房地产双重属性的预期引导政策

鉴于房地产市场所具有的投资品与消费品双重属性，我们需分别探讨基于不同属性的预期管理措施。

第一，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可运用税收制度提高房产的持有成本，这无疑是控制其未来收益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平抑过快的看涨财富预期。鉴于暂时性的行政命令无法有效介入并引导预期，故相应的调控政策必须具备可持续性。而税收制度与市场机制更易于契合，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制度供给改革，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能够有效进入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之中，这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因此，推行和完善有关房地产的税收制度，是当下引导预期、平稳房价的核心政策措施，从而使房地产真正恢复“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本来面目。对此，笔者认为：一是应尽快推行针对房地产的统一遗产税制，以调整、引导市场参与者的长期财富预期。二是推进房产税制，增加房产的持有成本，以调整市场参与者的短期财富预期。可重点将以投资为目的的二套、多套住房作为遗产税和房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并制定明确的颁布时间表，保证制度的有序推行和长期稳定。三是在税制制定上需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别性的精准调控，将税率制定权限交予地方政府，逐步通过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金。四是降低二手房交易的契税和营业税，适度放宽免征标准，为资本退出房地产市场创造条件。

第二，对于房地产的消费品属性，我们需完善其在居住功能方面的多元化供给。进而言之，相较于增加有限的住宅供应，更重要的应在于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产品结构，在充分满足居民居住需求的基础上来引导房地产回归本质属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

稳定关于房地产的财富预期。具体而言：一是对居民首套自住住房的购买，应予以一定形式的政府补贴，补贴资金可通过向多套房产持有者征收房地产税取得。参考其他国家如英国等在相似城市化阶段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可在若干城市试行第二套以上房产需面向市场租赁一定年数，才准予在二级市场买卖的政策。二是利用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渠道增加公租房供给，形成制度供给与产品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由于公租房产权不归个人所有，不具备投资属性，故而公租房能够有针对性地满足居住需求，且有助于还原房地产的本质属性。三是公租房供给同样也需针对不同城市和地区的市场现状“因城施策”，根据各地市场供求情况选择合适的供应量，并参考各地市场平均租赁价格制定合理租金水平。

（二）引导预期还需改变市场利益结构

诚如前述，房地产财富预期的形成不但与房地产的投资品—消费品双重属性有关，而且还与房地产市场的利益结构有关。在很多情形下，房地产开发商或地方政府等利益攸关方，往往会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驱动，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强化居民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财富预期。因此，引导预期还需改变市场利益结构，消除或减弱各利益攸关方对房地产财富预期的干扰或干预，完善房地产市场环境，以达到提升调控效果的目的。

第一，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由于近年来看涨预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房地产的投资需求旺盛，这推动开发商倾向于采取高杠杆融资、盲目拿地建房的粗放开发模式，导致市场金融风险急剧攀升。因此，需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融资监管，必要时可构建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房地产市场法规建设，必要时可面向房地产商开征超额利润税，以配合税收制度对房地产财富预期的稳定作用，同时也可均衡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相对利润率。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开发商真正改变依赖大规模信贷融资的粗放开发模式，从而弱化投资趋同现象，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向非房地产的实体经济领域。

第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增长，使得房价与地方政府的政绩之间联系紧密，这极大增加了平稳房价的政策执行阻力。因此，需逐步试行以房地产税来替代土地出让金。一方面可配合以遗产税为核心的房地产税收调控机制，另一方面也可弱化土地供给与地方政府政绩间的联系，消除地方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财务动机。在此基础上，应适时推进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防止地方政府在一轮轮的土地出让过程中由于不断提高土地起拍价而推升房地产财富预期。对此，在土地拍卖机制上可将相关地块周边的当期房价设为拍卖价格上限，并规定新竣工住房仅能以此价出售。同时，土地起拍价应以拍卖价格上限与新建住宅容积率共同决定。举

例而言，假设地方政府通过拆迁取得某地块的当期房价为 10000 元/平米，则该地块的拍卖上限以及新建住宅售价即规定为 10000 元/平米。又假设政府根据市场条件确定该地块新建住宅容积率须为 2，则该地块的土地起拍价应下调为 $10000/2 = 5000$ 元/平米，土地竞拍者需在 5000 元/平米~10000 元/平米之间竞价。这样一来，一方面可避免“地王”频生，以免房地产市场预期从土地拍卖环节就被强化；另一方面可通过限制开发商随意竞价来约束其开发成本，在客观上还可达到促进开发商加强企业管理、控制内部成本等目的。

第三，完善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弱化政府或媒体不当信息披露对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干预，以免人为增加由于市场主体对信息的过度反应而出现的额外市场波动，从而妨碍调控效果。

综上所述，以长期稳定的税收制度为核心，配合供给侧的精准调控，引导并稳定预期，是稳定房价、防止其大涨大落的关键所在和治本之策。以此为契机，平稳的房价将引导楼市中过剩的资本流向其他产业，这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平衡产业间的利润率差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进而激发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贺京同、徐璐：《主体行为、预期形成与房地产市场稳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1 卷第 5 期。
2. 贺京同、那艺、刘倩：《适度弱化投资趋同有利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 年 10 月 14 日。
3. 贺京同、那艺：《行为经济学：选择、互动和宏观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4. 贺京同、刘倩、贺坤：《市场化程度、供给侧管理与货币政策效果》，《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总量及结构预测

田 帆

摘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人口的支持，劳动力的供给将直接影响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本文利用人口年龄移算法预测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年龄构成，再通过回归分析法确定了劳动力供给与各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而对劳动力供给总量及年龄结构、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性别结构及素质结构进行了预测，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人口总量 劳动力供给总量 劳动力供给结构 年龄移算法 多元回归

作者简介：田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家层面，劳动力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资源或资本，对一个国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劳动力人口的支持，劳动力的供给将直接影响一国经济的正常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第一，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用工荒”问题自20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伴随企业用工成本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企业大批裁员、用工减少等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进一步凸现。第二，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趋于老龄化。未来我国即将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届时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将很可能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演变为负

担。第三，劳动力结构亟待优化。深化改革要求中国转变增长方式，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这需要优化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提升劳动者素质。

对未来劳动力总量进行测算是应对新形势下各种挑战的重要前提。本文将从人口学视角，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基础，对我国未来15年劳动力供给总量及结构变化进行测算，以期为我国宏观经济和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个国家劳动力供给数量是人口总量的一部分，而劳动力供给的预测可以理解成人口预测的一个分支领域。因此，迄今为止，国内外不少学者运用统计学、数学、人口学等方法对不同国家及地区的人口进行过预测。总体而言，人口预测方法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以人口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方法。马尔萨斯于1798年提出的人口指数增长模型可以看成是最早的人口预测模型，该模型假定人口的相对增长率是常数，人口预测采用指数增长函数。他利用几百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资料对未来人口进行了预测。^①后来，荷兰的数学家、生物学家 Verhulst 于1838年对马氏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 logistic 人口预测模型，该模型考虑了环境的约束。^②1945年 Lewis 和 Leslie 以凯菲茨矩阵为基础，建立了 Leslie 矩阵，将矩阵引入了人口预测方法之中。^{③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斯通（Stone）于1970年提出了人口投入产出模型，他把投入产出技术的分析方法用于人口系统的建模分析中。人口投入产出模型不但反映了人口系统的动态特点，还提供了人口核算信息。^⑤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年龄段的人口加上迁入人口除去死亡和迁出人口将会在下一个时间段进入到下一个年龄段；该方法考虑了分年龄段人口的出生、死亡及迁入迁出情况，利用了数学上的矩阵理论，借用了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思想，是一种较为严谨的人口预测方法。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在斯通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人口年龄移算的方法对我国分年龄段人口进行了预测。李晖和陈锡康根据我国2000—2009年

① Malthus T.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陈锡康、杨翠红：《投入产出技术》，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Lewis. On the generational growth of a Population. *Biomatrika*, 1942 (06): 93—96.

④ Leslie P. H. On the use of matrices in certain Population mathematics. *Biomatrika*, 1945 (33): 183—212.

⑤ Stone R. Demographic Input—output: An Extension of Social Accounting//Contributions to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put—Output Techniques. North Holland Publishers, Geneva, Switzerland. 1970: 293—319

的数据，以5年为一个年龄段进行移算，预测了我国2010—2030年的人口总量，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将会在2026年达到峰值140533.9万人。^①孟令国等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期数据，同样以5岁为一组，根据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设定了三种不同的生育率方案，预测了我国2015—2050年的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结果显示若实施比二胎政策更宽松的计划生育方案，那么我国老龄化人口结构特征将得到很大缓解。^②

第二类是以数学理论为基础的方法。任强基于ARMA模型对我国2010—2050年期间每5年总人口做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历史最大值14.35亿，之后开始下降。^③蒋辉采用灰色模型对我国2015—2030年人口做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在2015年、2020年、2025年、2030年分别达到13.48亿、13.60亿、13.68亿、13.73亿。^④易亮用灰色模型对我国未来人口变化的预测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在2015年、2020年将达到14.23亿、14.83亿。^⑤董环宇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5岁为一组预测了我国人口，结论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以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⑥

第二类方法相比第一类方法，具有更强的普适性，不仅可以进行人口预测，还可以进行股票、房价等很多其他领域的预测。然而，普适性意味着模型本身并没有考虑人口问题所特有的变化规律。相比较之下，第一类方法将人口作为内生系统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思考，考虑了现状、出生率、死亡率、迁入迁出率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人口预测而言，第一类方法比起第二类方法更为规范，有着更高的期望准确度。

此外，关于劳动力供给的预测，很多学者通过年龄移算的方法预测出了我国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但很少有学者对经济活动人口即劳动力供给进行较为严谨的预测。

①李晖、陈锡康：《基于人口投入产出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及分析》，《管理评论》2013年第2期，第29～34页。

②孟令国、李超令、胡广：《基于PDE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及研究》，《中国人口》2014年第2期，第132～141页。

③任强、侯大道：《人口预测的随机方法：基于Leslie矩阵和ARMA模型》，《人口研究》2011年第35卷（2），第28～42页。

④蒋辉：《我国人口预测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11期，第142～145页。

⑤易亮：《基于MATLAB的人口预测方法分析》，《价值工程》2012年第9期，第226～227页。

⑥董环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分析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征文，2009年。

三、研究设计、基本假设与研究方法^①

(一) 研究设计

由于人口普查年度的人口数据会包括每一岁的人口数量,比起其他年份更为准确详细,因此本研究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年份的2010年作为基期年份。首先以每一岁为一组通过年龄移算的方法对我国未来各年龄人口进行预测,然后以现有数据为基础求出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回归关系,进而预测出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预测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未来劳动年龄人口预测。预测的基本过程是: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的相关数据,计算基期各年龄人口数;按照各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预测各年龄人口死亡率和新生人口产生比的平均趋势值;根据人口产生比,计算新一年度0岁新生人口数,结合上年度各年龄人口数,计算新一年度0岁及以上各年龄人口数;计算出新一年度总人口及各年龄人口之后,可以依据新一年的数据不断计算出更新一年的数据,从而得到及其以后各年的人口预测数据。由于新一年度总人口由各年龄人口组成,依据新一年度0岁新生人口与1岁及以上各年龄人口,可以不断计算新一年度总人口及其各年龄人口数,从而得到基期以后各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并由此得出各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据。

第二步,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回归关系。按照各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经济活动人口为因变量,各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为自变量,求得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回归关系。

第三步,根据前两步的结果,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同时分析劳动力供给中的年龄、性别及素质结构。

(二) 基本假定

国际人口流动影响忽略不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际人口流入和流出对我国人口变化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相对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影响有限。在本研究中,假定国际人口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和结构在未来仍保持稳定,即国际人口流动对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就可以简单忽略不计。

不考虑宏观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本研究的立足点是假定现有人口、生育、教育

^①本研究全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htm>, 2014-11-01/2014-12-23。

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总量及结构变化，为未来国家宏观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启示，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考虑政策变化的影响。

不考虑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的影响。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对人口变化的影响是难以预测的，因此本研究不考虑这种突发事件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1. 通过 ARMA 预测各年龄人口死亡率

从我国人口统计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各年龄人口的死亡率虽然有波动，但随着时间推移都呈下降之势，这也是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造成人类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重要体现。考虑到未来人们生活水平以及现代医疗保健水平将会不断提高，本研究采用 1996—2010 年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数据为样本，通过 ARMA 模型对截止到 2040 年的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进行了预测。

如果时间序列 y_t 是它的当期和前期的随机误差项以及前期值的线性函数，即可表示为：

$$y_t = \varphi_1 y_{t-1} + \varphi_2 y_{t-2} + \cdots + \varphi_p y_{t-p} + u_t - \theta_1 \mu_{t-1} - \theta_2 \mu_{t-2} - \cdots - \theta_q \mu_{t-q} \quad (1)$$

则称该时间序列 y_t 是自回归移动平均序列，式 (1) 为 (p, q) 阶的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记为 ARMA (p, q) 。 $\varphi_1, \varphi_2, \dots, \varphi_p$ 为自回归系数， $\theta_1, \theta_2, \dots, \theta_p$ 为移动平均系数，都是模型的待估参数。

显然，AR 模型和 MA 模型都是 (1) 式的特殊情况，即对于 ARMA (p, q) ，若阶数 $q=0$ ，则是自回归模型 AR (p) ；若阶数 $p=0$ ，则成为移动平均模型 MA (q) 。

引入滞后算子 B，式 (1) 可简记为：

$$\varphi(B)y_t = \theta(B)u_t \quad (2)$$

ARMA (p, q) 过程的平稳条件是滞后多项式 $\varphi(B)$ 的根均在单位圆外，可逆条件是 $\theta(B)$ 的根都在单位圆外。可以证明，满足以上条件时，ARMA (p, q) 模型等价与无穷阶的 AR 过程或者是无穷阶的 MA 过程。

2. 通过年龄移算法预测新增人口

新增人口是每年存活的新生人口，即 0 岁人口。这是一个在人口预测中需要进行内生化处理的外生性变量。本研究采用秦中春提出的预测方法，并在该方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微调。该方法考虑了处于可生育阶段的人口总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实际出生率和婴幼儿保健水平的内在相关性，将其与处于可生育阶段的主要人口的总数量进行了关联，同时计算了新生儿人口出生率、新生儿人口死亡率和新生儿人口产生比率，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推算。由于我国 20 岁以下及超过 40 岁以后生育小孩的比率很小，因此将 20~40 岁之间的男女总人口作为可生育人口基数。新生儿出生率就是某年新出生的人口与可生育人口基数的比例。新生儿产生比率是新生儿出生率扣除新生儿死亡率后的余额。对新生儿死亡率，直接采用 0 岁人口死亡率。历史数据表明我国的新生儿出生率总的趋势是有所降低但波动较大，考虑到变化趋势对新生儿的影响，我们设定预测期的新生儿出生率为基期以前 6 年新生儿出生率的平均数。这样，假定基期以后新生儿产生比率不变，新一年度 0 岁人口由上一年 20~40 岁人口总数和新生儿产生比率决定。相关计算公式为：

某年新生儿出生率 = 当年 0 岁人口 / (1 - 当年 0 岁人口死亡率) / 上一年 - 20~40 岁总人口

基期新生儿出生率 = average (基期以前 5 年新生儿出生率)

基期新生儿死亡率 = 根据 ARMA 模型预测的 0 岁人口死亡率

预测期新生儿产生率 = 基期新生儿出生率 * (1 - 基期新生儿死亡率)

预测期 0 岁人口 = 上一年 20~40 岁人口数 * 基期新生儿产生率

预测期 1~100 岁及以上人口。新一年度某年龄段人口，是上一年度上一年龄段人口减去死亡人口，相关计算公式为：

预测期 1~99 岁某年龄人口 = 上一年底一年龄人口 * (1 - 本年该年龄人口死亡率 + 0.001)

这里预测期本年度 100 岁及以上人口数由上年 99 岁到本年度还存活人口和上年度 100 岁及以上人口到本年度还存活人口两部分共同组成。计算公式为：

预测期 100 岁及以上人口 = (上一年 99 岁人口 + 上一年 100 岁及以上人口) * 100 岁及以上人口死亡率

3. 通过多元回归预测劳动力供给总量

基于经济活动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一部分的事实，以及通过观察得出的二者之间的规律，我们设经济活动人口为因变量 Y，15~24 岁劳动年龄人口、25~54 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及 5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为自变量 X1、X2、X3，构建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回归方程：

$$Y = aX_1 + bX_2 + cX_3 + d + \epsilon \quad (1)$$

其中 a, b, c 分别为自变量 x1、x2 和 x3 的系数，d 为常数项，ε 为随机干扰项，又由于经济活动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一部分，我们设定 a、b、c 均小于 0，并且 d=0。

在国家统计局网站可以得到的以上全部现有数据的最近年份为 2003 年，因此我们选择 2003—2013 年数据作为样本，通过 eviews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时间序列回归分析过程中，为避免出现序列自相关性问题进而影响模型的拟合度，一般要求各变量为同阶单整序列，因此在具体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应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接下来的分析是否合理。

假定某个时间序列是由某一随机过程生成的，即假定时间序列 $\{X_t\}$ ($t=1, 2, \dots$) 的每一个数值都是从一个概率分布中随机得到，如果 X_t 满足下列条件：

均值 $E(X_t) = \mu$ ，与时间 t 无关的常数；

方差 $\text{Var}(X_t) = \sigma^2$ ，与时间 t 无关的常数；

协方差 $\text{Cov}(X_t X_{t+k}) = \gamma_k$ ，只与时期间隔 k 有关，与时间 t 无关的常数。

则称该随机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而该随机过程是一平稳随机过程。

检验变量是否稳定的过程称为单位根检验，其中最常用的是 ADF 检验 (Augmented Dickey-Ful Test)，其检验方法是通过下面三个模型完成的：

$$\Delta X_t = \gamma X_{t-1} + \sum_{i=1}^m \beta_i \Delta X_{t-i} + \epsilon_t \quad (3)$$

$$\Delta X_t = \alpha + \gamma X_{t-1} + \sum_{i=1}^m \beta_i \Delta X_{t-i} + \epsilon_t \quad (4)$$

$$\Delta X_t = \alpha + \beta_t + \gamma X_{t-1} + \sum_{i=1}^m \beta_i \Delta X_{t-i} + \sum_{i=1}^m \beta_i \Delta X_{t-i} \quad (5)$$

t 是时间变量，代表了时间序列随时间变化的某种趋势。虚拟假设都是 $H_0: \gamma = 0$ ，即存在一个单位根，模型 2 与另两模型的差别在于是否包含有常熟项和趋势项。在实际检验时，一般按照模型 4, 3, 2 的顺序进行，何时检验拒绝零假设，即原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何时停止检验，否则就要继续检验，直到检验完模型 2 为止。

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经过一次差分变成平稳的，就称原序列是 1 阶单整序列，记为 $I(1)$ 。一般地，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经过 d 次差分后变成平稳序列，则称原序列是 d 阶单整序列，记为 $I(d)$ 。显然， $I(0)$ 代表一平稳序列。

四、实证研究

(一) 人口总量预测

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年份的 2010 年为基期，在保持现行人口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对中国人口总量进行预测，表 1 为我国未来总人口及年龄结构预测结果。中国未来总人口将先升

后降，未来中国人口峰值约为 14.26 亿人，峰值出现的时间为 2028 年（图 1）。中国 2015 年人口约为 13.76 亿人，2020 年约为 14.07 亿人，2025 年约为 14.24 亿人，2030 年约为 14.25 亿人，2035 年约为 14.09 亿人，2040 年约为 13.80 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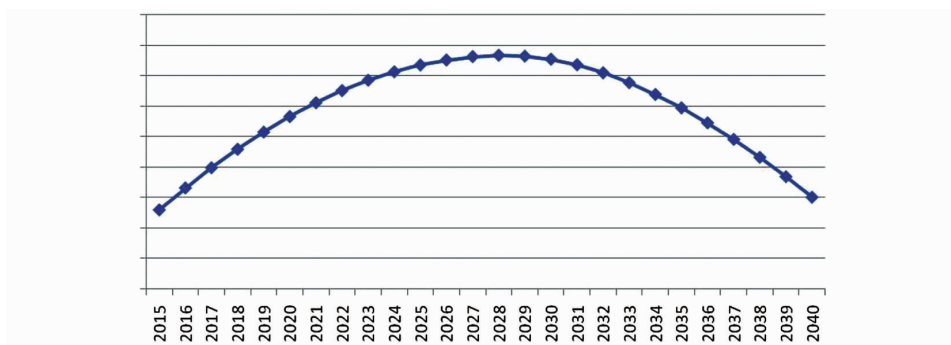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40 年中国总人口预测

表 1 2015—2040 年中国未来总人口及年龄结构预测

年份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总人口 (万人)	137608	140664	142352	142544	140950	138022
0~4 岁人口	7709	7319	6902	6404	5651	5346
4~9 岁人口	7536	7691	7302	6886	6389	5638
10~14 岁人口	7083	7531	7686	7297	6881	6385
15~19 岁人口	7483	7076	7523	7678	7290	6874
20~24 岁人口	9971	7470	7064	7510	7665	7277
25~29 岁人口	12717	9952	7456	7050	7496	7650
30~34 岁人口	10073	12681	9924	7435	7031	7474
35~39 岁人口	9671	10028	12625	9880	7401	6999
40~44 岁人口	11730	9611	9966	12549	9819	7356
45~49 岁人口	12371	11631	9530	9882	12443	9736
50~54 岁人口	10435	12221	11488	9414	9762	12293
55~59 岁人口	7722	10239	11988	11266	9233	9574
60~64 岁人口	7882	7480	9932	11620	10914	8946
65~69 岁人口	5555	7461	7068	9410	10996	10317
70~74 岁人口	3742	5060	6794	6422	8582	10012
75~80 岁人口	2809	3190	4320	5796	5454	7343
80 岁及以上人口	8737	10401	13423	17637	18851	23488

分年龄组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 2015—2040 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年人口均呈现逐步下降之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老年人口呈现逐步上升之势，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年人口的下降速度（图 2）。从构成上看，2010 年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 74.53%，少年儿童年龄人口的比重为 16.6%，老年人口的比重为 8.87%。2040 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减少为 61.0%，少年儿童年龄人口比重减少为 12.6%，老年人口增加为 37.0%。可见，未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少的局面。

（二）劳动力供给总量及年龄结构预测

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全是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即经济活动人口实际上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一部分，图 3 描述了 2010 年分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与分年龄段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情况。从图 3 中我们可以发现在 25~54 岁之间的年龄段，两者的差距很小，并且非常接近，15~24 年龄段有大量人口处于上学阶段，而 55~64 岁年龄的很多人已经或正在进入退休阶段，因此 15~24 岁和 55~64 岁两个年龄段两者的差距相对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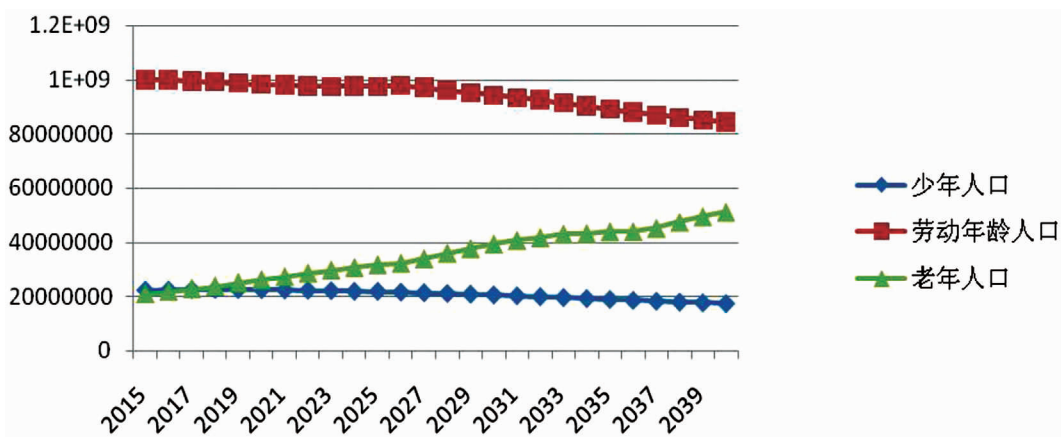


图 2 2015—204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少年人口及老年人口预测

基于经济活动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一部分的事实以及通过观察得出的二者之间的规律，我们设经济活动人口为因变量 Y ，15~24 岁劳动年龄人口、25~54 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及 5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为自变量 X_1 、 X_2 、 X_3 ，构建经济活动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回归方程：

$$Y = aX_1 + bX_2 + cX_3 + d + \epsilon \quad (6)$$

其中 a ， b ， c 分别为自变量 x_1 、 x_2 和 x_3 的系数， d 为常数项， ϵ 为随机干扰项。又由于经济活动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一部分，我们设定 a 、 b 、 c 均小于 0，并且 $d=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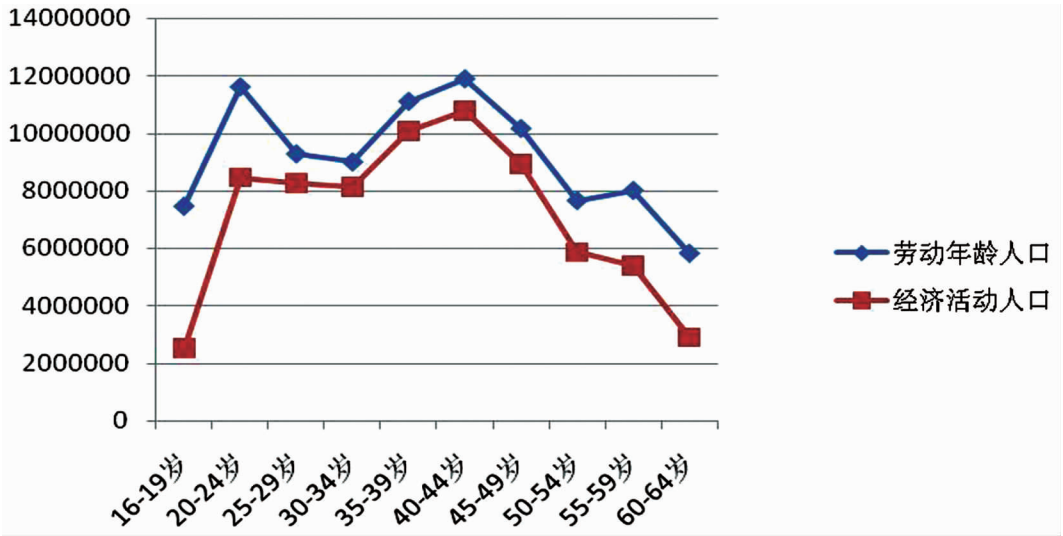


图 3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关系

在国家统计局网站可以得到的以上全部现有数据的最近年份为 2003 年，因此我们选择 2003—2013 年数据作为样本，通过 eviews6.0 软件对 (1) 式中的 a、b、c 进行计算，得到如下结果：

模型的 R^2 达到了 0.9， X_1 、 X_2 、 X_3 的 t 检验值也都超过了 5% 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通过了 t 检验，模型总体而言拟合度较好，并由此得出经济活动人口与分年龄段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回归方程：

$$Y = 0.51X_1 + 0.96X_2 + 0.31X_3$$

根据回归方程以及之前分析得到的 2015—2040 年分年两段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对 2015—2040 年间我国劳动力供给情况进行了预测，结果如表 2 和图 4 所示。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会在 2016 年就达到峰值，约为 78496 万人，随后开始逐年下降。25~54 岁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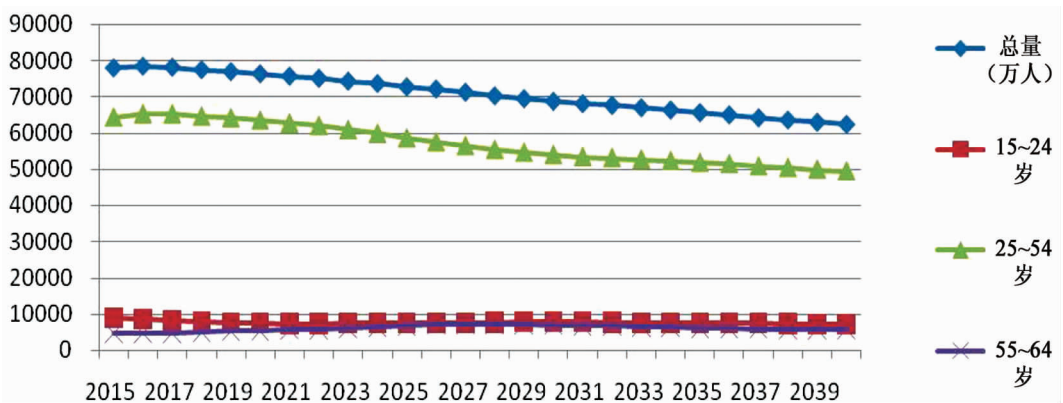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 2015—2040 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趋势

段的劳动力供给量变动趋势与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在 2016 及 2017 年到达峰值约 65226 万人，随后开始逐年下降；15~24 岁年龄段的劳动力供给量会呈现波动平缓下降的趋势；而 55~64 岁年龄段的劳动力供给量会先升后降，在 2027 年达到峰值 7308 万人，随后开始逐年下降。

表 2 中国 2015—2040 年劳动力供给总量及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量 (万人)	78055	78496	78236	77532	76997	76391	75739	75186	74353
15~24 岁	8902	8529	8166	7791	7587	7419	7383	7383	7393
25~54 岁	64316	65226	65226	64583	64095	63480	62661	62029	60887
55~64 岁	4837	4742	4844	5158	5314	5493	5695	5773	6073
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总量 (万人)	73700	72785	72187	71336	70311	69515	68802	68140	67704
15~24 岁	7478	7440	7518	7619	7714	7732	7746	7732	7708
25~54 岁	59805	58550	57483	56409	55385	54595	53961	53421	53117
55~64 岁	6417	6795	7187	7308	7212	7187	7094	6987	6879
年份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总量 (万人)	67035	66401	65665	65041	64247	63628	63006	62407	
15~24 岁	7655	7596	7627	7543	7459	7382	7300	7217	
25~54 岁	52729	52309	51793	51419	50781	50372	49926	49448	
55~64 岁	6652	6496	6246	6078	6007	5874	5780	5741	

(三) 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结构预测

相比人口的年龄，人口的性别结构存在着极强的稳定性，有基期数据，只需要考虑死亡率一个因素就可以通过人口的年龄移算法较为轻易地计算出未来 15 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性别结构，计算结果见图 5。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都呈现波动下降之势，同时女性人口的下降速度高于男性，即劳动年龄人口中的男女人口比例在未来将会呈现上升之势。

(四) 劳动力供给的素质结构预测

2010 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经济活动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 3.34%、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2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48.66%，高中文化程度占 14.28%、大学专科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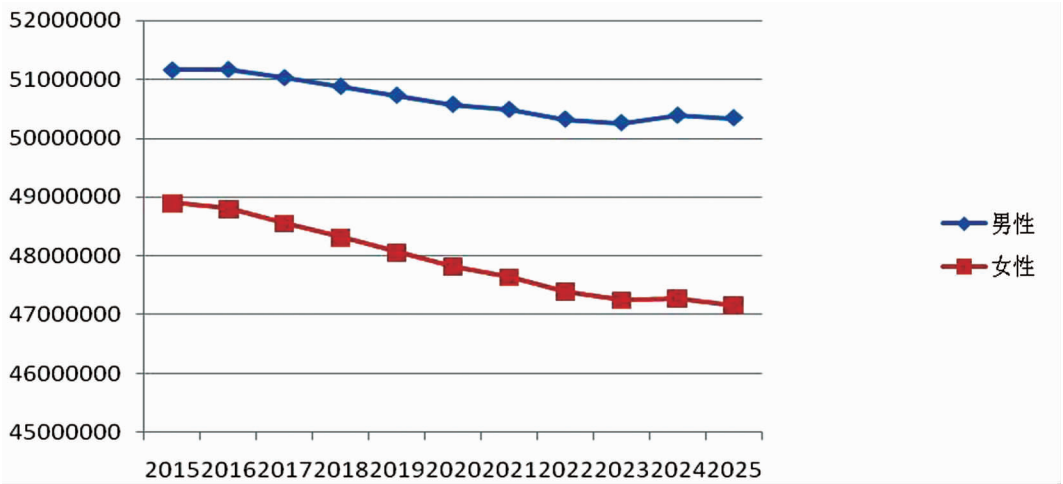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2015—2025年劳动年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趋势

6.13%、大学本科占3.75%、研究生占0.38%。可见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仍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整体素质依然不高。

根据《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安排，我国在2020年要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扫除青壮年文盲。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

虽然根据教育部出台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中提出要稳定招生规模，但未来一段时间内本科生教育招生仍然会逐步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招生规模即便提升幅度也比较小。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减少，中国未来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和研究生文化程度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比例仍然会逐步提升。

国务院于2014年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要达到2350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要达到1480万人。随着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中国未来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和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劳动力占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比例仍然会逐步提升。

中国目前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接近100%，随着义务教育的发展，中国未来未上过学的劳动力将会逐渐消失。由于义务教育普及率已接近100%，而国家在未来要进一步普及高中教育，因此中国未来初中文化程度劳动力占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比例会有所下降。

五、结语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总人口会在 2028 年达到峰值 14.26 亿人，随后开始下降。

第二，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年人口会逐步下降，而老年人口会逐步上升，同时由于总人口的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会逐渐降低。

第三，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会在 2020 年之前便达到峰值约 7.85 亿人，随后会逐年下降，劳动力供给总量占总人口的比重会逐渐降低。

第四，我国未来 15 年劳动年龄人口中男女比例会进一步提高。

第五，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延长，研究生文化程度、本科生文化程度、大专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占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比例会有所上升，而初中文化程度和未上过学的劳动力占劳动力供给总量的比例会下降。

（二）政策启示

一是着力构建富有弹性的人力资源市场。宏观层面，要打破城乡、地区、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身份转化限制，消除歧视性、限制性规定，构建全国统一的人力资源大市场，促进人力资源高效有序流动。政策方面可积极利用“互联网+”计划，加快建立普惠、互通的就业信息平台，降低工作搜寻成本，减缓摩擦性失业；同时推动创业信息、创业服务、创业孵化有机集成的大平台建设，为创业者和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从微观层面，可鼓励用人单位实施弹性工时和差异化工时，通过前者增加有效工作时间，后者为中老年劳动力适当缩短工时和劳动强度、进而为年轻劳动力提供更多进入机会。

二是稳步调整就业年龄上限。对劳动市场人口的年龄进行管制是劳动就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劳动者就业年龄在政策上不设上限，而我国现行政策规定的上限偏低。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及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持续降低，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调整相关就业政策，给老年劳动力更多选择机会，包括选择继续就业或退休。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动应当在满足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普遍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公共政策的家庭化和家庭支持政策的普惠化、养老保险预期权益的清晰化和退休金增长的机制化、社会态度的正面化和涉稳风险的可控化等四个条件的基础上稳步推动，动态调整。

三是进一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探索本科及以上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打通职业教育中专、大专到职业教育本科以及研究生的上升渠道，实现学历资格证书与职

业资格证书等同，打破职业教育学生向上发展的天花板。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培训的社会认证体系，为参与不同渠道职业教育的技术工人设计不同的上升渠道，打破社会阶层禁锢，建立通畅的社会垂直流动渠道。按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要求，围绕市场需求对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培养模式进行优化与调整，在提升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的同时，不断强化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加大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

四是加速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人口红利也即将转变为人口负债，基本养老保险将面临重大财务危机，因此必须加快养老保险改革速度，弥补养老保险缺口。首先，要合理确定补充保险税收优惠水平，提高企业和个人供款比例；然后，要参考税优商业健康保险试点办法，搭建兼顾保障和增值双重功能的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框架，充分激发社会养老储蓄需求。最后，参考美国个人退休账户做法，要探索引入个人养老投资账户，发挥自主投资优势，允许未能参加税收递延养老保险的个人，按照同等税惠比例把部分收入存入专门开设的个人养老投资账户，作为又一个自主储蓄补充保险形式。

（三）研究展望

本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了学术水平和研究背景的局限。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拓展。

第一，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本文所用数据除人口普查年份外，其余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人口抽样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比起人口普查数据在准确度上会有一些差距，因此也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预测结果的偏差。在将来，随着大数据及统计技术的进步，我们还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结果。

第二，死亡率预测的修正。本研究预期各年龄的人口死亡率采取了 ARMA 模型，虽然短期来看随着人口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人口死亡率的总体趋势一定是下降的，但人口死亡率并不会无限期地不断下降，本研究的预测结果在长期可能会略微偏大。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数据预测与专家咨询结合的预测方法对人口死亡率的预测方法进行修正，得出短期长期均适合的预测方法。

参考文献: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
2. 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
3. 陈锡康、杨翠红:《投入产出技术》,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4. 李晖、陈锡康:《基于人口投入产出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及分析》,《管理评论》2013 年第 2 期。
5. 孟令国、李超令、胡广:《基于 PDE 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及研究》,《中国人口》2014 年第 2 期。
6. 任强、侯大道:《人口预测的随机方法:基于 Leslie 矩阵和 ARMA 模型》,《人口研究》2011 年第 35 期。
7. 蒋辉:《我国人口预测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5 年第 11 期。
8. 易亮:《基于 MATLAB 的人口预测方法分析》,《价值工程》2012 年第 9 期。
9. 董环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分析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10. 杨雪:《欧盟共同就业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1. 赵建国:《城市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12. 蔡昉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商务印书局 2005 年版。
13. 曾湘泉:《劳动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14. 夏杰长:《增长就业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15. Malthus T.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Lewis. On the generational growth of a Population. *Biomatrika*, 1942 (06).
17. Leslie P. H. On the use of matrices in certain Population mathematics. *Biomatrika*, 1945 (33).
18. Stone R. Demographic Input - output: An Extension of Social Accounting//Contributions to Input - Output Analysis: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put - Output Techniques. North Holland Publishers, Geneva. Switzerland. 1970.

责任编辑:谷 岳

· 区域 经济 ·

从文化理念和制度安排视角 “查短板”“补短板”

黄 勇 傅金龙 潘毅刚 董 波

摘要：“短板”是影响全局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查找“短板”、补齐“短板”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照“十三五”时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浙江省发展中的突出“短板”主要来自：按照高水平要求不达标的领域、按照均衡性要求不平衡的领域和按照增优势要求不适应的领域。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浙江发展中创新、开放、综合交通、都市区一体化、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等六方面的短板比较突出。本文尝试从文化理念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剖析原因，提出革新补齐短板的方 向。

关键词：文化理念 制度安排 查短板 补短板

作者简介：黄 勇，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傅金龙，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潘毅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处处长、副研究员；

董 波，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社会处处长、高级经济师。

“短板”是影响全局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查找“短板”、补齐“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对照“十三五”时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浙江省发展中的突出“短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按照高水平要求不达标的领域，补齐这类“短板”本身就是发展。二是按照

均衡性要求不平衡的领域，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严重影响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类“短板”不补齐将影响全局发展的成效，消解既有优势。三是按照增优势要求不适应的领域。这类领域原先差距不明显，但由于竞争加剧、发展阶段变化，已明显滞后，成为突出劣势，就必须着力加强。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浙江省发展中创新、开放、都市区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六方面的制度短板比较突出，亟需找准原因，从观念、制度、决策等层面革新，并加快补齐。

一、导致创新不足的“短板”根源在于过于功利的文化理念

近年来，浙江省在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不俗进展。目前，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5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全国第3位，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居全国第2位，研发（R&D）经费支出占全省生产总值（GDP）比重达2.3%，被列为全国首批创新型试点省份。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不够快、新兴产业占比还不够高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之所以存在这些不强、不快、不高的问题，表象上看是创新投入不够，创新人才和资源集聚不足，科技创新与产业“两张皮”体制缺陷等等，但从根源上追溯，阻碍浙江省向创新驱动加速迈进的根本性“短板”，却在于过于功利的文化理念，形成创新难、浅创新甚至假创新的发展路径依赖。

（一）过于功利的创新文化容易锁定浅层次、低端化的产业创新路径

一直以来，浙江企业处在一种较为功利的文化氛围中，全社会赚“快钱”的思维较为盛行。近些年，在企业创新活动中，“三多三少两低”现象较为突出：商业模式创新的多，科技创新的少；跟风模仿创新的多，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的少；技术引进、代工贴牌的外围低端创新的多，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核心和关键领域的突破少；企业创新成果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品质低。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不少企业戴着“高新技术产业”光环，却从事着“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益”环节生产。近年来企业投资热潮中，从“炒矿”“炒煤”到“炒房”“炒大蒜”多有浙江企业的身影，却少有像深圳华为一类坚持实业创新、做大做强的创新型跨国企业。虽然这只是局部现象，但说明我们或多或少受文化基因中目光短浅、耐不住寂寞的因素影响依然较大。长此以往，发展有陷入低端锁定之虞。

（二）过于功利的创新投入观容易锁定动力不足和前瞻性不够的创新积累路径

典型表现是，重当下、轻长远，重物质、轻人才。创新驱动的根本在于人和技术，而技术又与人息息相关，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高素质人才被认为是创新获得成功的关键。

键因素。但多年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受理念禁锢，见物不见人，偏重有形设备、设施的建设投资，偏重短期能见效的技术应用思想较为严重，对科技人员和基础性技术创新的软性投入明显不足。2014 年浙江省发明专利授权量虽然列全国第 4 位，但只有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的 57.5%、60%和 68%。特别是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量明显偏低，2013 年浙江省申请 789 件，只有广东省的 1/14、江苏省的 2/3 左右。在创新型人才方面，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仅占 18.5%，平均每个研发机构拥有科技人员 59 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在企业层面，企业文化中短期、功利主义盛行，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对知识创新、长远战略规划以及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在政府层面，对科研技术人员还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方式，在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上，对知识和人才投入不够，约束有余、激励不足；在科技创新投入上，过于强调今天投入一定要在明天见效，舍不得进行大的、长期性投入，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这也使得浙江省在基础性研究和高端、核心、关键领域创新鲜有突破。

（三）过于功利的创新绩效观容易锁定鼓励“虚假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创新就是试错，不允许失败的创新不可能成功。即使在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强的美国，每年科技创新成功的也只是少部分，失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从现实中看，我们的科研项目验收，无一不通过，不是“国际领先”，就是“填补国内空白”“处于国内（省内）领先水平”。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包容失败的社会环境，使许多人不敢创新、不愿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创新精神。

从政府层面看，受唯胜论和速胜论的文化理念影响，创新政策不仅连续性不够，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行政化手段比较突出，多是对既有标杆企业的“锦上添花”，却少有针对更广大创新企业“雪中送炭”的普惠政策，更少有分散风险前期的天使投资和资助补偿。一些领导干部和相当多的社会资本都热衷于做能尽快见效的事情，不愿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总是想着如何“功成在我”，要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做出成绩，博得关注。根据有关部门对近年来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一项调查反映，不少政策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影响较小或没有作用。从政策实施效果不明显的的原因看，有近 70%的企业不具备享受政策的资格。

此外，一些地区缺乏系统思维，急功近利，热衷经营地产城市，忽视创新城市建设，导致生活成本、商务成本、运营成本不断攀升，阻碍年轻人、外地优秀人才流入，而这些人才恰恰是创新主力军。加快形成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政策普惠、成本较低的社会氛围和创新环境，已是当务之急。

二、制约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短板”

在于治理和资金结构开放不足

民营经济发达是浙江省经济最大的特色，在浙江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说，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成功就能实现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但必须看到，当前浙江省民营经济先发优势已面临严峻挑战。江苏省等兄弟省份的民营经济在总量、比重、投资总额、上缴税收上均超过浙江省，而浙江省民营经济结构调整仍显缓慢，“小、散、弱”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盈利水平降低。与此同时，作为有效投资的主力，民营投资意愿也趋于下降，浙江省企业家信心指数从“十二五”初的134.5下降并长期保持在110左右，企业景气指数从134.1下降到120左右。其中，工业领域企业家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也保持在120的低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缓慢有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但治理结构和资金结构开放不足是两大突出“短板”。

（一）治理结构开放不足

民营企业的治理模式一直以来是制约浙江省民营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跨越的重要因素。除了一些大型或上市民营企业采取了较为开放的股权结构，企业治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实现外，大多数民营企业尤其是传统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较为封闭，企业管理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管理和决策有较大随意性。有的民营企业管理者年纪过大、观念老旧，管理团队知识结构欠缺，开拓创新精神低迷，与接班人存在理念冲突，青黄不接。这些也是导致近年浙江省民营经济转型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资金渠道开放不足

转型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但封闭的治理结构也容易产生封闭的资金来源结构。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和民间借贷，再生产投资所需资金来源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金融杠杆运用不充分，可以用于股本投资的资金来源非常不足。近些年来，由于民营经济投资行为多分散，一些企业过度热衷于房地产等短期投资，互保联保、资金链断裂多有发生，也影响到浙江省投资环境，削弱制造业竞争力，进而导致产业升级缓慢，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同时，在产能过剩背景下，由于借助外部资源较少，民营企业开展跨省、跨境并购重组能力较弱。在许多通过重组完全有可能实现转型升级的领域中，大多数企业“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不甘心通过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实现“曲线”转型升级，缺乏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和胆识。

三、综合交通的突出“短板”

在于“综而不合”和“毛细血管”不畅

交通是区域生产力布局优化的引导性力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也是区域发展战略先导性领域，更是现代化水平的直接体现。“十二五”时期以来，浙江省交通建设成效显著，投资总额达到 5965 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 1.4 倍；高速公路里程达 3893 公里，面积密度居全国第 2 位；新增海港货物吞吐能力 3.4 亿吨（集装箱 709 万标箱）、内河港 0.65 亿吨；建成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新增旅客吞吐能力 2000 万人次；建成杭州东站等 10 个综合客运枢纽。随着交通多式联运发展要求、“智慧交通”建设要求和城乡居民特别是乡村生产生活升级的要求提高，浙江省综合交通建设的突出“短板”表现在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和乡村道路“毛细血管”这“两头”。

（一）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相对滞后

综合交通枢纽是现代综合交通集成式高效率发展的集中体现。浙江省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管理中的短板主要体现为：第一，客运枢纽多式联运便捷度不高。缺乏类似上海虹桥的集机场、城际客专、地铁、快速公路等于一体的综合型、一体化客运枢纽，杭州东站、宁波南站等与机场间尚无轨道交通，温州市、衢州市等市高铁站与市区客运站间缺乏快速交通。第二，货运枢纽规划建设滞后。宁波舟山港作为全球最大海港，通港铁路仅萧甬铁路一条，联通浙中地区乃至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的金甬铁路尚未开工建设，联通上海市、江苏省等地的跨杭州湾铁路通道尚处规划阶段，联通温州市、福建省等地的货运铁路尚未列入规划，宁波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海铁联运综合试验区是否建设仍未决策。类似的，杭州市、温州市、义乌市等市货运枢纽亦缺统筹规划，难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第三，交通枢纽信息化应用水平偏低。交通主管部门和大型交通枢纽虽设有信息平台，但政府属性强，所提供的可直接服务旅客的集卡车队、船公司、航空公司等的信息有效性偏低，信息服务的商业化水平与专业服务商培育较滞后偏低。第四，交通枢纽数据化开发应用刚刚起步。基于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的“车联网”“船联网”技术与应用仍在探索完善中，宁波舟山港“万联港”建设尚待规划，枢纽数据化建设步伐偏慢。

（二）乡村道路的“毛细血管”建设滞后

乡村交通网络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很重要，对农业现代化、乡村旅游培育、景区开发、新农村建设等意义重大。随着“村村通”工程深入，乡村交通网络虽已基本形成，但仍存在一些短板。第一，内部断头路较多，上下统筹不够。乡村道路基本为自筹项目，缺乏上级资金支持，部分县市乡村交通建设较慢，断头路较多（包括因缺乏养

护资金和力量导致的道路断头), 经济社会效益难以充分发挥。第二, 缺乏前瞻性综合规划, 部门间统筹不够。县乡公路、农村机耕路、通景道路(含绿道)分别由交通、农办、旅游三部门规划建设, 互不衔接现象比较突出, 部分连接线规划建设滞后。第三, 建设重复低效问题突出, 行业间统筹不够。乡村交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的跨行业发展统筹不够, 部分工程综合效益低下, 部分工程生态环境负面影响较大, 部分通景道路(绿道)建设滞后, 难以支持大旅游、大健康等产业发展。

四、都市区规划建设的“短板”在于协商与决策机制缺失

都市区是浙江省新型城市化的主体形态, 都市区经济是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主攻方向, 都市区社会是浙江省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愿景。近年来, 浙江省对都市区建设非常重视, 但都市区是跨行政区域的空间单元, 由于缺乏有效的协商和决策机制, 进展仍然不尽人意, 成为突出“短板”。

(一) 协商机制不够健全

第一, 协商模式“重具体、轻谋划”。协商模式过多依靠就某一具体领域乃至事项设立专项小组来深化推进, 碎片化现象突出, 而对都市区规划建设的整体方案、基本框架、重点任务、目标愿景及其推进时间表、路线图等顶层设计, 缺乏整体性研究和谋划。第二, 协商重点“重硬件、轻软件”。协商重点侧重于交通、通讯、电力、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布局一体化, 对深层次的公交、通讯、医保等基础服务协商突破不多, 在跨行政区域的县(市)中, 只有德清县开通了至杭州市区公交, 而通讯同城化、医保结算便捷化等基础服务尚无大的突破。第三, 协商着力点“重项目、轻制度”。协商多放在交通、产业园区、医院等具体项目上, 而对制度层面的建设与完善, 包括相关激励约束机制、要素无障碍化流动规范等, 研究不多、推进缓慢。

(二) 决策机制不够健全

第一, 缺乏权威的高层级拍板方。目前, 都市区协商一般是由核心城市牵头, 都市区内各城市地位平等, 有利的一面是能保持协商公平性, 不利的一面是影响协商的效率和瓶颈问题突破。从中国国情出发, 必要的上一级政府的斡旋、协商, 甚至是仲裁决策仍然不可或缺。第二, 缺乏权威的可超越行政边界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四大都市区已有省城乡规划部门组织编制的规划, 但缺乏权威性、约束力, 既因都市区规划内涵已远超城市规划, 更因规划执行缺少“超越一城而可约束一城”的高权威、高约束力的都市区规划委员会, 及其背后支持的体制机制和法规政策体系。第三, 缺乏权威的规划决策咨询机制。四大都市区定位总体正确但培育成熟度差别很大, 且湖州市、嘉兴市、绍兴

市、舟山市、台州市等城市的自身形态优化，以及应融入哪些都市区（含上海市）与其形式、路径，尚缺乏动态、前瞻的深度研究，缺乏能统一思想的权威决策咨询成果支撑。

五、影响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短板”在于标准化建设滞后

2014年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为89.51%，在统计评价意义上已非常接近均等化目标。但从人民群众实际感受看，这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有的地方资源闲置，有的地方供给短缺。总体来说，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资源远没有满足基本需求。近些年，我们不能说不重视，可实际效果却事倍功半。究其原因，可能与缺乏一套合理化的标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标准化滞后成为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的关键性“短板”。

（一）保障标准地区差异较大

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标准化中的“标准”是一种托底的标准，其设置目的是为了每个公众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但在地方政府具体提供公共服务时，往往根据地方财力自行确定标准，有些甚至以“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标准，导致了各地在具体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千差万别，也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如在2014年浙江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中，“文化体育与传媒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实现度在70%以下的3项指标之一。城乡之间因为缺乏对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的严格标准，导致基层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弱化，基层优质公共资源逐步流失。如浙江省基层医院床位占比近5年间从14%下降到了9.2%，年均减少2%，基层医务人员持续流失、医疗服务能力不断下降。广大人民群众只能蜂拥到大城市享用医疗服务，拥挤之下使得看病难问题长期难以缓解。

（二）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缺乏

突出表现在忽视人口变化因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资源闲置并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幼儿园、中小学校、老年人设施、医疗康复设施等的需求标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发生相应变化。不同区域之间由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分布密度等的差异，也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现行标准加以细化完善。但以往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往往简单地按照行政区划分块布局，服务对象上也是重点围绕本地户籍人口。随着浙江省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分布不断调整，流入人口也从打工型转向举家搬迁型，导致以往对服务对象和覆盖水平的考虑，难以适应人口布局和人口结构的新变化，使得公共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和部分资源严重闲置的现象并存。如近年来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速，6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9.44%，一方面全省百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只有3.3张，另一方面实际入住率又不高。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地处偏僻、远离老年人住所的民

养老机构却严重闲置。

（三）保障投入的权责和支付标准机制不健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现的是对全体公民权益的“托底”保障，既要依赖地方政府财政，也需要上一级政府的强力统筹。但目前财税体制改革尚未真正破题，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未能统一标准，使得直接承担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层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如浙江省虽然在2004年就已普及了15年基础教育，但随着大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到来，原有基层教育资源布局依然面临巨大冲击。浙江省的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将被纳入社保体系，但跨区域的财政横向转移支付政策体系尚未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责任比例尚未明确，人口流入地基层政府将承受巨大财政压力。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较大，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缺乏有效管理，一些场馆设施建成后因缺少后续资金难以发挥作用。浙江省将发展养老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但目前养老服务要素保障力度依然不足，突出表现在缺乏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优惠政策的落地细则和科学的定价补偿机制。

六、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在于长效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够完善

增强生态环境承载力，加快“两美”浙江建设，努力实现“天蓝、水清、山绿、地净”，既是现今人民群众的最大呼声，也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近年来，随着“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一系列强有力的环境整治组合拳的出台，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环境面貌大为改观。但要巩固生态治理成效，使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走得更远，还需补上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短板”。

（一）长效、到位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生态敏感区和保护区对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突出表现在对保护生态环境激励机制和正面导向不够明显。如对地方政府的生态考核倾斜不够，虽然在地方政府差异化考核上有了很好的探索，但总体来看还不能充分反映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同等重要性，容易导致地处重点保护区的地方政府也把大开发、大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问题。此外，因缺乏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机制，导致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不足。比如，国家对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按每年每亩17元的标准进行补偿，但是林农经营商品林每亩年平均收益可达200元左右，即便是荒山荒地每年租金也可达30多元，为保护生态，山区农民收入受到很大影响，自然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反映自然资源稀缺性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以排污权交易为例，浙江省排污权交易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市场活跃度不足，对推动“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能效有限。一方面初始分配权的依据不够科学，当前是依据目标总量倒推初始分配权，对

自然生态系统的真正“环境容量”研究不够；另一方面价格形成机制不够科学，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主要以污染治理成本作为定价依据，未能充分反映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

（二）执行有力的“硬约束”机制尚待强化，缺乏严格惩罚性罚款制度，导致违法成本过低、禁而不止

由于我国环境污染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加害人的排污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故意违法，所受惩罚差别不大；同时，环境污染受害人得到的赔偿，也仅限于在申请救济时有证据证明的已有损害的赔偿，不包括潜在损害。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过低，不利于打击故意违法排污行为。偷排企业也往往与监管执法者玩“猫捉耗子”的游戏，被检查时按规处理，监管执法者一走就停止处理装置运行，甚至偷偷直排。就算偶尔被执法查到，其处罚风险相比长期偷排所节省的巨额成本依然“值得”。而发达国家往往实施惩罚性罚款机制，如 1989 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在“瓦尔戴斯”号油轮泄漏事故之后，被认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被判罚 67.5 亿美元；2010 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英国石油公司同意赔偿 200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只有采用“惩罚性赔偿”，让偷排者一旦被抓后会被罚得倾家荡产，才能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三）环保公共设施和投入短板明显，阻碍了全民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型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过程中，推动公众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绿色化转变至关重要。目前，公众的生态意识已大有改观，反而由于相关公共设施落后，长期运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全民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步伐。比如，为了减少汽车尾气、降低大气雾霾，鼓励公共交通出行，但城乡公共交通不够完善，轨道交通建设不足，难以为群众提供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又如，当前治理污水如火如荼，也加快建设了一批污水处理厂，但没有配套完善的城乡纳污管网，旧城区下水管网尚未彻底改造，缺乏对污水处理厂运营的长期激励，则治理污水依然治标不治本。再如，当前大力鼓励垃圾分类，但在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没有真正的分类管理，垃圾焚烧等终端设备没能建设运营，则固废减量化努力依然是事倍功半。

七、补齐短板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完善决策、革新制度

以上六个方面的“短板”是笔者从特定视角切入分析的结果，这些“短板”看似关系科技创新、民营企业、交通建设、区域协调、民生事业和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但追溯“短板”产生根源，却都有其共性。那就是这些“短板”不仅存在于客观现实中，更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中，隐藏在既有制度安排中，很难察觉，容易忽视。因此，“短板”不仅要客观现实比较中去发现，更重要地是从思想根源、文化理念以及制度安排中去查

找。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真正补齐“短板”。为此建议：

（一）构建创新务实、宽容失败、注重长远的社会文化氛围

文化理念突破是最根本的创新。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理念创新作为补齐创新第一战略、第一动力的首要“短板”。加深社会各阶层对创新内涵的理解，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政绩观，全面纠正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认识，彻底摒弃违背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发展理念的做法，补齐思想上的“短板”，直面和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让务实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加快形成宽容失败、激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制度环境。优化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和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进一步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持续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前瞻眼光、高效务实的决策咨询机制

“短板”不是静止不变的，今天的“长板”也许明天就变成“短板”，一个旧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问题。比如，一直以来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优势突出，今天看却与一些后发地区相差无几，甚至某些方面开始落后。浙江省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总体走在前列，并适度超前，但随着发展要求和技术提升，却已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社会需要，出现了明显“短板”。由此可见，查出短板、补齐短板绝非一劳永逸，还需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动态地对照标杆、对照目标、对照发展要求去发现新“短板”。建议在重视培育建设一批新型特色智库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浙江省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咨询体制机制，针对重大问题决策广开言路，更充分地听取有关研究咨询机构及专家、企业家意见，甚至可以建立国际化顾问团队，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决策科学性。

（三）动真格加快改革创新，消除造成“短板”的制度性缺陷

“短板”的产生一定有制度性原因，补齐“短板”的关键在于进行制度性变革。无论是实现创新驱动、解决民营经济转型、交通建设以及都市区规划建设问题，还是民生和生态问题，制度改革创新都是“牛鼻子”。建议把制度改革创新作为补齐“短板”的关键抓手，立足全局、通盘考虑，扭住关键、精准发力，以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创新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制定民生服务供给标准等部门协调难度大、政策关联度高、改革成效显著的改革举措作为重点突破口，在评估前期改革成效基础上，按需适时推动新的重点改革举措，协调解决改革推进中的矛盾和问题。

责任编辑：李 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7 年 8 月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现 10 年来最广泛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菲尔德 2017 年 8 月 25 日表示，全球经济形势良好，将在五周后公布对全球经济的新预测，可能不会下调上次经济预测。2017 年 7 月，IMF 预测 2017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5%，2018 年将增长 2.5%。IMF 已观察到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更重要的是，经济复苏的基础很广泛，在过去 10 年都没有出现过。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没有令人感到担忧的事情。虽然全球经济现在没有下行风险，但存在较长期的风险。其中每个风险依然会导致经济增长不温不火。现在是经济周期性上升，但潜在经济增长仍然缓慢。这带来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且蔓延到了保护主义言论中。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 2017 年 8 月 26 日表示，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经济增长构成了“严重风险”。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在全球的贸易协议，以减少贸易逆差，并为美国制造商提供条件。

（二）世界经济下半年增速将小幅放缓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 2017 年 8 月 10 日发布调查报告说，2017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复苏，但增速将小幅放缓。报告显示，2017 年第三季度世界经济景气指数比上季度下降 0.3 点，但依然处于高位。发达经济体经济景气总体改善，欧元区尤为明显。英

国是发达经济体中唯一一个经济景气指数大幅下降至负值的国家。

伊弗经济研究所总部设在慕尼黑，是德国最大的经济智库之一。此份调查结果是来自 1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23 位专家进行访问后得出的。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在声明中说，受访专家对世界经济现状的评价远高于上个季度，但对未来走势的信心略降。

（三）2017—2018 年全球经济将持续增长态势

美国穆迪公司 2017 年 8 月 30 日发布报告，调整对多国经济增长预期，并提醒各经济体注意地缘政治风险、美国保护主义、全球货币政策趋紧的外溢效应。穆迪维持对 20 国集团（G20）2017—2018 年经济增长率略高于 3% 的预估，高于 2016 年的 2.6%。全球经济增长态势 2017—2018 年将持续，相信目前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有能力分别保持约 2% 及逾 5% 的增长率，而且长期仍有上升空间。

穆迪指出，由于 2017 年上半年亚太地区数据表现意外强劲，因此将中国 2017 年经济增长率预估由 6.6% 调升至 6.8%，将 2018 年经济增速预估从 6.3% 上调至 6.4%。韩国 2017 年经济增长率预估由 2.5% 上调至 2.8%，2018 年经济增速则由之前的 2.0% 上调至 2.5%。日本 2017 年增长率也由 1.1% 上调至 1.5%。不过，穆迪将印度经济增速预估从 7.2% 小幅下调至 7.1%，主要理由是该国 2016 年采取的废除大额纸币措施引发数月钱荒，制造业和建筑行业公司受伤尤其严重。预计未来几个月这一影响将减弱，下半年印度经济将稳固增长。

穆迪亦预计欧元区到年底前将加速成长，上调对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的经济增速预估。欧元区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经济将分别增长 2.1% 和 1.9%，快于 2016 年的 1.7%。穆迪副主席 Madhavi Bokil 表示，欧元区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其经济增长将在 2017 年剩余时间内加速。消费者信心达到 16 年新高，这预示着欧元区经济复苏将以消费者支出为驱动力。穆迪预计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将分别增长 2.2% 和 2.0%；2017 和 2018 年法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也由之前的 1.3% 和 1.4% 上调为 1.6%，认为其将受到净出口和投资的促进；意大利经济复苏将继续受益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以及欧盟经济走强，将其 2017 和 2018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由 0.8% 和 1% 上调为 1.3%。

穆迪下调了美国增长率预估，将 2017 年增速预估由 2.4% 降至 2.2%，2018 年由 2.5% 降至 2.3%，理由是美国 2017 年上半年经济表现较预期疲软，财政刺激措施小于先前预期。穆迪还表示，在解决特朗普政府认为的不公平双边贸易问题方面，如果美国采取全面措施，可能会损害增长。在市场方面，由于资产价格处于历史高位，而且在美联储和

欧洲央行均表示准备撤回刺激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仍普遍预期全球利率将维持在低位，因此资产价格波动率可能上升。

此外，穆迪对澳大利亚 2017 年 GDP 增速预估为 2.5%，高于 2016 年的 2.4%，2018 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则为 2.7%。

穆迪还预测了各大央行的下一步动作，认为美国将会在今年和明年继续紧缩货币政策，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宽松性也将在 2018 年降低，日本央行则将在 2019 年通胀达到 2% 的目标值后收紧货币政策。

（四）金砖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中国金融信息网报道称，当今世界，旧的格局问题重重，新的格局正在形成。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整体上升，世界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期。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金砖国家日益成为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一书作者、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奥利弗·施廷克尔认为，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金砖成员国在全球秩序的演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0 年时间，“金砖国家”从一个投资概念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吴白乙认为，金砖机制堪称新型国际关系的一大创举。金砖五国跨越四大洲、领土面积占世界面积约 30%、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 40%。自 2013 年以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区域内国家和组织举行对话会，逐步探索和拓展“金砖+”合作模式。更多国家、更大规模，金砖合作汇流成海，迸发澎湃动力。中国商务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金砖国家过去 10 年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从 12% 上升到 23%，贸易总额比重从 11% 上升到 16%，对外投资比重从 7% 上升到 12%，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超过 50%。目前，金砖国家已建立多领域 60 多项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加强金砖各国间及金砖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2017 年 8 月初举行的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发表声明重申，所有金砖国家要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多·卡瓦略说，在当前危机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金砖精神越发不可或缺，能够团结大家，并指引前进方向。

10 年来，在中国的推动下，金砖国家建立了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工商理事

会、智库理事会等合作机制。澳大利亚思环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托马斯说，金砖国家可以通过金砖平台和新成立的机构参与国际金融投资，以及在国际事务决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

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拉里奥诺娃说，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份额提升，话语权增加，这是金砖国家合作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

（五）各国需投巨资保证安全清洁水源

世界银行在 2017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的世界水周期间发布报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减少供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方面的不平等》，提出各国需要大幅改变管理资源和提供关键服务的方式，从改进瞄准机制出发，确保惠及最需要的人群，确保公共服务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要实现到 2030 年人人获得安全的水与卫生设施服务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要求世界各国年均投入 1500 亿美元，在供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英文简称 WASH）方面的投资比目前增加 4 倍。

研究报告涉及全世界 18 个国家，提供了对水与卫生服务指标的全面分析，首次指出这些国家里哪些地区服务不足，阐明了城乡之间、贫困与非贫困地区之间存在的主要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差距。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尤为明显。在这 18 个国家，缺乏改良卫生设施人口中的 75% 生活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居民中只有 20% 能够获得改良水源。在尼日利亚，超过 60% 农村人口的居住地与可用水源的距离超过 30 分钟路程。在印度尼西亚，城市污水只有 5% 得到安全处置。在孟加拉，自来水抽检 80% 左右都有大肠杆菌，和池塘里舀出的水相差无几。在厄瓜多尔，24% 的农村人口喝的是有污染的水，21% 的儿童发育不良，18% 的儿童体重不足。在海地，改良水源的可及性在过去 25 年出现下降，改良卫生设施的可及性停滞在 33%，家庭使用改良水源的住户比例从 15% 下降到 7%。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有能力在中期内保持经济强劲增长

IMF 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报告中，上调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期增长预测。称赞中国经济转型方面取得进展，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强劲增长，2017 年将会保持去年 6.7% 的增速，同时可望在中期维持强劲增长。但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导致增速下降。建议中国加快推进必要的结构性改革。IMF 在 2017 年的报告中上调了中国的中期增长预测，将 2017—2021 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从去年预测的 6.0% 上调至

6.4%。上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的加强，以及国内改革的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的增长。在报告中，IMF 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升高，因而风险也会上升，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以不再靠信贷推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以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也使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IMF 亚太部副主任、中国项目主管詹姆斯·丹尼尔在电话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推动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让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的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开放。”IMF 对中国越发重视降低金融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应该进一步完善政策框架，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

（二）IMF 称中国债务水平“危险”

IMF 在 2017 年 8 月 15 日对中国的年度审议中表示，中国经济未来三年平均增幅将为 6.4%，快于预期，原因是政府不愿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IMF 表示，承诺在 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实现经济规模翻番的中国政府，近期容忍债务快速上升以达到这一目标。预计到 2022 年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将超过 GDP 的 290%，而去年为 235%。该组织此前曾估计，债务水平将在未来 5 年期间稳定在相当于 GDP 270% 的水平。IMF 在这份措辞强烈的报告中表示：“国际经验表明，中国目前的信贷轨迹是危险的，出现一场破坏性调整的风险越来越大。”该组织补充说，更高的债务水平将减少中国的“财政空间”，以应对银行间市场的任何潜在危机或人们对理财产品“失去信心”；这类产品的销售支撑了中国影子银行业的快速扩张。

中国驻 IMF 执行董事金中夏拒绝了该组织的警告。“进入 2017 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较强劲表现不只是由政策刺激推动的，而是反映了再平衡和结构调整”，他在官方答复中表示，“IMF 工作人员对中国经济突然减速的假定情形……是极不可能发生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当局释放了一股信贷洪流，使中国的总债务到 2016 年底增至原有水平的 4 倍多，达到 28 万亿美元。IMF 在其报告中指出，过去 10 年期间中国的“信贷效率”急剧恶化，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来产生同样数量的增长。“2008 年时，需要大约 6.5 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增信贷使名义 GDP 提高 5 万亿元人民币”，该组织表示，“到了 2016 年，同样的增长需要 20 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增信贷”。IMF 补充说，要不是中国政

府打开信贷龙头，截至 2016 年的 5 年期间实际 GDP 平均增长率原本为 5.3%，而不是 7.3%。

（三）中国经济处于两年来最佳状态

境外媒体近日称，中国经济正处于两年来最佳状态。2017 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率达到 6.9%，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稳步上升。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2017 年 8 月 29 日发表社论称，中国资本流出的速度放缓。由于贸易和经济表现有所改善，加上采取了控制资本外流的措施，资本和投资正在返回中国。在经历数年下滑后，中国的贸易由于国内外需求强劲而出现反弹。7 月份中国出口（按美元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 7.2%，进口增长 11%。两者虽然都低于分析人士的预期，但仍然体现了明确无误的上升势头。

另据法新社 2017 年 9 月 1 日报道称，由于强劲的海外需求提升了商业信心，中国 8 月份工厂活动加速。这个数据将使人们更加相信：在经历多年放缓之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增长主要推动者的经济增速正日趋稳定。

（四）中国已成全球移动支付领导者

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 8 月 22 日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领导者。同时，在未来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大型科技公司将发挥重要作用。报告说，与支付宝 4.5 亿的用户相比，苹果支付（Apple Pay）全球 1200 万的用户总量相形见绌。对此，报告作者、世界经济论坛金融业创新项目主管杰西·麦克沃特斯说：“转变支付方式的成本是关键因素。中国消费者信用卡持有率较低，这让移动支付能够直接占据主流，而西方消费者对于从刷卡到扫码的支付转变热情不足。”这份报告旨在探索创新对全球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报告强调，云计算、面向客户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客户分析是未来金融机构差异化竞争的三大关键能力。而在这三大领域，相对于传统金融服务机构，以亚马逊、谷歌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报告预测，在未来的新型金融生态系统中，大型科技公司将逐步取代一些金融机构，而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大型科技企业的依赖将不断增强。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 年 7 月)				
世界	3.4	3.2	3.5	3.6
发达国家	2.1	1.7	2.0	1.9
美国	2.6	1.6	2.1	2.1
欧元区	2.0	1.8	1.9	1.7
日本	1.1	1.0	1.3	0.6
发展中国家	4.3	4.3	4.6	4.8
印度	8.0	7.1	7.2	7.7
俄罗斯	-2.8	-0.2	1.4	1.4
巴西	-3.8	-3.6	0.3	1.3
世界银行(WB,2017 年 6 月)				
世界	2.7	2.4	2.7	2.9
发达国家	2.1	1.7	1.9	1.8
发展中国家	3.5	3.5	4.1	4.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7 年 9 月)				
世界	3.0	2.5	3.0	3.1
美国	2.9	1.5	2.1	2.4
欧元区	2.0	1.7	2.0	1.8
日本	1.1	1.0	1.4	1.1
印度	7.7	7.1	7.3	7.6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世界	2.6	2.3	4.0	3.9
进口				
发达国家	4.4	2.4	4.0	4.0
发展中国家	-0.8	1.9	4.5	4.3
出口				
发达国家	3.7	2.1	3.5	3.2
发展中国家	1.4	2.5	3.6	4.3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为 2017 年 4 月预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7 年 7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5 年	2016 年 估计值	2017 年 预测值	2018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 7 月)				
世界	2.8	2.8	3.5	3.4
发达国家	0.3	0.8	1.9	1.8
发展中国家	4.7	4.3	4.5	4.6
英国共识公司(2017 年 9 月)				
世界	1.9	2.5	3.0	2.9
美国	0.1	1.3	2.0	2.0
欧元区	0.0	0.2	1.5	1.3
日本	0.8	-0.1	0.5	0.8
印度	4.9	4.5	3.6	4.6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做了调整。

表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6年		1.3	0.4	2.7	
	8月	1.3	0.5	2.8	
	9月	1.4	0.7	2.9	
	10月	1.5	0.9	2.6	
	11月	1.6	1.0	2.5	
	12月	1.8	1.4	3.0	
	2017年	1月	2.3	1.7	3.2
		2月	2.4	1.9	3.7
3月		2.6	1.8	3.9	
4月		2.3	1.9	3.7	
5月		2.1	1.6	3.6	
6月		1.9	1.3	3.5	
7月		2.0	1.4	3.2	
8月		2.4	1.6	3.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6年		2.1	0.4	4.3			
	8月	2.4	0.9	4.3	50.7	52.0	51.1
	9月	2.4	0.6	3.9	51.0	52.0	51.4
	10月	1.8	0.6	4.3	51.9	53.5	52.8
	11月	3.0	2.0	4.8	52.0	53.3	53.0
	12月	4.2	2.7	5.1	52.7	53.9	53.7
2017年	1月	3.6	1.2	5.6	52.7	53.6	54.0
	2月	3.6	2.4	5.0	52.9	54.1	54.1
	3月	4.2	2.6	6.0	53.0	54.2	54.2
	4月	4.2	2.8	5.6	52.7	53.6	53.6
	5月	4.8	3.4	6.1	52.6	53.5	53.6
	6月	4.2	3.1	5.8	52.6	53.2	53.3
	7月	4.2	3.3	5.6	52.7	53.1	53.7
	8月				53.1	53.6	54.2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年		2.9	3.6	1.4
	3季度	1.6	2.8	1.2
	4季度	0.5	2.7	0.3
	2016年	1.5	2.7	0.8
2016年	1季度	0.6	1.8	1.8
	2季度	2.2	3.8	-0.9
	3季度	2.8	2.8	0.5
	4季度	1.8	2.9	0.2
2017年	1季度	1.2	1.9	-0.6
	2季度	3.0	3.3	-0.3

表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5年		3.9	0.4	5.0
	3季度	3.4	-4.0	1.7
	4季度	-2.4	-2.3	0.0
	2016年	0.7	-0.3	1.3
2016年	1季度	-0.2	-2.6	-0.2
	2季度	1.4	2.8	0.4
	3季度	1.5	6.4	2.7
	4季度	1.7	-3.8	8.1
2017年	1季度	8.1	7.3	4.3
	2季度	3.6	3.7	1.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6、表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6、表7)。

表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5年		2.9	3.6	1.4
	3季度	2.4	3.6	1.4
	4季度	2.0	3.0	1.6
	2016年	1.5	2.7	0.8
2016年	1季度	1.4	2.6	1.7
	2季度	1.2	2.8	0.6
	3季度	1.5	2.8	0.4
	4季度	1.8	2.8	0.4
2017年	1季度	2.0	2.9	-0.2
	2季度	2.2	2.7	-0.1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5 年		3.9	0.4	5.0
	3 季度	3.1	0.0	5.6
	4 季度	2.4	-1.8	2.9
2016 年		0.7	-0.3	1.3
	1 季度	1.3	-1.3	1.2
	2 季度	0.5	-1.6	0.5
	3 季度	0.1	1.0	0.7
	4 季度	1.1	0.6	2.7
2017 年				
	1 季度	3.2	3.1	3.8
	2 季度	3.7	3.3	4.1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6 年					
	8 月			4.9	17.6
	9 月	3.3	0.1	5.0	24.9
	10 月			4.9	12.4
	11 月			4.6	16.4
	12 月	1.8	1.1	4.7	15.5
2017 年					
	1 月			4.8	21.6
	2 月			4.7	23.2
	3 月	-0.6	1.1	4.5	5.0
	4 月			4.4	17.4
	5 月			4.3	14.5
	6 月			4.4	21.0
	7 月			4.3	18.9
	8 月			4.4	15.6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6 年	22121		-2.2	27126		-1.8
	6 月	1827	0.8	-4.0	2278	1.9	-2.4	-451
	7 月	1864	2.0	-1.9	2261	-0.7	-1.7	-397
	8 月	1883	1.0	0.9	2288	1.2	-1.0	-405
	9 月	1902	1.0	1.4	2262	-1.1	-1.0	-360
	10 月	1864	-2.0	0.4	2290	1.2	0.8	-426
	11 月	1860	-0.2	1.3	2315	1.1	3.0	-455
	12 月	1910	2.7	4.3	2353	1.6	4.8	-443
2017 年								
	1 月	1915	1.1	7.2	2403	2.6	8.2	-488
	2 月	1917	0.1	6.0	2366	-1.5	4.6	-449
	3 月	1915	-0.1	6.4	2367	0.1	9.0	-453
	4 月	1912	-0.1	5.1	2388	0.9	8.4	-476
	5 月	1920	0.4	5.4	2384	-0.1	6.6	-464
	6 月	1944	1.2	5.8	2380	-0.2	4.6	-436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4658	2626	2032
	3 季度	574	485	89
	4 季度	636	589	47
2016 年		4571	2807	1764
	1 季度	1414	777	637
	2 季度	1617	762	855
	3 季度	1091	889	203
	4 季度	448	379	69
2017 年				
	1 季度	770	1102	-327
	2 季度	783	997	-214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年		2.0	1.8	1.3
	3季度	0.4	0.5	0.4
	4季度	0.4	0.4	0.6
2016年		1.8	2.1	1.8
	1季度	0.5	0.6	0.7
	2季度	0.3	0.5	0.3
	3季度	0.4	0.4	0.2
	4季度	0.6	0.4	0.3
2017年				
	1季度	0.5	0.4	0.2
	2季度	0.6	0.5	0.5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5年		3.1	6.6	6.8
	3季度	1.0	0.6	1.2
	4季度	1.5	0.9	1.6
2016年		4.4	3.2	4.6
	1季度	0.3	0.4	0.4
	2季度	2.7	1.3	1.8
	3季度	0.1	0.4	0.5
	4季度	1.3	1.5	2.0
2017年				
	1季度	-0.3	1.3	0.4
	2季度	0.9	1.1	0.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13、表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6年		0.4		43.8	10.0
	7月				10.0
	8月				9.9
	9月	0.2	0.2	46.9	9.9
	10月				9.8
	11月				9.7
	12月	0.3	0.2	55.4	9.6
2017年					
	1月				9.6
	2月				9.5
	3月	0.0	1.0	77.5	9.4
	4月				9.2
	5月				9.2
	6月	0.2	0.1	65.0	9.1
	7月				9.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5年		2.0	1.7	1.3
	3季度	2.0	1.7	1.3
	4季度	1.9	1.7	1.5
2016年		1.8	2.1	1.7
	1季度	1.7	2.0	1.9
	2季度	1.7	2.0	1.9
	3季度	1.7	1.9	1.6
	4季度	1.9	2.0	1.6
2017年				
	1季度	2.0	1.6	1.0
	2季度	2.3	1.8	1.2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5年		3.1	6.6	6.8
	3季度	3.0	5.9	6.2
	4季度	3.7	5.4	6.7
2016年		4.4	3.2	4.6
	1季度	2.8	3.1	4.2
	2季度	5.6	3.2	5.1
	3季度	4.6	3.0	4.3
	4季度	4.4	3.6	4.7
2017年				
	1季度	3.8	4.5	4.7
	2季度	2.0	4.4	3.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16、表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6年		20477		0.2	17758		-1.3	2719	
	7月	1676	-0.3	-9.4	1428	0.9	-7.8	248	
	8月	1606	2.7	8.6	1431	0.8	4.4	175	
	9月	1771	-0.8	2.3	1527	-0.6	-1.1	244	
	10月	1726	0.0	-4.5	1532	2.1	-2.9	195	
	11月	1835	3.2	5.6	1593	2.2	5.6	242	
	12月	1791	1.9	6.2	1515	1.4	4.9	277	
2017年									
	1月	1634	-1.0	12.8	1648	4.0	17.7	-14	
	2月	1717	0.8	5.2	1553	-0.9	7.1	163	
	3月	2054	2.2	14.6	1763	0.4	16.8	291	
	4月	1689	-1.7	-1.6	1523	-0.3	4.3	167	
	5月	1908	2.3	13.6	1707	2.5	18.1	201	
	6月	1872	-1.9	3.9	1610	-4.0	6.4	262	
	7月	1777	-1.1	6.1	1546	0.7	8.2	232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19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6 年		562	4143	-3581
	7 月	-35	158	-193
	8 月	141	606	-465
	9 月	-519	-55	-464
	10 月	246	959	-713
	11 月	223	516	-293
	12 月	-451	73	-524
2017 年				
	1 月	913	1082	-169
	2 月	949	951	-2
	3 月	106	228	-122
	4 月	74	276	-202
	5 月	152	229	-77
	6 月	17	-405	422
	7 月	-1855	-1762	-9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0.3	1.7
	3 季度	0.2	0.6	0.4
	4 季度	-0.2	-0.6	0.7
2016 年		1.0	0.4	1.3
	1 季度	0.5	0.3	1.4
	2 季度	0.5	0.1	-1.3
	3 季度	0.2	0.4	0.2
	4 季度	0.4	0.1	0.0
2017 年				
	1 季度	0.3	0.4	-0.1
	2 季度	0.6	0.8	0.4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5 年		0.1	2.9	0.8
	3 季度	0.4	2.4	2.5
	4 季度	-0.2	-0.4	-0.3
2016 年		0.9	1.2	-2.3
	1 季度	0.3	0.0	-2.0
	2 季度	0.7	-0.9	-1.2
	3 季度	0.2	2.1	-0.2
	4 季度	0.9	3.1	1.4
2017 年				
	1 季度	0.8	1.9	1.3
	2 季度	1.7	-0.5	1.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5 年		1.1	-0.3	1.7
	3 季度	2.0	1.3	1.6
	4 季度	0.9	0.0	2.2
2016 年		1.0	0.4	1.3
	1 季度	0.5	-0.1	2.7
	2 季度	0.9	0.4	1.2
	3 季度	1.1	0.3	1.0
	4 季度	1.7	1.0	0.3
2017 年				
	1 季度	1.5	1.0	-1.1
	2 季度	1.4	1.7	0.6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5 年		0.1	2.9	0.8
	3 季度	1.3	2.9	1.8
	4 季度	0.1	-0.5	0.6
2016 年		0.9	1.2	-2.3
	1 季度	-0.7	-1.4	-2.4
	2 季度	1.6	0.7	-1.1
	3 季度	1.1	0.8	-3.6
	4 季度	2.0	4.6	-2.0
2017 年				
	1 季度	2.3	6.6	1.2
	2 季度	3.4	6.6	3.9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6 年		-0.4	2.06	3.1
	7 月	-2.8	2.03	3.0
	8 月	5.1	2.07	3.2
	9 月	0.3	2.10	3.0
	10 月	-2.2	2.11	2.9
	11 月	4.4	2.15	3.0
	12 月	1.3	2.19	2.9
2017 年				
	1 月	3.9	2.13	3.0
	2 月	3.4	2.12	2.8
	3 月	4.7	2.13	2.8
	4 月	5.1	2.13	2.8
	5 月	3.7	2.31	3.1
	6 月	3.9	2.25	2.8
	7 月			2.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月份							
2016年	700358		-7.4	660420		-15.8	39938
8月	53164	0.0	-9.6	53510	-0.6	-17.0	-346
9月	59689	0.7	-6.9	54824	1.9	-16.1	4866
10月	58702	1.7	-10.3	53891	0.0	-16.3	4812
11月	59564	4.0	-0.4	58099	4.2	-8.7	1465
12月	66789	2.2	5.4	60430	3.2	-2.5	6359
2017年							
1月	54220	0.9	1.3	65139	3.7	8.4	10919
2月	63475	6.7	11.3	55364	-1.2	1.3	8111
3月	72296	-4.0	12.0	66193	3.5	15.9	6103
4月	63294	-0.6	7.5	58503	-0.5	15.2	4792
5月	58512	0.4	14.9	60576	0.3	17.9	-2064
6月	66084	-0.6	9.7	61670	0.3	15.5	4398
7月	64952	2.9	13.4	60735	-1.3	16.3	4188
8月	62780	1.2	18.1	61644	1.2	15.2	1136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6年		38307	183930	-145623
	7月	18142	22909	-4767
	8月	-12931	-14142	1211
	9月	-462	44740	45202
	10月	-68	15478	-15546
	11月	5688	12014	-6236
	12月	654	21720	-21066
2017年				
	1月	-75	10964	-11039
	2月	2176	24160	-21984
	3月	2497	26252	-23755
	4月	3171	7829	-4658
	5月	1480	17662	-16182
	6月	652	15267	-14615
	7月	751	12562	-11811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5年		0.9	2.2	1.3	-3.8	7.7	-3.3
	3季度	0.8	1.8	0.9	-4.5	8.0	-3.2
	4季度	0.4	1.7	0.6	-5.8	7.2	-3.8
2016年		1.5	1.8	0.3	-3.6	7.9	-0.2
	1季度	1.3	1.6	-0.6	-5.4	9.1	-0.4
	2季度	1.1	1.7	0.3	-3.6	7.9	-0.5
	3季度	1.5	2.0	0.7	-2.9	7.5	-0.4
	4季度	2.0	1.9	0.7	-2.5	7.0	0.3
2017年							
	1季度	2.3	2.0	1.0	-0.4	6.1	0.5
	2季度	3.7	1.7	1.1	0.3	5.7	2.5

注:印度年度GDP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5年		2.8	2.6	2.4	0.8	5.0	4.9
	3季度	3.0	2.8	2.3	-0.7	4.7	4.8
	4季度	3.2	2.5	1.9	-0.8	4.6	5.2
2016年		2.8	2.3	1.9	1.5	4.2	5.0
	1季度	2.9	2.2	1.0	-0.2	4.1	4.9
	2季度	3.4	2.6	1.8	1.1	4.0	5.2
	3季度	2.6	2.0	2.0	2.1	4.3	5.0
	4季度	2.4	2.3	3.2	2.9	4.5	4.9
2017年							
	1季度	3.0	2.8	4.3	2.6	5.6	5.0
	2季度	2.7	1.8	3.8	2.1	5.8	5.0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6年		7.0	4.9	11.3	5.5	26.7
	8月	7.0	4.9	11.8	5.2	
	9月	7.0	4.8	11.8	5.2	27.1
	10月	7.0	4.8	11.8	5.4	
	11月	6.8	4.8	11.9	5.4	
	12月	6.9	4.8	12.0	5.3	26.5
2017年						
	1月	6.8	4.7	12.6	5.6	
	2月	6.6	4.7	13.2	5.6	
	3月	6.7	4.6	13.7	5.4	27.7
	4月	6.5	4.6	13.6	5.3	
	5月	6.6	4.5	13.3	5.2	
	6月	6.5	4.4	13.0	5.1	27.7
	7月	6.3	4.3	12.8	5.1	
	8月	6.2			4.9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6年		3.7	3.9	3.4	3.9	3.5
	8月	3.8	4.0	3.4	4.0	3.5
	9月	4.0	4.1	3.4	3.9	3.5
	10月	3.7	3.7	3.4	3.9	3.5
	11月	3.6	3.5	3.3	3.8	3.4
	12月	3.5	3.4	3.3	3.8	3.5
2017年						
	1月	3.6	3.6	3.3	3.8	3.5
	2月	4.0	3.4	3.3	3.8	3.5
	3月	3.7	3.2	3.2	3.8	3.4
	4月	4.0	3.5	3.2	3.8	3.4
	5月	3.6	3.6	3.2	3.8	3.4
	6月	3.8	3.3	3.1	3.8	3.4
	7月	3.6	3.4	3.1	3.8	3.5
	8月	3.8		3.1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3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3902	4030	-128	4090	6366	-2276
7 月	302.8	322.4	-19.6	314.2	524.1	-210.0
8 月	337.3	357.2	-20.0	307.7	544.7	-236.9
9 月	339.4	364.0	-24.6	334.1	501.3	-167.2
10 月	337.6	339.7	-2.1	330.2	489.7	-159.5
11 月	348.0	332.6	15.3	360.0	534.5	-174.5
12 月	339.5	315.1	24.4	391.6	477.2	-85.6
2017 年						
1 月	338.4	317.3	13.9	349.6	475.0	-125.4
2 月	323.4	324.5	-1.1	338.1	479.6	-141.5
3 月	372.6	372.0	0.6	388.6	561.7	-173.1
4 月	338.0	346.6	-8.6	334.4	485.9	-151.5
5 月	368.3	374.0	-5.7	378.8	524.1	-145.3
6 月	360.6	386.9	-26.3	362.2	535.6	-173.4
7 月	321.3	347.9	-26.6	389.7	514.1	-124.4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非			巴西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751	750	1	1853	1435	418
8 月	65.2	71.7	-6.5	169.9	134.1	35.8
9 月	70.8	65.8	5.0	158.0	125.2	32.8
10 月	63.6	65.9	-2.3	137.2	118.7	18.5
11 月	71.4	72.4	-1.0	165.2	119.6	45.6
12 月	67.6	58.7	8.9	159.4	120.4	39.0
2017 年						
1 月	59.3	67.5	-8.2	149.1	127.3	21.8
2 月	66.0	62.2	3.9	154.7	114.0	40.7
3 月	77.9	69.3	8.6	200.9	135.3	65.5
4 月	67.3	63.7	3.6	176.9	111.8	65.0
5 月	77.3	71.9	5.4	197.9	126.6	71.3
6 月	79.0	70.8	8.2	197.9	131.6	66.3
7 月	70.9	64.1	6.9	187.7	130.3	57.4
8 月				194.8	145.0	49.8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度			俄罗斯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2642	3596	-954	2818	1914	904
8 月	215.8	291.6	-75.8	232.0	184.5	47.5
9 月	228.8	319.9	-91.1	254.3	179.9	74.4
10 月	234.2	338.1	-103.8	249.0	183.0	66.0
11 月	200.8	327.4	-126.6	266.5	175.1	91.4
12 月	239.6	342.2	-102.5	311.3	192.9	118.3
2017 年						
1 月	222.9	319.2	-96.4	251.2	136.8	114.4
2 月	255.4	332.3	-76.9	257.5	155.8	101.7
3 月	291.5	396.7	-105.2	313.3	187.3	126.0
4 月	246.0	380.7	-134.7	261.0	180.9	80.0
5 月	225.4	379.3	-153.9	281.7	196.5	85.2
6 月	235.8	365.4	-129.6	295.2	208.3	86.9
7 月	225.4	339.9	-114.5	347.4	207.7	139.7
8 月	238.2	254.6	-16.4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4954	4062	892	3739	3975	-236
7 月	408.8	333.7	75.1	297.7	324.5	-26.8
8 月	401.3	351.0	50.2	324.5	352.7	-28.2
9 月	408.5	339.9	68.6	327.0	351.5	-24.5
10 月	419.8	350.5	69.3	326.0	344.1	-18.2
11 月	453.1	372.4	80.7	343.4	352.0	-8.6
12 月	450.7	383.0	67.7	331.9	341.3	-9.4
2017 年						
1 月	402.7	575.6	-172.9	273.2	316.7	-43.6
2 月	431.7	461.7	-29.9	313.4	314.4	-0.9
3 月	486.5	425.6	60.9	360.5	371.1	-10.6
4 月	508.5	379.9	128.7	317.5	317.3	0.2
5 月	449.4	393.5	55.9	354.7	375.4	-20.7
6 月	512.9	406.0	106.9	356.1	365.1	-9.1
7 月	488.4	385.6	102.9	321.6	346.0	-24.4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5167	5473	-306	2804	2306	49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4	40.2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8	43.8
10 月	447.8	484.9	-37.1	267.4	223.1	44.4
11 月	494.4	513.7	-19.3	253.3	210.2	43.1
12 月	476.3	542.1	-65.8	257.0	208.4	48.6
2017 年						
1 月	405.3	421.9	-16.6	237.4	202.5	35.0
2 月	355.5	403.9	-48.4	226.5	193.0	33.5
3 月	485.2	506.1	-20.9	257.0	217.5	39.5
4 月	447.8	456.7	-8.9	243.1	215.3	27.7
5 月	430.3	471.1	-40.8	255.1	220.6	34.5
6 月	491.8	525.2	-33.4	258.1	200.0	58.1
7 月	468.8	485.7	-16.9	271.1	217.4	53.7
8 月				277.7	220.6	57.1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减进口
2016 年	1894	1684	210	1445	1357	88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165.6	147.2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165.6	142.3	23.4	127.4	115.1	12.4
11 月	168.0	147.2	20.8	135.0	126.7	8.3
12 月	169.4	149.8	19.6	138.3	127.8	10.5
2017 年						
1 月	157.6	146.9	10.6	134.0	119.7	14.3
2 月	161.5	141.8	19.6	126.1	113.5	12.6
3 月	186.1	174.0	12.2	146.8	132.8	14.0
4 月	167.6	148.0	19.7	132.8	119.5	13.3
5 月	184.1	171.3	12.7	143.5	137.7	5.8
6 月	170.9	147.8	23.1	116.6	99.9	16.6
7 月	183.4	164.7	18.7	136.1	138.9	-2.8
8 月				152.1	134.9	17.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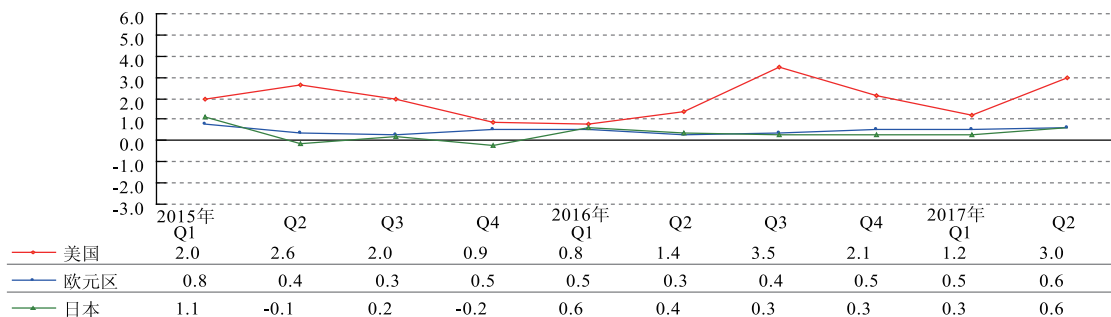


图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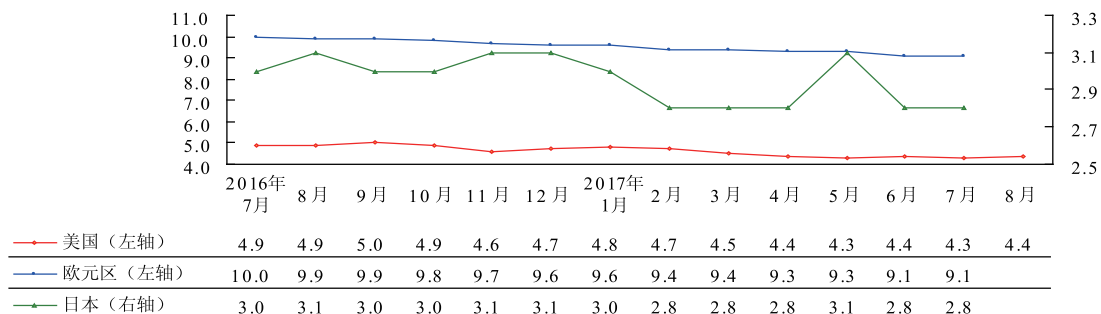


图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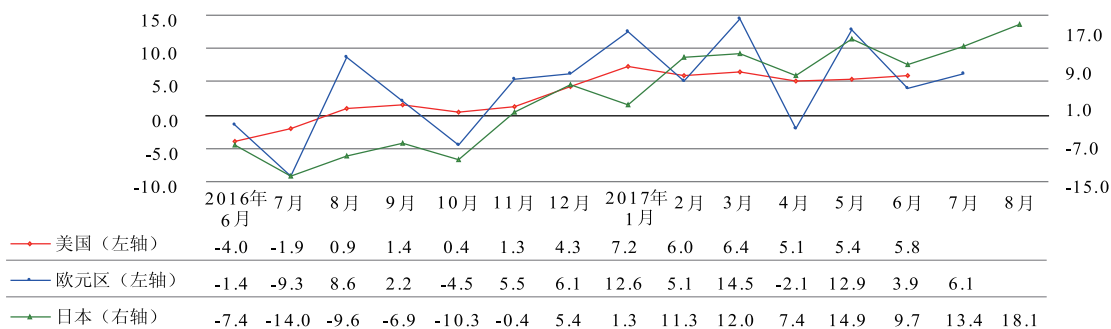


图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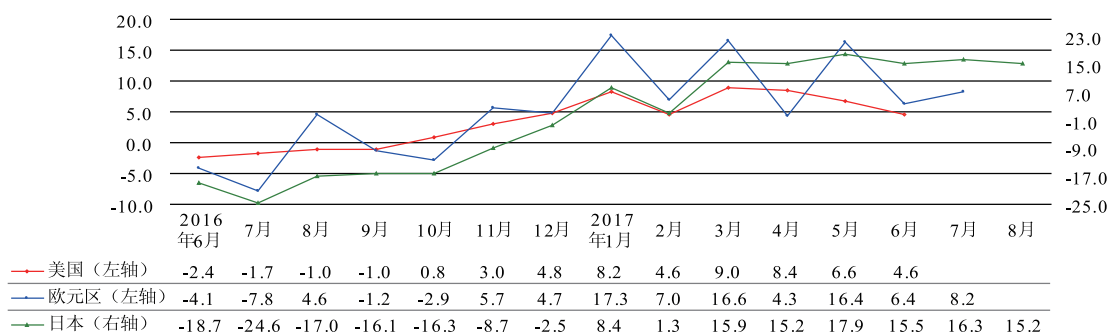


图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1~图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To construct a long-term mechanism in which supply structure and demand structure are dynamically accommodating to each other

Han Yongwen

In theory,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short term is to promote “three to drop, one to fall and one to fill”, reversing the problem on the surface where the supply structure cannot adapt to the demand structural requirements; in the long-term and fundamentally, it is to perfect mechanism system wher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urther strengthen total factor market, enhance the internal power of microcosmic body, really form a unified,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are dynamically adaptive, and structure changes of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are adapting to each other.

(2) To carry out the great causes of moderniz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end—Commemorate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Jia Ka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ll usher in the 40th anniversary.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continued substantive advanc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cern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progress to China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shows clearly, but not limited to,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otal economy and per capita incom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material, spiritual, political, cultural, ecological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civilization. China’s reform has entered the “deep water zone”, where the resistance is unprecedented, which requires us to further emancipate our minds, rush through the “Three Gorges of history” with a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mee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modernization.

(3) The crossroads of global “broad money” and “tight money”

Gu Yuanyang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16, the sound of global monetary easing moving to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gradual tightening has become lauder, the main reasons for which are the emergence of new factors for the global monetary policy shift, tightening convergence changes in global monetary policy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ed’s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for the monetary policy normalization. Because of their macroeconomic situations are less sound than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the Bank of Japan did not follow the change of the Fed’s monetary policy to alter their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but considering the loosing monetary policy has come to an end, they began to release the preliminary tightening signal. In

2017, caused by the increased factors for monetary policy tightening, the global monetary policy adjustments moved to the crossroads. However, the road for the global monetary easing to exit has never been flat, the global loosen monetary policy and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are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it is less likely to see the turning point of global re – 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moving from loose to tight, thus causing a shortage of liquidity in the world.

(4) Sustained economic recovery and weak expansion base——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terpretation Group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7, the major economies recovered to varying degrees, the main economic areas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the world economy grew steadily with increased vitality, and overall maintained a sustained recovery trend. However, the unstable factors still exist, the foundation of recovery is not firm,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ing our country is still complicat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world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recov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but the pace will not be too fast. The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our country is grim, so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and deal with it properly.

(5) The enlightenment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Meng Gang

The pound, the dollar, the yen and the euro are the world’s major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rade, investment, finance, government and others, study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experience of the currencies above is significant.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during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China should enhanc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omestic economy,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China should jointly negotiate, construct and share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and trade, and intensify the functions of RMB for denominated settlement, trading and reserve.

(6) Research on the system mechanism of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CCIEE Research Group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therefore, how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ll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in – depth study. From the basic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 goal and main tas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which it gives the major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economic policy and market mechanism and so on.

(7) Stable real estate prices, wealth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He Jingtong, Na Yi and Zhao Zimu

It is urgent and significant to curb the continued “overhea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promote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However, the market effects of various regulatory policies in China are not satisfactory. We need to further analyze

and recognize the support mechanism for prices behind the back, set out countermeasures starting from the root. The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short – term “supply – demand” analysis seems logical, but ignores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at is, real estate is a special commodity with investment goods and consumer goods, so the market subjects are easy to form the expected bullish wealth. Therefore, how to correctly guide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the key to stabilizing prices and inducing the property market moving to the stability at the moment. In the long term, we should construct stable legal system based on legal system as the core, with the precise regulation from the supply side to guide and stabilize expectations; in the short term, we should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land leasing in time, prevent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rounds of land transaction to push up the prices that increase the expected real estate wealth. Stable expectations will bring about stable prices, guide the flow of excessive capital in the housing market to other industries, which help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alanc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dustrial profit rates,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us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doe stable economic growth.

(8)The forecast of the total labor supply and structure of China in the future

Tian F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supply of labor forc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a country’s economy. This article uses the population shift algorithm to predict the Chinese total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nd age structure, and then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it determin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labor supply and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 which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total labor supply, labor force supply structure, future labor force sex structure and quality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enlightenments.

(9)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find out “short slabs” and fill them

Huang Yong, Fu Jinlong, Pan Yigang and Dong Bo

The “short slabs” is the prominent problem and contradiction affec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Finding and filling “short slab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goals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high level well – off society, the “short slabs” in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are mainly from the fields which are not meeting the high level requir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s, not balan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equilibrium imbalance, and not adapt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reased advantage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es,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 short slabs in six aspect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in innovation, opening up,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urban integration, public servic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others are more promin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ut forward the direction for innovating and filling the short slabs.

Editor: Huang Yongfu

欢迎订阅《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2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5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8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元/年(12期)	总计金额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